

沂水县党史资料汇编

第三辑



中共沂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责任编辑 张茂萱
李永亮
封面题字 张家璞
封面设计 孔令新
校 对 张玉良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莒县印刷厂印刷

沂水县党史资料汇编

第三辑

中共沂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目 录

- 《民声报》和《青年报》……………张 惠（1）
- 沂水县抗日游击第十九中队始末……………武善德（6）
- 姐妹参军记……………于 烈（8）
- 我八路军在沂水县组建发展及其斗争情况……………张洪轩（16）
- 忆沂水县军民与敌伪顽的斗争情况……………张之明（25）
- 马家旺事件与刘克定牺牲的经过……………朱迪昭（39）
- 一九三九年春夏之交我在沂水西北乡
- 开办党员训练班的情况……………刘亚明（43）
- 抗日战争时期在沂蒙地区沂水县一段工作的回忆
……………王林岗（郝心昌）（46）
- 沂水县党组织抗日活动片断及肃托情况……………耿启明（52）
- 沂水肃托及其它情况片断回忆……………李树平（57）
- 抗日战争中沂水县的统战工作……………尹平符（61）
- 沂水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概况……………靳星五（72）
- 《动员日报》概述……………靳星五（74）
- 沂水县抗协简况……………靳星五（75）
- 沂水县抗敌自卫军简述……………靳星五（77）
- 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尹振华谈山纵卫生部医院……………（78）

- 忆沂水县抗日子弟小学……………安善平 张琳 (82)
- 忆抗属子弟学校……………孔 周 (86)
- 略述日寇对沂蒙山区的几次大扫荡……………刘露泉 (89)
- 一九四一年冬反“扫荡”斗争片断回忆……………杨 兴 (92)
- 一九四一年冬在日寇大扫荡中的一段经历……………张 谦 (100)
- 一九四一年前我在沂水县一区工作的片断回忆
……………刘俊芝 (108)
- 城子乡乡分队假投降事件经过……………杨成栋 (114)
- 忆反“资敌”斗争……………段子珍 (118)
- 南墙峪反“扫荡”记实……………郭维城 (123)
- 对崮顶血战纪实……………黎玉口述 靳星五整理 (127)
- 一九四二年冬反扫荡情况片断回忆……………杨 兴 (135)
- 忆歪头崮战斗……………吕敬之 亓魁洲 (143)
- 我对拔除北松峰伪军据点的回忆……………宫家和 (147)
- 抗战时期的桃花坪……………董廷会 林茂瑞 (152)
- 上升中的桃花坪——桃花坪通讯之一(节录)
……………冠 西 (160)
- 桃花坪要“组织起来”了——桃花坪通讯之二(节录)
……………冠 西 (161)
- 桃花坪之冬——桃花坪通讯之三(节录)
……………冠 西 (162)
- 桃花坪生产概况(节录)…………… (164)

-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墙峪村……………张恒谦 张在周 (165)
- 抗战时期俺宅科村是怎样掩护革命同志的……李德 (172)
- 鲁中区党委减租减息试点村纪实……………王建升 (176)
-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沂水县做妇女工作的一段回忆
 ………………阎娟 (180)
- 抗战时期沂中县妇女工作片断回忆……………史培力 (188)
- 赤胆忠心救伤员
 ——记红嫂祖秀莲……………代玉勤 高润兰 (192)
- 模范共产党员妇救会长陈忠芳……代玉勤 刘春联 (198)
- 抗属赵传春……………代玉勤 (206)
- 抗日战争末期在沂中县工作的一段回忆……刘夏峰 (212)
- 鲁中军区发表沂城战役详报…………… (215)
- 忆葛庄伏击战……………冯国恩 (219)
- 沂北诸葛区中队和民兵参加葛庄战斗回忆……杨兴 (239)
- 鲁中军区发表葛庄歼灭战役公报…………… (245)
- 我在沂北一段工作情况略述……………李怀德 (250)
- 抗战时期沂河区的情况……………赵诚 (255)
- 抗战时期我在沂水沂北工作的经历……………赵干 (260)
- 回忆沂北县参议会……………宫家和 (265)

《民声报》和《青年报》

张 惠*

现在的《大众日报》是一九三九年元旦，在沂水西北乡王庄创刊的。一九三八年，沂水县内在党的领导下，曾出版过《民声报》和《青年报》。这两个报纸和《大众日报》有着历史的血缘关系。

“七七”事变以后，沂水人民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男女老少普遍关心抗战形势。本来就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山区，又加上战争的影响，至少隔周才能看到报纸。为了及时获得战争消息，有几个大村便集资购买收音机。当时岳庄小学购置的一架，传播抗战消息特别经常及时。小学教师安然（安凌云）和回乡知识青年李戴（张冠西）、张惠（张福基），每天凌晨和深夜，把收到的新闻广播，详细地记录下来，写成大字报，张贴在集市街头，供大家阅览。同时还摘要抄写数份，分发附近各小学，进行抗日宣传，受到各方的欢迎。岳庄小学俨然成了抗战新闻传播中心。

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地下党员邱也民、李子荣、秦海村、秦昆等，以李贯一领导的一中队名义，联络爱国青年刘力子、武子服、武杰、杨云洲、刘寿年、安然、张惠等

*张惠，沂水县岳庄人。解放战争时期，任沂中县文教科长。建国后曾任上海中山医院党委书记，现已离休。

五十余人，在武家洼和刘家诸坞组成了沂水青年抗日志愿队。这支队伍成立以后，除了抓紧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之外，并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实际工作中，深感有出版一份报纸之必要。在邱也民、李贯一等同志的倡议下，决定在岳庄小学利用收音机进行抗日宣传的基础上，出版一份油印小报。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邱也民等同志率领志愿队的大部分人员，去沂水北乡扩大武装以后，留下办报的同志，在李戴、安然的主持下，在黄家庵村创刊了《民声三日刊》（简称《民声报》），刘力子（刘莪之）、刘惠五、马民（马俊民）、张惠、黄春生等同志参加了报社工作。

《民声报》从第二期起迁到了岳庄小学，用四张腊纸组成四个版面，定期出版，内容有国际国内地方新闻，还有社论文艺小品等。这在当时邮路完全断绝，看不到所有报纸的情况下，便成了全县人民获得抗战消息，了解抗战形势的唯一新闻来源。不少读者和社会开明人士，自动捐献款物，积极予以支持。报社全体同志也团结一致，克服各种困难，精心编辑、缮刻、印刷，保证按时出版，迅速投递。遇到重要新闻和胜利消息，还加印号外，及时报导。报纸从第三期，连续转载了《救亡日报》（党在巴黎出版的报纸）全文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对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使读者了解了共产党抗日的坚定立场和正确主张，从而大大增强了群众的抗日意志和胜利信心，特别受到读者的欢迎。

一九三八年春，日寇因集中兵力，进行台儿庄会战，沂水境内，无日军驻守。但国民党县政府，却仍然躲在山区，

不敢返回县城领导人民抗战，这时，一些豪绅地主，为了保枪保势，假借抗战之名，纷纷成立武装，敲诈勒索，鱼肉乡民，甚至相互火并，闹得民不聊生。报纸基于群众义愤，便以《欢迎县长孙桐峰回城领导人民抗战》为题，发表社论，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县政府一伙消极抗战，放弃职守，坐视豪绅地主胡作非为，而不加制止。这一下子激怒了国民党当局，孙桐峰竟然于六月中旬，派出军警蛮横无理的把报社查封了。

报社被查封以后，全体同志更加紧密团结，积极设法恢复出刊。这时国民党六十九军来到了鲁南，军部住在新泰县龙亭镇，并在沂水设了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共产党员张健同志。他得知《民声报》被孙桐峰无理查封，并正在积极设法复刊的消息，便主动介绍李戴、刘力子、安然三同志，带着要求复刊的呈文，去会见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张友渔同志，请求六十九军政治部支持复刊。张友渔同志热情接待了三同志，并高度赞扬了报社同志的抗日救国热情，当即批复复刊。三同志持批文星夜返回岳庄，几天之内就作好了复刊的准备。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报纸改名为《青年报》。“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又以崭新的面目与读者重新见面。在创刊号第一版的显要位置刊登了六十九军政治部的批文，孙桐峰未敢干涉。

《青年报》社的全体同志，基本上是《民声报》的原班人马。具体分工：社长李戴，总编辑刘惠五，编辑兼缮刻马民、张惠，维修刘承塾，总务兼收音安然，发行牛铁民、段宝铨、伙食李树德。

《青年报》每周出刊两至三期，每期仍然是四开一张的

两个版面，发行二百五十余份，由牛铁民、段宝铨两同志骑车送至各发行点后，立即转发订户，相当迅速及时。经费来源除了自带以外，主要是靠各方捐助和少量的发行收入。

夏季，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即以后的山东分局）来到了沂水西南部的岸堤一带，报社与省委取得了联系。省委经常供给有关资料，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北方局宣言》以及八路军战报等，报纸均一一转载。八路军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等也常为报纸撰稿。同时报纸增辟了《青年阵线》栏，吸引了不少爱国青年踊跃投稿。报纸的内容较前更为充实丰富、生动活泼。这期间，分局宣传部长孙陶林同志、统战部长赵笃生同志以及张友渔同志派出的周洪恩、江彻同志也常来报社，和大家座谈形势，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给了报社同志很大精神鼓舞和政治帮助。

秋季以后，鲁南敌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以我党为代表的抗战进步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封建势力，更加暴露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本质。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对报纸进行恶毒攻击。在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形势下，报纸再以民间面目出现，显然是不可能了。这时分局宣传部长孙陶林同志，正在为筹办报纸物色人才，鉴于《青年报》处境困难，便提议大家去分局，共同筹办新的报纸，全体同志一致赞成。不久，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专程来到报社，召集大家开会，会上，他首先热情地赞扬了同志们的工作精神和高度评价了大家办报的成绩，又阐述了当前抗战形势，介绍了分局筹办报纸的情况，热烈欢迎大家一起去分局，参加筹备工作，争取新的报纸早日创刊。大家

听了，无不欢欣鼓舞，热烈拥护。十一月初，《青年报》便停止了出刊，同志们积极准备踏上新的战斗里程。中旬，筹备处派了卢石流同志，代表总编辑匡亚明同志前来岳庄迎接，全体同志除一人外，立即背起了背包、武器，用小车推着纸张、收音机、油印机等器材，高高兴兴地到达了王庄，紧张地投入了《大众日报》的筹备工作。

一九三九年元旦，《大众日报》创刊了。创刊号上刊登了《青年报》社紧急启事：“为了集中力量出刊内容丰富、印刷精良的报纸，本社全体同仁参加了《大众日报》社工作，因行进匆促，未及出刊终刊号，告别读者，敬请原谅。本社一切未了事宜，以后由《大众日报》负责办理。”从此艰苦创业奋斗经年的《民声报》、《青年报》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载入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老解放区新闻事业的史册。

1986年11月于上海中山医院

沂水县抗日游击第十九中队始末

武善德*

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或七月初，松峰村战前共产党员李玉田通知我到他们村公海关的家里开会。参加这个会的有公海关、孔庆珩、张伯勤、彭士杰、彭吉祥、武继贵、孙星一等。其中孔庆珩、张伯勤、彭士杰、彭吉祥和我都是战前党员。公海关、孙星一当时是不是党员，我不清楚。

会议是由公海关主持的。经他一讲，我才明白这是个拉队伍的预备会。公海关讲话后便带领大家进行宣誓，记得誓词的大意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同生死，共患难”。宣誓后，公海关要求到会的人搞好抗日宣传，动员人们参加抗日队伍。

经过分头工作，到古历九月，队伍拉起来了，名义是沂水县抗日游击第十九中队，负责人是公海关、张伯勤、孙星一。

我参加十九中队时，我正在地主陈建宾家种地、看围子，他家有不少枪枝，我最清楚，张伯勤也知道。“七七”事变后群雄并起，陈建宾参加了善疃武善述拉的一支武装。

*武善德，沂水县朝阳官庄人，曾任沂源县民政局局长，现已离休。

他们是以保枪为目的拉起来的。有一次，陈建宾被刘崇禧请去打刘家山宋地主李文藻的围子，我们就借这个机会，由张伯勤带人，里应外合将陈建宾和他兄弟们的十七支枪搞来了。

到春节时，十九中队大都散了，但枪是不能丢的，我们几位党员就把枪收集起来，又与一中队队长李贯一取得了联系，把枪枝交给了他。

邵德孚出狱后，通过各种途径与战前党员联系。有一次，他派他在狱中发展的党员陈志经去找我，要我帮助省委派来的鲁滨拉队伍。我见了邵德孚，他又将我介绍给鲁滨。接受了邵德孚交代的任务后，我即与张伯勤商讨拉人的办法。张伯勤很有活动能力，由他同我们那一带的党员和抗战积极分子联络，不久就联络了十几人。这时我与张伯勤又去找李贯一商量要枪，李贯一是个顾大局的人，就把我们交给他的枪原数给了我们，还送给我们120粒子弹。其后不久，这些人枪都由张伯勤带着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

在去六大队的时候，十九中队的原班人马有一部分经过动员去了，还有一些人没去。农历五月端午前，四支队六大队开到武家洼村，我去找鲁滨，要他吸收公海关的人枪参加四支队六大队。鲁不同意。我又通过冯古峰了解鲁滨的想法和做他的工作，鲁滨终于答应了。这样，十九中队的骨干大部到了四支队六大队，公海关也去了。

（窦宪诺整理）

一九八六年九月

姐妹参军记

于 烈*

一九三八年农历四月，我与邵大爷（德孚）的女儿邵瑞兰，由尹平符带领来到山东人民抗日游击四支队六大队驻地袁家城子，正式成为抗日队伍的一名女战士。有些同志问我：当时，你是怎么毅然决然地要去当兵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说来很简单，因为国难当头，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反侵略的主要手段是武装斗争。若回答我参军的一些具体原因，话就长了。

我生于一九一九年。我成长的年代，正是国内政治腐败，国外帝国主义疯狂对我国侵略的年代；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无产阶级革命进入新时期的年代。当我八岁进沂水女子小学读书时，接触的是几位受新思想熏陶的老师：一位是牟馨斋（共产党员鞠百实的爱人），一位是王玉容（共产党员邵德孚的爱人）、一位是刘瑞徵（刘浩）。她们爱读新书新报，思想活跃，连穿着也与时代的进步合拍。我年龄虽小，在女小上学的时间也不长，却受到她们不小的影响。我在溥霖小学上高小时，有位孟宜之老师讲课很生动，对学生有吸引力，特别是他讲读的一些反封建内容的诗歌，

* 于烈，沂水县人，曾任北京纺织工业部处长，现已离休。

使我感到新鲜，受到启发。当时有条古训叫“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厢”，但我还是偷偷地看了。还有位教地理和数学的于耀如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把当时我国二十四个行省的风俗民情、山川物产讲得如临其境。在讲东三省时他说：我国的版图不全了，二十四省有三个省让日本入侵占了。老师的话点燃了我们心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怒火。另外是尹平符大哥不断地借给我《新生活》等进步书刊，读后心中萌发了向往自由、民主、反封建的思想。

再说家庭原因。我听我爹说他一九二九年经鞠百实大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党组织遭到破坏，失掉了关系，一九三一年重新入党。那时他在沂水城西门里开了一个宜宾客栈，客栈实际是中共沂水县委的交通站。乡间党组织的人来城向县委请示工作，上级党组织的人来巡视指导，都由我爹掩护安排。我爹在“家礼”，城内外的师兄、师弟、师傅、徒弟很多，同时他与县公安局、警备队的许多人关系也很好，所以我爹负责接待的人从没出问题。党组织的一些文件也藏在我家里。有一次见我爹和一个叔叔把一个坛子埋在窗外榆树下，我刚要凑上去看看里面藏的是什么，爹就很威严地对我说：“去门口看着点。”过后，我在桌上发现了一本书，书名不记得了，只记得是马克思的著作。一九三三年春天，来往于我家的人就更多了。这时，有一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有一天，我爹对我说，要杀人了，

你去看看吧。我随着人群出了城西门，在西门外，看到了被国民党沂水县政府枪毙的一些人的尸体。回到家我把陈尸荒郊的情况对爹说了，爹表情沉重，没说什么。过后，县委交代我父亲设法将被害人的遗体掩埋了。父亲一出面，我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或志士仁人了。他们是什么被害的？这年五月，我爹和邵大爷他们也被国民党沂水县政府逮捕。我爹被捕后押在沂水县看守所时，仍与狱外的同志保持着联系。竹篮村有位叫吴文泉的人常到我家去，差不多是每隔一星期左右就去一趟。他到我家后就进爹爹住的屋，他临走总要问我一句：“去看大叔了吗？”我到看守所送饭，送东西，爹也每每问我：“你吴大哥去过了吗？”我不知道问话的含义，只是给他们传传。但我知道吴大哥同村有个葛德孚是位党员，我爹被捕前常到我家去。这位吴大哥是否与他有联系，受他的指示，在从事什么活动呢？总之，通过我父亲和在家庭里耳闻目睹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

一九三六年底，我在老师、同学、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读完师范讲习所二年的课程就要毕业了。可国民党沂水县教育局又将我们这一期改为中学，要延长一年才毕业，我们的学习地点也由县衙门附近的考棚迁到了南会馆。这时，社会上混乱动荡，学校里也乌烟瘴气，国民党乘机在青年学生中组织什么“学行社”。“学行社”的活动是背着我的，因为他们知道我爹是因为共产党被捕的。学校叫他们一揽，课是不能上了，我便怀着苦闷的心情回了家。

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

潮。在沂水，一区乡农学校校长、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很有声望的李贯一发起成立了沂水县抗敌后援会，我便参加了该抗日救亡组织的工作。我的老师和同学如刘立瑾、毛彩琴、孙淑清、刘淑琴等参与了该会的工作。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在集市、街头宣传，二是搞募捐。协会搞了些宣传材料，晚上回家看看、背背，白天到街头讲。讲的主要内容是日军大规模侵华，平津危机，华北危机，整个中华民族到了生死的关头，而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的政策等，号召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起来抗战。讲演前还一遍又一遍地唱《放下你的鞭子》中的插曲《九一八小调》。募捐是由一些青年学生分组分头进行的。记得我与刘淑琴还有两名男的为一组，到了一些铺号里，我们就讲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后方的父老要捐些钱物支援前线将士。有些铺号，如“同协永”“义盛昌”、“保和堂”等不错，能拿出几块大洋。有的就看不起我们，“小妮子，懂什么，回家吧！”有时我们见他们不拿钱也不拿物就赖着不走，他们只好扔出几个铜子，“同兴永”就是这样。我在沂水抗敌后援会一直工作到日军飞机轰炸沂水城。

一九三七年底，邵德孚出狱。在这之前，李贯一、我爹已与关在沂水监狱中的邵大爷取得了联系，开始在他的指导下从事抗日工作。邵大爷出狱并与省委接上关系后，沂水县的抗日工作有了统一的和有利的领导。而我这时也直接得到了邵大爷的教诲。

一九三七年，邵大爷几经转折，回到沂水监狱。他把我与他的女儿邵瑞兰叫到狱中，教导我们好好学习。此后一段

时间内，我们定时到牢房，他在铁窗内，我俩在窗外，他教我们新文字。前辈对生活的坚定信念给我们以启迪。日军飞机轰炸沂水城后，城里人都搬到乡下。我爹在邵大爷的领导下，到各乡发动群众，组织青壮年参加抗日游击队。我家也开始逃难生活，第一站到了大埠岭，第二站到了匡庄，第三站到胡家庄，最后到后马荒村邵大爷家。这不是普通的家，确切地说是个联络站。有个叫李芳芬的常在他家。还有一位外地人，园脸，白白的，胖胖的，邵大娘让我和邵瑞兰叫他大哥，邵大爷让我们叫他老师。晚上，周围村的一些人和乡下赶来的人常常聚到邵大爷家，邵大爷和那个外地人就给他们上课或讲些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主要是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鼓舞青年学生奋起抗日救国。有时邵大娘拉着我与邵瑞兰到他们集会的屋子的窗户外边偷听，还轻轻戳破窗纸往里看，我看到后马荒高复隆、高复运弟兄们常在聚会的人群里。

邵大爷有空闲时，常把我与邵瑞兰叫到跟前，给我们讲故事，读古诗，他给我讲过的诗歌，有的至今我能背诵。有一首《蚕妇》诗是这样的：“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有时邵大爷也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讲抗战的形势。

我们一直在邵大爷家住到农历三月。这期间，经邵大爷和那位外地人的联络、宣传、组织，一支抗日武装已经建立起来，有许多青年都到队伍中去了。我弟弟和邵大爷的小儿子在马荒和周围的村组织儿童团，我仍呆在家里，心里有些着急了。我与邵瑞兰商量要找邵大爷要求参军，她也同

意。但找到邵大爷一讲，他说：“别急，时机不成熟，再急也走不成。”邵大爷叫我们等待时机，我想有两层意思，一是邵大娘就这一个宝贝闺女，是不大愿意叫她离开自己的，再说她的大儿子邵恩泽也参军了。邵大爷可能要做一做大娘的工作；二是，要看看部队的发展与需要。三月底的一天，尹平符来到邵大爷家，是邵大爷请他去的还是部队派他去的，不得而知。过了几天，约是四月初，就由他领我们到了袁家城子。

我记得我们参加的部队对外叫莒沂大队，后来改编成二支队。来到这里，当天就见到了其他几位刚参军的女同志，她们是孙淑清、毛彩琴、刘瑞贞、刘立瑾、刘立平、王琢和一位姓董的。孙淑清、毛彩琴是沂水城人，刘立瑾是埠前庄人，她们都是先于我在师范讲习所毕业的；刘瑞微也是沂水城里人，是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她们都是我的老师，有的教过我，有的没有直接教过我。刘立平似乎和刘立瑾同村，王琢和那位姓董的我记不得是哪个村的了。这就是莒沂大队的第一批女战士。

我们见面的第一件事是由刘立瑾等提议改名，我们也无异议。刘立瑾说我很老实、很文静，要改个轰轰烈烈的名字，于是她给我改为于烈。她还给邵瑞兰改名为邵英。孙淑清自己改名为孙涛，毛彩琴自己改名叫毛虹。刘瑞贞改名为刘浩。王琢也是那时改的名字，原来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刘立瑾自己改名为刘曦。

在袁家城子主要是整顿、训练，没做什么工作。大约住了一个月，然后移防莒县，莒沂大队改为二支队了。往莒县

开时，刘曦、王琢没有随队。到莒县后，我们这伙女战士编入支队民运队的宣传队，任务是宣传、组织群众，到农村、集市上演讲、唱歌，到城外出身好的农民家谈话，组织自卫团。在莒县驻防时，我与邵英很少讲演，但到日照时，经过实践锻炼，我们俩也能讲了，只是不象她们那样洋洋大篇。就这样，我们在岳家沟、大店、十字路和日照的西北部住到当年初冬。

约是农历十月，邵大爷到部队去了，他对民运队负责人说：“邵英、于烈年轻幼稚，叫她们去学习学习吧！”于是，经邵大爷介绍，我与邵英到设在岸堤的抗日军政学校受训。

在岸堤学习期间，我到我师范讲习所的同学刘淑琴家玩了两次，和她谈了部队的的生活，想动员她也出来参加抗战。淑琴是愿意出来的，可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不同意。待我们学了三、四个月，结业要离开岸堤时，我又到了刘淑琴家，刘拉着我非要跟我走不行，而她家大娘，一手拉她女儿，一手往外推我。见此情景，我心里也犹豫了，就对刘淑琴说：“今天就别走了，等说服了大娘后再说。”刘淑琴跟我们走的决心很大，虽说母亲又哭又骂，她还是跟着我与邵英走了。刘淑琴出来后，她母亲又到她工作的单位叫了三趟，还对我说些难听的话，但刘淑琴死也不回去。我也在一旁劝说：出来抗战，不当亡国奴，是光荣的；日本人奸淫烧杀，无恶不做，你闺女在家也不一定能保住。大娘见女儿执意不回，也就算了。刘淑琴参军后改名刘欣。

我从干校毕业，和邵英又进了山东省委机要科学习译

电。学习结束，我们三个人被分配到《大众日报》社做译电工作。这时大众日报社长是于寄愚。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三个收报员一个叫李川，一个叫卢光，还有位姓赵的，外号叫“老道”，名字失记。沂水的安然、刘成述也在我们这个部门工作。十二月，我经汪玉介绍、邵英经赵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初冬，王涛和一大批干部由延安派来山东。这次他从延安带来了光华给我的照片，要我与光华取得联系。一九四〇年一月，我随一批去延安的干部离开山东，经三个月余的跋涉到达冀南，与在那里工作的王光华会面并结婚。我在山东工作的经历也到此为止。

和我一起参军的姐妹大都健在。只是邵英在四十年代，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最复杂的时候，她积劳成疾，因肺病去逝。自抗战初期到我离开山东之前，我们是朝夕相处，至今我还深深地怀念她。

（蹇宪诺整理）

一九八六年七月

我八路军在沂水县组建发展 及其斗争情况

张 洪 轩*

根据沂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同志们的要求，我与刘诚元、冯国恩两同志对抗战时期我军在沂水县组建、发展斗争情况共同进行了回忆。由于其中的线索很乱，地方武装和军队之间又互相穿插，只好按时间为序，将许多材料理顺一下，以供参考。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热潮十分高涨的时候，我参加了地方抗日游击队。本年十月，沂水方面的部队由三个部分组成：

1. 二、七区以李道德、秦海村、李纯德、李清河等同志为主组织的一部分武装约二百多人。

2. 三、四、八区以耿启明、张绍武、耿迪甫（都是党员）等同志发动组织的“李洪殿中队”，人数百人左右。

3. 一、六区以李怀德、李子荣、孔楚白等同志为首发动组织的“抗日志愿队”，一百多人。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们游击队集合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

* 张洪轩，沂源县李家沟人，曾任烟台警备区六师后勤部部长，已离休。

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大队长是鲁滨同志，邵德孚同志任副政委^①，李仲林同志是政治处主任。我当时在一中队当政治战士。一中队队长是李子荣同志，指导员是孔楚白。这年四月间，沂水二区、三区区委成立，二区区委书记是陈朋同志，三区区委书记是耿启明同志。当时还没有区政府，也没有区中队。

一九三八年五至六月间，四支队六大队队长鲁滨同志，副政委邵德孚同志相继调走，大队长由罗绩伟同志担任，政委由杨坤同志担任，副大队长是吴昆同志。这三位同志都是红军干部。六月以后，六大队升编，改为二支队。司令员罗绩伟、政委杨坤（吴瑞林）、副司令员吴昆、政治部主任李仲林。支队当时力量较弱，下面没有设营。七月，我们在歇官庄与地方土顽车子亮部进行战斗，我方投入兵力三、四个连，有伤无亡。另外还进行过三界首战斗，与刘建一（维持会长，地方势力）作战，活捉了刘建一，缴获其全部枪支弹药。这两次战斗，使我们部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武装得到壮大，部队迅速发展起来，成立了一营、二营和特务连。支队司令员改由刘涌担任，政委由景晓村担任。杨坤调到四大队。政治部主任李仲林。一营长罗绩伟，教导员李焕；二营长吴昆，教导员李怀德；特务连连长李道德，指导员李清河。这时，我到日照县参加独立营的组建，营长是丁景文，教导员主继先。我任指导员，邵景振任连长。二支队在八月份打了甘霖战斗（我在日照未参加），缴获土匪汉奸

^① 《邵德孚自传》自记为教导员——编者注。

武装部分枪弹和许多衣物，取得了又一次胜利。十月初，我从日照县调回，组建二支队三营，营长高志明，教导员马万杰（现在上海），副营长朱世德（红军干部，现在合肥）。我任三营七连指导员，丁桂林任连长。几天以后，李仲林调鲁东南特委，徐滨洲接任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十月，我们在小房前与胡大潮作战，缴获了他们的全部枪支弹药，并得大宗钱钞。十一月又进行了瓦店战斗，打日寇和刘桂棠部，司令员刘涌同志亲自指挥。第一次是偷袭，毙敌几十人，缴获八支驳壳枪，我无伤亡。第二次是在夜间强攻，我们两个营的六个连队全部投入战斗，刘桂棠及其马队跑掉，拂晓我部撤出阵地。我方伤亡较大。一九三九年一月，在下河城战斗中二支队的三个营又受到很大损失，连长李子荣等许多同志牺牲。四月，组织上调我到山东干校政治队学习。当时政治队长是朱新华，指导员是刘端（现在上海）。学习三个月后，分配到山东指挥部特务团，团长是陆升勋，政委王云升。一营长杨万兴，二营长吴奎文，三营长刘怀文。一九三九年麦季敌人“扫荡”，我山东指挥部在沂水县二区下渡峪遭到袭击，特务团受到损失。山东指挥部改驻大诸葛时，特务团进行了合编，编为一支队后防司令部（简称一支后方），副司令员是陆升勋，政委王继元，政治部主任李建梓，参谋主任吴奎文。下设供给处、卫生处、教导队、游击大队和三个特务中队。还有一个小被服厂和一个小兵工厂。供给处长是冯洛之，卫生处是冯芝廷。当时一支队还有前防司令部，由马保三，钱钧等人负责。他们的部队较多，有几个主力团。

一九三九年七月，沂水二区民主政府和区中队成立，区长是王卓然、兼区中队队长，指导员是王道全。还有个姓孙的副中队长，是个学生，因他企图投敌，被枪毙了。区中队一分队队长徐元俊，政治战士牛振东，二分队队长王元俊（后因投敌被我方枪毙），政治战士刘诚元。

一九三九年八月，特务团三营营长刘怀文同志调到沂北^①成立沂北大队，我一同去了沂水三区。三区区政府和区中队正在组建，区长是耿迪甫，副区长丁文祥，区中队队长由耿迪甫同志兼任，我任指导员，副中队长是张志惠。当时我到过县大队，大队长刘怀文，教导员郑斌，总支书记李沾吾。

一九三九年底，组织上确定我到抗大学习，由岳奎接替我的职务。这时张志惠同志有病，组织上想让岳奎当区中队队长，他不干，一九四〇年春节过后，被上级调走。中队缺少领导，所以，我上抗大学习推迟到四〇年九月才去的。

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支队后方陆副司令、王政委率领机关和特务二连、教导队、被服厂、兵工厂从山东临朐县三岔店出发，经半月余的行军到达沂水县南部马牧池地区活动。一支队后方的其余部分编到了一支队前方。部队到达沂水南部后即改为山东纵队沂蒙支队，副司令员陆升勋，政委王继元，参谋主任吴奎文，政治部主任李建梓，供给部长冯洛之（现在总后勤部任职），卫生部长冯芝廷。

^① 沂北，当时对外仍称沂水县。与一九四二年八月建立的沂北行署不是一回事——编者注。

沂蒙支队管辖范围主要是沂水县和蒙阴县的地方武装，是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和指挥方便而设立的。支队下面有三个团：一团主要是原沂水县县大队和部分区中队升级编成的，陆升勋任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原沂水县县大队长刘怀文同志任副团长，政委李志南，政治处主任李焕。二团由蒙阴县一带武装组成，团长杨万兴（是个老红军，曾在山西杨明堡战斗中率一个连消灭日寇二十四架飞机，以后被山东要来编为昆山营），主要活动在蒙阴大崮地区。三团是把泰山地区四支队划归来的，当时主要随支队部在沂南地区活动，很短时间又调到了滨海区（即鲁中老四团，以后的二十六军226团）。一团一营是由沂水二区中队改编的，驻防在沂北卞山和刘家大崮地区。营长赵乐山，教导员王道全，副营长郑东林，副教导员唐建。一连长徐之俊，指导员牛振东；二连副连长邵俊亭，指导员刘伟民，副指导员（支部书记）刘诚元；三连副连长齐怀祥（四一年冬季大扫荡中投敌），指导员陈××（名字失记）。二营驻防在沂水甄家疃一带，三营大概在沂东地区。

支队还以原有的特务二连为基础，组建了一个特务营。该营一连是由原二连改编成的，人员最多，武器也好，是主力；二连是在沂水县代庄组建的新连队；三连是由一个区中队改编的，划归特务营后不几天就跑了。

一九四〇年四月，沂水三区中队队长改由刘公岩同志担任，指导员是刘廷珍。我到抗大学习，九月离开了区中队。在抗大学习时校长是周纯全，政委是李培南。

一九四〇年春季，沂蒙支队在沂水南部山区驻防，根据

地很小，日寇经常对我“扫荡”。军队和老百姓没有粮吃，只能用野菜树叶充饥。当时我军四面受敌，战斗十分频繁。南部有王洪九和刘口萱部，北面有郑小隐、许树声和武家生的顽固派。以沂水城为中心，武家洼、葛庄、东里店、凤凰头、黄山铺、黄庄、斜午等地都驻有日寇和汉奸牛先元部。铜井和汤头等地也有日寇和伪军盘踞。还有侍郎宅、李家宅子、垛庄等地的反动地主武装。国民党五十一军的684、685、686团只吃军粮不抗日，专同我们八路军作对。我们沂蒙支队成立后，首先消灭了盘踞在水塘固的郑小隐部，接着又消灭了驻在南墙峪挡阳村山上大刀会的张恒志部。二团攻打垛庄没有成功，杨万兴团长牺牲了，全团伤亡很大。二团和特务营配合兄弟部队进行了沂临边战斗，攻占了汪团，全歼伪军二百多人，缴获很多步枪，一挺机枪。侍郎宅、李家宅子当时我们都攻打过，但没有打开。经过激烈艰苦的战斗，我们扩大了根据地，部队也壮大起来，活动范围发展到芦山前的垛庄周围，还可以到沂水胡同峪和姚店子一带活动。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对我上述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我武装部队损失不大，但地方政府和群众组织遭到严重摧残。沂水三区区中队损失很大。一九四一年沂水三区区中队重新组建，于星德担任队长，梁作信担任指导员。

一九四一年，反“扫荡”之后，我沂蒙支队改番号为一支队。因此，沂蒙支队和常提到的一支一团中的一支队是直接的延续关系。一支队下属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三团已调到滨海），司令员是胡奇才，政委王一乐，副司令员陆升勋，

政治部主任李建伟。参谋主任吴奎文和供给部冯部长去延安学习。新的供给部长姓潘（是个红军），卫生部长冯芝廷。一团团长由陆升勋副司令员兼任，政委李志南，副团长刘怀文，政治处主任李贯一。一团一营主要活动在卞山刘家大崮地区，二营随团部在沂水胡崖等地活动，三营是在敌人“扫荡”后由大崮独立团改编的。支队部率特务营活动在东四堡、西四堡、鲁家庄、甄家疃一带，有时也到四门洞、四家泉一带活动。

一支队组建后，我一团一部在沂水胡家庄与日寇展开一次激战，毙敌二十余人，缴获机枪一挺，活捉日本兵一名。除此，主要是与顽固派作战。几个月后，山东纵队和一纵合编成立山东军区。军区下设胶东、渤海、滨海、鲁中、鲁南等军区。鲁中军区下面又设几个军分区：一分区为泰山区，二分区为沂蒙区。从此，一支一团又叫二军分区一团。主要活动在沂水北部和中部地区，与日寇、汉奸、顽军进行“三角”斗争。

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我抗大学习结业，分配到临沂沂水四县边联，在边联大队里任连指导员。大队长是陈子美。这年秋季，国民党五十一军的顽固派680团、684团伙同汉奸武喊生、刘瘦岑、土匪头子刘桂棠部等，分多路向我沂水县下里庄崔家峪等中心根据地进攻，妄图占我一团固守的瓦屋山、牛家坪、青石坊等地，包围了我晏婴崮，攻我大顶子山。我鲁中军区部队开始了反顽战役。参加战役的有我鲁中主力老一团、老二团、山东军区青年团、还有我二分区的一团和特务营。经过十几天的激战，我们取得了反顽战役的

的胜利，失地全部收复。

一九四一年十月间，日寇调集五万多人向我鲁中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我所在的大队全力拼搏，损失很大，全连仅剩下一个班。在一次突围中，我被敌马踏伤，住进医院。这时，沂水三区中队也遭到很大损失，重新进行了组建，队长于星德，指导员梁作信。

敌人大“扫荡”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军分区一团（一支一团）在沂水下胡同峪重新组建，团长刘玉泉，政委李志南，政治处主任李焕。九月后政委改换王锐，政治处主任改换张盛福，刘怀文副团长调到抗大学习。由于我营损失严重，只剩下我们连队，所以这次建团没有能组织成营，全团共有四、五个连队。一连长缺，副连长邵俊廷，指导员是我，副指导员刘诚元；二连连长孔宪文。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几个团联合进攻胡同峪、刘家大崮一带，我主力部队前来增援，分区司令吴瑞林亲自指挥，经过激战，在沂北刘家河北一带消灭了国民党五十一军顽固派684团全部。

一九四二年九月，在沂北下华庄一带再次组建二分区一团（一支一团），团长刘玉泉，政委王锐，政治处主任张盛福。一营长马勋臣，教导员常贯均；二营长彭玉龙，教导员唐健；欠三营。一连长徐元俊，指导员牛振东；二连长缺，副连长邵俊亭，指导员是我，副指导员刘诚元；三连连长孔宪文，副指导员史强。

重新建团不久，一九四二年十月对崮山战斗中我方损失很大，牺牲了许多同志。战后将突围出来的部分部队收整，在武将峪村组建了沂水独立营，营长彭玉龙，政委魏伯

亭。一连长王中，指导员袁俊丰；二连长高玉进；指导员马敏，副指导员刘诚元（我当时到沂北县大队领兵补充连队，“扫荡”中没能回原部队）；三连长姓杨，是个大个子；指导员姓刘，副指导员徐庆明。建营后，一连坚守卞山，营部带二、三连在山下打游击。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沂水独立营改编为十二团三营，我在五连任指导员。一九四三年国民党五十一军南下时，我连与他们的一个加强连作战，取得了全胜，缴获了许多枪枝弹药。此后，我连队的武器大都换成了钢枪。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忆沂水县军民与敌伪顽的斗争情况

张 之 明

(一)

日寇于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第一次侵占沂水，血洗了上、下峪子两村，抢掠二十余天即南撤了。日寇第二次侵占沂水是一九三九年农历五月，即麦季大“扫荡”。当时来沂水的日寇是少铃队，据说它是坂垣师团残部。该部占领沂水城后，控制了沂水境内主要交通要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部调走，来沂水接防的多系新兵）。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开始，日寇沿交通线安据点：从沂城向北，有高桥、沭水、马站据点；向南有斜午、苏村、孙家庄、河阳、葛沟等据点；向西是黄山铺、朱位（从王庄迁去的）等据点；东有满堂坡、四十里、三十里、莒县等据点；西北是葛庄、东里店等据点。控制上述据点的多是日本人，少量是由汉奸控制的。日寇常驻沂水城的兵力是一个中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时有增减。

日寇在沂水的特务组织：一九四一年以前有“青岛宪兵队沂水派遣组”。后在沂水设了武装工作队即红部。红部里日本人只有三五名，头目称伍长，先是佐藤，后是神头甲一。另有几个朝鲜人。翻译是中国人。秘书是沂水城的张廷

栋。这个特务组织中，日寇虽然不多，但他们却招纳了一些地痞、流氓、叛徒，组成了几个所谓工作队：

①刘启全队——刘是沂水城人，剃头匠出身。该队有三十余人。

②隗吉华队——据说隗曾干过游击队。我军打沂水城时，没抓到他，他潜入湖埠西，从他老婆牛衍芬那里逃掉。

③武京山队——武是武家洼人，原为我一区区中队排长，一九四一年大“扫荡”时，叛变投敌，死心塌地地效忠日寇，血债很多。

④朱宝龙队——朱是沂源县人，原为我部队侦察员，带枪投敌。该队有二十余人，一九四三年反正后，又叛变投敌，朱被我击毙。

⑤张玉爽队——张是黄山铺南岳庄人，反动地主。他是红部驻黄山工作队的队长，兼黄山乡伪乡长。解放沂城时被活捉。

⑥郝××队——郝是龙家圈人，兵痞出身。该队刚组织时，只有七八个人，是日寇的便衣特务，常驻黄山。在黄山铺集上，郝被我击毙，他的队伍遂即垮掉。

⑦王建民队——王原系我敌工股股长，四一年日寇大扫荡期间投敌。该队仅有七八个人。王在岳庄张射东家娶妻时，被我捕获处决。

⑧在刘家店子还住了一个队，人数不多，队长名子失记。

以上这伙伪军，不属敌伪政府，不吃军饷，每人每月只发小麦六十斤。其实，这六十斤小麦也没有去领的，他们穷

凶极恶，专靠抢掠维生。他们搜集我方情报，抓捕抗日干群，手段最毒。他们杀人如麻，而且极其秘密，活埋、喂洋狗、刺刀穿，全在夜里进行，对外佯称发了“满洲国”。

以上是明火执仗的特务。此外，还有披着外衣的特务和特务组织：

①佛教会——这个反动道会是王德武（城里人）一手搞的。王是日寇华北道派到沂水的高级特务，日寇驻沂水的头目对王的身份是很清楚的，而一般人不了解。沂水的情报，包括日本人内部的情报，都由王控制。他搞的情报直接送北平。解放沂城时，王被我捕获处决。

②三番子——这是牛耀锡（沂水县田庄人）组织的，名叫“安清道义会”。它以“青帮”为名，网罗势力，进行奴化教育，并在伪军政人员中活动，为日寇侵略服务。解放莒县城时，被我俘获枪决。

③冈村宁茨班——是华北道派到沂水的特务组织。

④水源清——日本人，职业特务，是华北道特务机关所属人员之一。据说他十八岁就在抚顺当特务，后被派到沂水。他冒充日本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办“慈善事业”，并声称反对日本侵华战争。他在大安周围搞了个什么“实验区”，日寇“扫荡”不到“实验区”里去，以致有些我方干群在环境恶化时到那里隐蔽。他的伪装言行，充分表现了作为战略特务的欺骗性与狡诈性。尔后，我党中央查清了水源清的来历，将其逮捕，一九四三年处决。

⑤日寇在济南的特务组织鲁林公馆和朝阳公馆，也向沂水派遣特务。鲁林公馆派来沂水的是刘南宅的刘中实。刘在

解放沂水城时被俘。

另外，日寇在沂水进行奴教育的组织，开始有宣抚班，以后有新民会。它是由日本顾问直接管理的。通过办教育、搞文化、文艺活动等手段，进行“东亚共荣”、“中日亲善”等欺骗宣传。新民会笼络的是一部分失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日寇在沂水进行经济掠夺的机关是洋行。洋行由福田为首的五六人主持，从地方上招纳一些奸商为他服务，专门掠夺我们的花生米、花生油、粮食和蔬菜等，运往日本。这是日寇“以战养战”政策的具体执行者。

沂水县的伪政府是“沂水县公署”。县长是牛先元。牛是葛子铺人，曾参加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回山东后，在聊城地区某县当金库主任。抗日战争开始，他携款逃跑，回到沂水，和湖埠西的田振中组织二十一梯队，共有四五十人，田为司令，牛为副司令，活动于沂源、莱芜的交界处。一九三九年夏，日寇侵占沂城后，牛将田打死，投靠日寇。接着，网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五十一军也整排整连地投到牛部。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县大队以范鲁生为首投牛，牛的汉奸武装于是膨胀起来。牛将上述武装编为伪县公署警备大队，后来叫保安队，牛兼大队长。大队副有朱士元、王福盛、范鲁生。其队伍最多时有十五个中队，一千多人。解放沂城时有八个中队。我记得中队长有：一中队队长王京玉（城里人），二中队队长李子谦（沂源县人），八中队队长李相亭，三中队队副胡鲁臣。伪保安队有个谍报队，专搞军事情报。可是，被我们派进去的共产党员王叔和（城里人，现在南京石膏厂工作）所控制，一有动静，我们就会马上得悉。

县以下的伪政权是区、乡、保、甲。区里的武装有区丁，乡里有乡丁。此外，每区都从县保安大队派一个中队撑腰。在伪政权建立以前，日寇搞维持会，沂水县维持会会长是王子贵，这一伪组织笼络了一些上层人士接待日寇。

日寇为了维持他们在各地的统治，还设立了警察所。所长下边设情报、治安、户籍、特务四个系。系有系长，系长下边设巡官、警长、警士。警察所在沂城四门设了四个派出所，专门检查行人。警察所在孙家庄据点设了警察分所，搞“强化治安”的《良民证》，就是警察所发的。

另一支汉奸武装，其头目是四区朱位武或生与夏蔚反动地主谭克千。武的父亲曾在我们举办的训练班学习过，是“耆老队”的学员。抗战开始，武或生在夏蔚一带组织自卫团。五十一军驻防沂水后，武想在八路军与五十一军两者之间靠一头，谭力主靠五十一军。武为改编事去五十一军（驻王家庄子）联系。正在这时，我四区区委书记李松同志察觉了武的动摇，亲自到朱位说服武坚持抗战。李松同志一到朱位即遭到谭的毒手，惨遭杀害。从此，武便死心塌地地当了汉奸，在沂蒙交界处（盘踞朱位一带）乌合了一支汉奸队——沂蒙队。后来，武将王庄据点的日寇请驻朱位。这支汉奸武装，一九四二年被我军赶至沂源后，又投靠了吴化文部，一九四四年在沂源悦庄被歼。这是一支非常反动、非常野蛮的汉奸武装，杀害了大量抗日干群。

沂城东是日寇、汉奸、土匪三位一体的敌占区，有孟玉卿的汉奸队，有刘志仁、马章麟、张元英等股土匪。这个地区，我们的工作是很难作的。刘志仁是院上村人，兵痞出

身。日寇侵占沂水后，他是汉奸“车子队”（自行车）成员之一。一九四一年被金翻译（朝鲜人）下了枪，他跑出来，声称抗日，借了木村的一支枪，组织武装。后来人多枪多，即当了土匪。一九四四年解放沂城后，我莒沂县将刘部收编，任命刘为雪山区中队队长。收编后他一直托病在家，表现不好。莒沂县再去叫他时，他跑到安邱投了王敬斋。王委他为国民党沂水县政府特务大队先遣小组组长。他带着一伙人回到沂水，专做特务工作。一九四六年八月策划大窑村叛乱事件，杀死我城郊区武装干事张文松与三位民兵同志。马章麟是石山官庄人，解放战争时是国民党沂水县政府特务二大队队长。

（二）

日寇对蒙山区的扫荡，最残酷的是一九四一、四二两年的秋季大“扫荡”。

一九四〇年春，日寇“扫荡”重点是沂南。在这次“扫荡”中，我主力部队在孙祖、铁峪等地给敌人以严重打击。秋，日寇对鼻子山“扫荡”，也遭我军痛击。

一九四一年的“扫荡”，是在我反顽斗争正顺利推进时开始的。日寇集中了精锐部队五万余人，对临沂以北、沂城以西、蒙阴以东的地区进行了残酷“扫荡”。其战术是铁壁合围，坐地清剿。其兵力来势迅速，仅两天的时间，这片地区的大小山头与大部分村庄即被占领。日寇占领这一大片后，遂即进行反复清剿，一处枪响，四面集中。此时，山东分局转移到莒南，留在沂蒙地区的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敌人的行动是夜晚固守村庄，不

敢行动。我们晚上活动，采取“敌住我扰”的战术，打击敌人；白天跟敌人转山头。日寇在“扫荡”中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扫荡”的高峰期达二十余天。“扫荡”期间增设了铜井、袁家城子、匡庄、凤凰头、道托、松峰、青驼、垛庄等据点，对我根据地进行了封锁、包围、蚕食。这时，国民党部队投敌的很多。

在这种形势面前，我们的处境虽然很困难，但“扫荡”过去，通过整顿，二十天后我军即开始了对敌反击。这次反击，解放了黄家坡子、袁家城子、铜井和松峰。根据地周围伪政权也全部被我摧垮，迫使敌人龟缩在沂城和沿交通线的据点里。由于我们迅速加强了组织整顿和对敌反击，根据地的局面很快得到恢复。

一九四二年的“扫荡”是农历九月开始的。日寇调集了一万余人，还有汪精卫的皇协军（伪军）参加。这次“扫荡”，敌人采取的是拉网战术，在短促的时间里，从沂水、蒙阴、临沂等地出动，沿沂水至葛沟的这段青沂路往西拉，沿沂水至蒙阴旧寨的泰石路往南拉，从蒙阴的旧寨、铁城往东拉，南北七八十里，东西百多里，敌人几乎膀挨膀的向当中赶。这时我们的部队、机关，还有原国民党五十七军起义的一部分部队共约五六千人被敌人拉到南墙峪（今院东头乡）一带，最后我们退到旋崮顶上。日寇用飞机投弹，用大炮猛攻，最后只剩下旋崮顶的三个山头，周围仅有四五华里。我们一直坚持到天黑。尔后，敌人在山周围点上了一堆堆的大火，企图围困到第二天，将我部聚歼。就在这个紧急时刻，我们于晚上十点组织突围，大部分突了出来。五十七军起义部队的侯

团长在突围中牺牲。

敌人拉完南沂蒙后，即向北撤，部署拉北沂蒙。它们从高桥、沐水、马站向西北拉，从东里店据点向南拉。这时，山东分局机关、一支一团的一部分、鲁中军区青年营、沂北工委机关与沂北大队等单位都转移到瓜峪附近的毫山，敌人追随之来，我们又转移到对崮峪一带，在这里遭到敌人的袭击，我军上了对崮山。这时退到山上的还有国民党五十一军一部。为了掩护领导机关安全转移，我青年营奉命守崮。敌人组织了几次重火力冲锋，均被我击溃。最后，我青年营只剩下营长严雨霖等几个同志。眼看敌人攻上山来，我们的同志最后跳下悬崖逃出。在这次反“扫荡”中，黎玉同志负伤，二地委组织部长潘维周同志牺牲。敌人也遭到重大伤亡，拖尸而回，结束了“扫荡”。

一九四三年之后，敌人总的形势趋向下坡。虽有“扫荡”，但投入的力量也小了，“扫荡”范围也不大了。春季“扫荡”时，我山纵一旅营长王子固率领的一个连被敌人包围在歪头崮，激战一天，王子固同志和全连干部战士几乎全部牺牲。但也给敌人以重大杀伤。

(三)

我县区地方武装在对敌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除了为主力部队提供兵源外，还直接参战。一九三九年，敌人“扫荡”后，在王庄安了据点。我四区的游击小组经常围着据点给以袭扰，打得敌人不敢露头，迫使敌人把据点迁到朱位，和汉奸队武彘生部互为依靠。一九四〇年秋的一天，我四区区中队埋

伏在垛庄铺，给来往于沂水、朱位之间的鬼子运输队以重大杀伤，击毙敌中队长一名，鬼子数十名。一九四〇年，三区区中队在王峪河口伏击来往于沂水、东里之间的运输队，打得也很成功。二区区中队战斗力很强，他们坚持卞山，与五十一军顽固派和国民党县政府的武装对峙，使顽军不敢轻易向我根据地进犯。

关于反顽战役，进行了多次。一九三九年我们建立民主政权后，国民党顽固派与我们的摩擦公开化。到一九四〇年，卞山以北全被五一军占据。这时，三区区公所搬到刘家大岗，八区撤出来。四区由于武彧生的叛变而恶化，泰石路以北，大部分为敌顽所控制。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搞了一次反投降、反蚕食斗争。一九四一年秋，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顽战役，首先拔除了朱位武彧生的据点，捣毁了武的老巢，然后沿朱位至上位一线向北推进，一直打到驻周家上庄的国民党一一四师师部。

在二区搞了两次反顽、反蚕食斗争。一九四一年敌人“扫荡”时，五十一军将我三区占领。我们于一九四二年春节，组织反击。这次反顽，收复了卞山，打到崖庄。同年八月，又进行了一次反蚕食斗争，收复了沂水县的大部分土地，成立了沂北行署。

一九四三年五十一军南撤后，吴化文部盘踞沂水北部。不断向我进犯，我们进行了三次讨吴战役。第一次是一九四三年春，从纪王固以北，打到梭背岭、八石固以北，收复了东里一带。第二次是在解放沂城之前进行的，我军一直打到鲁村，收复了沂源县的大部。第三次是在解放沂城之后，一直将吴

逐出今沂源县境，打出沂蒙山。讨吴的参战部队是一一五师、山纵、鲁中军区部队。一一五师英雄连长何万祥就是第三次讨吴时在大泉山战斗中牺牲的。

从一九四三年以后，经三次讨吴，我根据地逐渐扩大，沂水县新成立了金星区、东里区等。

(四)

沂水县党组织对敌伪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当时的工作重点是：争取伪军政人员反正；争取伪军政人员为我们工作，提供情报；保护我们的干部、战士；处决死心塌地效忠日寇的汉奸、叛徒。

做敌伪工作的有县委的敌工部、县公安局的便衣班和一些比较坚强的党员。城里的工作多是由徐家洼村的徐庆德来做的，是以铁匠身份做掩护，后被敌人发觉，于一九四二年离开沂水城。徐家洼支部比较坚强，对城里的工作，一直是我们的堡垒村。有一次，红部的头子神头甲一和秘书张廷栋带人到徐家洼清剿，也没有剿出个什么结果来。

争取伪军政人员反正做得比较成功的，在我的记忆中，有以下几个：邢祚光反正一一邢，小杜家庄人，六区伪区长。经我山纵司令部敌工科的具体工作，于一九四一年农历正月初五日凌晨四点二十分，在敌人正鼾睡之际，邢周密布置，把小杜家庄据点的十九名鬼子（原二十名，其中一名卧在尸侧装死、漏网）全部击毙，接着，率部反正。这一事件，在伪军中树立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型，给敌伪以极大震动。

争取小田（田相德）——田，益山人，葛庄据点的便衣队长。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沂水县委组织一部分侦察员打葛庄集，目的是杀掉柴山乡伪乡长刘兴福。这一天，刘没露面，于是打了葛庄据点的便衣队。在打死的人当中，有小田的父亲和哥哥。从此，小田到处杀人，扬言为其父兄报仇。

这时，二军分区做敌伪工作的张春荣，沂水公安局长郭宜春等同志和田联系，做田的工作；并安排李家营一女共产党员与田结婚，将田争取过来，田主动为我工作。一九四三年田带领一部分人反正，参加了八路军。

争取朱宝龙——朱是叛徒。投敌后任红部便衣队队长。经常到道托、高桥、诸葛一带骚扰。经沂水县公安局侦察股长朱北璋（朱宝龙的本家）对他做了工作，一九四三年朱宝龙投到沂北。但不久他又投敌，被我处决。

我们还深入到敌占区建立两面政权。对两面政权办公人员的要求是：“应付敌人，忠实抗日”。这样一来，在所有鬼子据点周围村庄，除沂城外，都能给我们送给养，不送粮就交代金。对于城周围各村的保长，我们也一一给予教育，说明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要应付鬼子，心向抗日，要学习关夫子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气节。这些两面政权，大都还不错，我们一进村，就受到他们保护；敌人的情况，他们也向我们报告。

对于死心塌地的汉奸，我们就坚决镇压，杀一儆百。斜屋保长田六、丰台湖的瞎子、王立子、岔头保长马立安、梅沟子黄均强等效忠日寇的败类，都被我们分别处决了。

(五)

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开始发展到局部战略反攻阶段。是年古历六月二十四日，沂水城解放。

在解放沂水城之前，为了迷惑敌人，我军虚张声势，组织讨吴战役，佯攻鲁村。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突然挥师南下，攻打沂水城。原来侦察沂水城只有二十八个鬼子，加上洋行、红部也不过三十多人。但在战斗打响之后，发觉敌人兵力增加，我们抓到给日本人办饭的俘虏，才知道在战斗打响之前，从莒县来了一汽车鬼子兵，约有一个班，机枪一挺。

这次战斗我方参战部队是鲁中军区的一团、四团和我地方武装。指挥员是罗舜初。我方的部署是：一团打伪军据点，四团打鬼子据点（南围子），并分一个营阻击莒县援敌。战斗打响后的第一晚上，攻开了牛先元汉奸队盘踞的大围子，消灭了大部伪军。但没有抓住牛先元，也没有打下鬼子盘踞的小围子。这时，我军指挥部由东岭迁到回民街，距鬼子据点七百米，指挥重点攻击南围子。第二天过午二时许，活捉伪县长牛先元及朱士元。夜，经过激战，终于打下了鬼子据点，四十多名鬼，被生俘六名（其中有神头和福田），其它全部被击毙。伪军的八个中队，加上警察所和伪政府人员共六百余名全部俘虏。缴获重机枪一挺，迫击炮一门，轻机枪两挺，以及其它战利品。俘虏了牛先元、朱士元、刘启全、王德武这四名罪大恶极的汉奸，在西泉庄公审处决了。神头、福田等鬼子解鲁中军区处理（以后神头跑掉，在上里庄南山被一群众逮获上解）。至此，沂水全境解

放，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军区在姚店河滩召开了祝捷大会。

解放沂城后不久，从淄博经新泰、莱芜王庄来了日寇草野青大队，步兵五百人，配合陈三坎的伪军千余人，企图对我报复。敌人来到沂水一看，城墙和据点均已拆除，我部队早已撤离，扑了空。敌人窜到莒县、莒南疯狂抢掠了一阵，于古历七月十三日路经沂水回窜淄博。

这一敌情，我鲁中军区侦察准确，决心消灭这股敌人，迅速部署了伏击。

敌人来到沂水，分三路西窜：一路日寇步兵三百人，经武家洼、跋山店子奔葛庄；一路日寇二百人，拖着一门山炮，往古城、半城奔李家营；一路是陈三坎的伪军，沿马荒、大埠岭、柳泉北上。三路敌人互为呼应，洋洋得意地行进着，那知一步步进入我伏击阵地了。

我鲁中军区一团，以逸待劳早在馓头岭设伏，当三百鬼子步兵到达葛庄休息时，我伏兵四起，猛烈攻击，三百鬼子全部被歼。另一路鬼子刚刚达李家营村前，遭我一团伏击，当场击毙四五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五人，丢下大炮，爬上无儿崮顶顽抗，被我团团包围。敌人出动飞机空投食品，第三天突围西窜。我缴获山炮一门，炮弹二十余发。再一路陈三坎部，也进入了我一四团，十一团，县大队设在草沟的伏击阵地。遭到打击后，我令其放下武器，但他负隅顽抗。第二天我全力猛击，陈被击毙，伪军大部被歼，残部逃窜。

这次战役，是一次成功的大型伏击战，在山东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从无儿崮逃窜的鬼子，逃到泰安，被我一军分区截击，

全部消灭，又缴获炮弹三百余发。我鲁中军区将缴获这门山炮再加上几门迫击炮成立了一个炮兵团。这门山炮在解放蒙阴、莒县、安邱、高崖等战斗中，发挥了极大威力，被誉为功劳炮。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窦宪诺、孟新农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马家旺事件

与刘克定牺牲的经过

朱迪昭*

一九三九年古历七月间一个夜晚，沂水二区部分干部及区中队，在马家旺村遭到葛庄据点敌人的一次偷袭，区青年委员刘克定牺牲，三名战士被俘。我当时在区中队当战士，是这一事件的亲身经历者。

刘克定，沂水县原二区刘家山宋人，是我姑奶奶的第四子。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就在家乡一带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工作非常热情。当时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四处奔走，积极宣传我党抗日主张。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刘克定到了我家（汤家官庄），他白天到邻村宣传抗日，晚上回来就对我父亲讲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记得他说，现在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抗日，而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国将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美好国家。这些话，也使我受了影响。我就跟着他做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如他在墙上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我就给他帮忙。

*朱迪昭，沂水县高桥镇汤家官庄人，曾任山东省政府第三招待所所长，现已离休。

同年十月，他把我和同村的赵立本介绍到岸堤干校学习。当时，干校设在岸堤村一座大庙里。学员来自各地，工农商学兵都有，男女衣着参差不齐，长袍短褂，西服军装，皮鞋洋袜，土布浅鞋，一应俱全。学习是紧张的。生活的艰苦自不必多说，而纪律却是特别严的。但大家都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精神愉快，情绪高涨。因为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是革命真理，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

学习结束，我返回二区，又跟刘克定做了一段宣传工作。至次年古历四月间，日寇出动数架飞机对国民党省府驻地东里店进行了残酷轰炸，并对沂水进行“扫荡”。东里店成为一片瓦砾，老百姓家破人亡，四处逃难。而国民党省府大员及其地方官吏脚步更快，逃之夭夭了。这时，我党指示各地党的组织，迅速建立民主政权，肩负起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重任。就是在这个时候，二区民主政府和区中队相继建立。刘克定便介绍我到二区区中队当了一名战士。其后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次“扫荡”以后，日寇在葛庄安了据点，日伪军经常出来骚扰。我们二区区中队日夜同敌人周旋，它们进攻，我则退却，它们不动，我则打扰，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瞅准机会便给它一拳，搞得敌人六神不安。而敌人也千方百计企图报复，终于在一天夜里，我们遭到敌人的偷袭。

那是一九三九年七月间一个夜晚，二区干部刘克定等和区中队驻在马家旺村。是夜，朦胧的月光，还能照见人影。月光下，我在村北站第三班岗。约十一点钟，刘克定身背一支七九步枪到了我的岗上，他问是谁站岗，我回答后又问他

来做什么，他说有几个同志到古村抓局（赌博），到现在还没回来，我出来看看。他又接着说，你这班岗大概快到时间了，我替你站一会，你回去叫岗吧。在我起身回去的时候，我指着附近那道栽着许多桑树的地堰对他说，要是有什么情况，你就到那里隐蔽起来，然后再想办法。

我回去一看，计时香快烧完了。这晚带班的班长见我提前回来，认为发生了意外，便有点警觉地问我：“怎么，回来了？”我说刘克定叫我回来叫岗。这句话刚刚说完，突然从村北传来一声枪声。我急忙转身往村北跑去，一看敌人象一群狗一样哈着腰端着刺刀从谷地里围上来了，我连忙开了一枪，紧接投了一枚手榴弹。村里遂即响起紧急集合哨音。我立即回村，当我跑回村里的时候，同志们已经撤到村前一道沟的南边。我急急追上，发现在村西北角站岗的王立玉没有跟上来，当即返回，通知王立玉紧赶队伍。这时敌人已经进村，正在逼问被他们抓住的三个同志，听见那三个同志一齐回答不知道。我和王立玉从旁偷偷溜过，敌人竟没发现，真是侥幸。

我和王立玉急急跑到村前时，就不见队伍的去向了，只好跑上宿山。到了宿山，天就放亮了。我俩脱下褂子把枪包起来带着，到了前山一座庙里，有个和尚告诉我们，他听到一帮人于深夜中向西边去了。我俩于是向西赶去。约下午四点多钟，找到了七八个同志，其中有一位班长。经过一天一夜的奔跑，简直疲劳极了，我便就地坐下休息，这才发现我脚上的鞋子不知什么时候摔掉了，两脚满是血口子，看到鲜血，这才觉得疼痛。班长连忙把他备用的一双鞋给我穿上。

我们接着转移到卞山。到这里才把人逐渐集合起来，进行休整。过了几天，我父亲到卞山看我，他说，马家旺出事以后，他曾去找我，亲眼见到刘克定被杀后的惨状。他还说，那一枪是刘克定打的，要不然你们就被敌人全部捂住了。父亲还告诉我，刘克定是被敌人用刺刀穿死的，他亲眼看到刘克定死后还用双手紧握着自己撕断的两截肠子，这可能是他被杀时或被杀后，在还醒人事的时候，为求速死，自己挣扎着硬硬撕断的。刘克定牺牲后，当地群众给他举行了葬礼，我父亲也参加了。

马家旺事件发生后，我们提高了警惕，并加强了敌情侦察，对隐藏在二区根据地的便衣特务进行清查和镇压。同时密切注视葛庄据点，敌人一出动就给以严厉打击，使敌人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了。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张茂萱整理）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

一九三九年春夏之交我在沂水 西北乡开办党员训练班的情况

刘亚明*

一九三九年三月，我于山东军政干校（驻岸堤）学习结束后，参加了山东分局组织部和宣传部合办的党课教育训练班。开办这个训练班的目的，是在山东党组织大发展的形势下，为了提高广大新党员的政治素质，进行有关党的基础知识教育，使他们逐步明确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分局要求各地委、县委要配备专职的合格的党课教员，专门负责这一工作，以保证党课教育的经常化。这个训练班的培养目标，就是使参加学习的人员成为一个合格的党课教员，分配到各地去落实上述要求。

训练班的地点是在沂水县四区王庄（分局机关所在地）东面的一座小山村中。学习时间半个月。授课人有分局组织部长程照轩，分局组织部干部科长史秀云，分局宣传部宣传科长洪林，分局组织部干事李克俭等同志。学习内容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简史、党的章程、党的纲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怎样做党的支部工作等。三月下旬，学习结

* 刘亚明，贫苦人，抗战时期任沂北工委宣传部长。现任中央戏曲学院党委书记。

束。四月份我被分配到沂水县委任党课教员。大约在五、六月份，我去沂水西北乡开办了三期党员训练班。训练对象是农村党员中有一定文化程度和觉悟水平的同志。学习结束后回到本村组织广大党员进行学习，实际上是充当农村党组织的不脱产的党课教员。学习内容主要是党的基本知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员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也简单地讲一些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和一些领袖人物，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在讲课中还注意联系党员思想实际，如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关系、区别，共产党不是道会门，阶级仇民族恨和个人的关系、区别，等等。教材是我根据在分局训练班学习时的听课笔记略加综合整理而成的，油印若干份发给他们。

第一期地点是在二区埠前村办的，召集人和班的总务工作负责人是李纯德同志，人数十人左右。第二期是在三区尹家峪办的，由驻该村的山东纵队后方医院提供食宿条件，人数十人左右。第三期是在三区佃坪办的，学员只有二人，是房干和张利一同志。联系人是当时三区的总支书记耿中奎。三期均在一九三九年六月日寇大“扫荡”之前办的。六月以后，环境动荡，县委改选，沂南中心区委成立，我到中心区委担任宣传委员，从此这个党员训练班不由我负责举办了。

这几期训练班，对于参加学习的一些新党员的共产主义

觉悟的提高，对于他们日后在党的培养下不断成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时间紧，特别是我本人缺乏起码的党的思想工作经验（我是第一次参加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讲课中对原理讲得不够透彻，联系实际不够深入，这也限制了训练班的教育效果。

一九八六年八月四日

抗日战争时期

在沂蒙地区沂水县一段工作的回忆

王林岗（郝心昌）*

（一）

我于一九三九年底离开中共淄博特委到沂水县委任组织部长。我到沂水的时候，沂水县委驻在卞山。卞山是那样的巍峨，周围是峭壁悬崖，山顶却十分宽广平坦，居住着几十户人家。每天早晨，鸡鸣声此起彼伏，给人一种异常清新而又生机勃勃的感觉。在战争年代的紧张气氛中，身处此境，的确使人有一种难得的舒适之感。

到了这里，沂水县委书记王翰卿同志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县委宣传部长刘滋泉同志一见到了我就十分爽朗地说：“我们正盼着你来，你终于来了！”接着他们把县委机关的同志一一向我作了介绍。现在尚能记得姓名的有：李道德、阎娟（女）、杨琳、耿启明、张伟华、吴畏（女）、杨×、颜××等同志。

我到沂水县委之后，第一个感觉是，在当时的沂蒙山区，

* 王林岗原名郝心昌，江苏省沛县郝寨村人，曾任贵州省民族委员会主任、兼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现任贵州省政协常委。

象沂水县委在组织上这样完备的还为数不多。在我到沂水之前，我曾到过邻县安邱和临朐，当时那里不仅没有我党领导的民主政权，而党组织还处于秘密状态。虽然在八支队的协助下，那里曾一度建立起一些抗日武装；但当八支队转移离开该地后，那些本就数量不多的武装也只得撤离地方，跟四支队二大队一起行动。我也知道，蒙阴县委此刻已经组成，但其根据地规模较小。而这时的沂水县，抗日根据地比较广阔，从县到区到乡，民主政权都已组成，人民群众抗战热情很高，对于我党领导抗战，信心很足。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见到县委的邵德孚同志。多年的地下党的艰苦生活，和非人的监狱生活，使他与同龄人相比显得苍老，虽然他只不过大我几岁。我们以前曾经见过一面。那是一九三八年冬季，中共淄博特委组织部长杨纯同志派我去莒县招贤镇找二支队政委景晓村同志，为临朐县党组织接关系，途径沂水城，在八路军驻沂水办事处住了一宿，见过邵德孚。现在我们又见面了，并且一起工作，故而彼此非常高兴。见了邵德孚同志以后，又相继见了刘大队长、郑教导员和军事部长等同志。和江海涛同志见面比较晚些。见到李贯一同志，可能是在他带领国民党沂水县政府保安团二、三营参加民主政府工作的时候。他对同志亲切和蔼，遇事从容镇定。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毅然率其武装参加民主政府工作，确是一大功劳。对于他的这种爱国举动，我党非常赞扬。山纵司令部政治部便派李志南同志到该部任政治委员，加强党的领导。

(二)

进行抗日，必须要有武装。一九四〇年，沂水县除有县大队外，各区、乡均有武装。记得三区北部一个地方实力派人士建立的一个中队，在于××（名子失记）的工作下，由刘队长带领归向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便由郑斌教导员跟其行动。这时沂水县大队直接领导的队伍将近两千人。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很重视这支武装力量，所以派了李志南同志任政委（李原系纵队部参谋科长，东北人）。从这里也可看出，沂水县抗日根据地在沂蒙山区所处的重要地位。

沂水县党的基础原就很好，抗战开始后，沂水县委又很重视党的建设，所以至一九四〇年底全县就有千余党员了。各区区委组织健全。其中不少负责人还是地下时期的老同志，如李德民同志等。这时二、三、四区已经连成一片，是一块较大的根据地了。八区区委孤出在悦庄、南麻一带的村庄，工作是比较艰苦的。一区区委的同志战斗在沂水城西南不远的地方，对敌斗争比较顽强。七区也有党支部，他们虽处严密的地下状态，但还是很有战斗力的。一九四〇年，上级党委指示要认真对待农村党组织的发展工作，这时沂水县委及各区区委在发展农村组织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虽然这时尚未进行减租减息，但各级党组织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工作还是比较好的。干部作风艰苦朴素，注意联系群众。特别是各级机关中的当地干部，工作中虽以他们为主体，但和外来干部团结很好，亲密无间，相得益彰。

如邵德孚同志，他是沂水县地下党的老领导，论革命资历，他比我和其他同志都是比较深的，但他总是十分谦虚，对于外来的同志，都很尊重。

他的这种高尚的风格，使我受益非浅。由于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同志间的关系，情同鱼水，因此当时沂水县委的工作是很得力的。山东分局领导也很满意，把沂水县委作为中心县委看待，在工作上经常给以具体指导帮助。山东分局领导人之一陈明同志，在每逢我们的工作中遇到困难或者发生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亲自提出宝贵的意见和中肯的批评，对我们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那热情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我对《中共沂水县地方党史大事记》某些情节的补充。

一、当时“中共沂水县委”对内对外都是这一称号，有时口头上说“北沂水”，但不记得有“北沂蒙”的称号。因这时已有蒙阴县委。虽然沂水南部称“南沂蒙”（可能因包括蒙阴的个别区在内），沂水却依然是“沂水县”的完整称号。

二、关于“肃托”。一九四〇年我在沂水县委工作时（开始任县委组织部长，后来上级党委曾决定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不记得有“肃托”的布置。我一九四一年在南沂蒙县委工作时，曾接到耿启明同志一信，提到他在沂水县委正受审查，整的比较严重，要我证明他政治上没有问题。我没有给他回信，也没有向组织上写报告证明他究

竟有没有问题。这是由于我当时虽然担任中共南沂蒙县委宣传部长，但我已觉察到鲁中区党委也正在审查我，认为我是湖西地区来的，需要审查（后来我到党校学习时，因同学提我为支委候选人，党校组织处长才公开宣布我不能当候选人，因为还未审查清，这便是证明）。这样我怎么能写信证明他没有问题呢？若是写了证明，当时对耿启明本人不仅不会起帮助作用，还会带来副作用。耿启明同志的信是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给我写的，说明沂水县的“肃托”不是一九四〇年，而应是一九四一年。

三、县委机关在汉峪遭受敌人袭击事件。

当时县委机关及干部训练班驻在汉峪，拂晓为沂水城、东里店敌伪军袭击。县委机关的同志大部向西南的山头突围。跟县委行动的一个连由郑教导员率领沿向西去的山沟突围，陷入敌人火力中心，故损失很大，牺牲二十多人。向西南山头突围的机关同志绝大部分脱险。最不幸的是，县委宣传部长刘滋泉同志在突围中牺牲了，是极重大的损失。上级党委在县委帮助工作的有七、八位同志也一同突围，记得组长霍国栋同志（后改为陈枕如）也都脱险。李铎好象不在。《大事记》提到李铎被俘一事，恐他不是属于当时上级党委工作组中的人，而是他在另外的场合被俘的吧。在汉峪被袭时，县政府机关不在这里，县大队队部亦不在附近的村庄。而只有郑斌教导员带的一个连队（即三区北部刘队长带来的武装改编的那个连）受损失最大。刘大队长带武装来增援，因相距较远，故县大队的三个连队来汉峪后，只进行了掩埋牺牲同志的遗体等善后工作。

四、“太河惨案”后，我正随淄博特委机关驻悦庄，看到沂水县的群众在悦庄的广场举行了声讨秦启荣制造惨案罪行的大会，到有千人左右。这时的区政府还是旧政权，但群众代表登台讲话，控诉秦启荣罪行的，自然是我党的干部人员。因我未直接参加，不能详细介绍。只是说明当时沂水党及广大群众声讨国民党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义愤行动。

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

沂水县党组织

抗日活动片断及肃托情况

耿启明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沂水县就有些在战前失掉联系的党员开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次年“七七”事变后，沂水县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沂水西北乡的一些党员如李道德、李子荣、李鸿标等人日处奔走，联络同志，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与此同时，沂水县有些上层人物建立了抗敌后援会。记得“八·一三”日寇占领上海后，武家洼地主武克千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召集各方面人士在他家里开会，李道德通知我和李子荣去参加。我问李道德是什么人开的会，他说有复兴社分子，有民众教育馆的人，等等。我和李子荣就去武家洼，走到武克千家，见前来参加会的人之中有的不大怎么样，就中途退出了。

我们回去后，李道德、李子荣、李鸿标和我在李鸿标家里开了一次会，决定成立沂水临时县委，要李鸿标任书记。李鸿标以不了解外面情况为由极力推辞，并提出李子荣任书记比他更为合适。大家同意了。临时县委就这样建立起来。

临时县委建立后，决定联系各地党员，准备建立抗日武装，同时对战前党员作了分析，决定先把一九三三年沂水县委被破坏以后，失掉联系而无变节行为的党员动员起来。临时县委为此作了分工：李子荣负责全面工作兼管一区；李鸿标负责七区；我负责三区、八区，并向四区找关系开展工作，这时我们弄到一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李道德到地下党员所掌握的张耿小学油印了许多份，给大家学习、宣传。

我除了到我分工的地方去活动外，还到马站乡农学校去过。该校的王卓然和黄善勋，前者是我党同情分子，后者是地下党员。他们告诉我该校校长贪污，我说你们应该起来跟他斗争。结果后来他们把校长打了。我也到过松峰和孔家庄，联络公海关和孔楚白。次后不久，沂水抗日志愿队成立，我和李子荣就去参加了，在里边发展了一批党员。当时志愿队约百十人，枪和给养是由李贯一第一中队供给的。日寇第一次进犯沂水时，志愿队在城北打了一次伏击。后来，该部大部分同第一中队合并，其余分派到地方上工作。至一九三八年春，邵德孚在其后马荒家中召集会议，筹建四支队六大队，参加会议的有邵德孚、鲁滨、李仲林、李贯一、李子荣、于松泉、李道德、张绍武等。我这时正在郭庄一带的十八中队从事统战工作，也去参加了这次会议。

六大队建立后，开到沂水西北乡，政治处驻汶村，当时李仲林主持政治处的工作。有一天，我曾去汇报过情况。不久六大队向南开的时候，杨坤找我谈话，他说组织已经决定，派我到三区任区委书记，我当场向杨坤提出去党校学

习的要求。后经组织研究同意，便派王翰卿去十八中队接替我的工作，邵德孚给我写了信，把我介绍到党校学习。学习尚未结束，山东省委派我去蒙阴县任县委副书记。

我到了蒙阴，区党委高克亭同志也去那里帮助我们工作。当时工作的艰苦之状自不必待言，而敌我斗争的尖锐复杂却也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我刚到蒙阴不久，有一天，一个名叫韩建秋的人到了县委，自称是从第五战区来的，要求分配工作。当时我想，从第五战区到蒙阴必须经过山东省委当时的驻地，他为何不去省委，而直接到蒙阴？这不能不使我怀疑。我就去找高克亭说了我的看法，提议不能留他。高克亭说，姑且留下看一看再说。我遵从了高克亭的意见，就把韩留下了。有一次，公务员对我说，他看到我找同志们谈话，韩麻子（韩建秋有麻子）偷听。这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决定暗暗地将他考察一下。有一天，我把几份重要文件收拾起来，将几份一般文件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并弄上记号。这样布置好之后，我对公务员说我今天有事要出去，你留在家里。晚上我回来，发现文件被人动了。我问公务员，他告诉我今天只有韩建秋来过。我马上把这情况向高克亭报告了。高又将这事反映到山东省委。省委一查，在已掌握的材料中有韩的名字，此人是一九三三年叛变的，充当了敌特。查清后立即将他逮捕了。

一九三九年麦季日寇“扫荡”以后，山东分局派孙陶林同志和我谈话，调我回沂水三区任区委书记。我在沂水三区干了一年。县委书记王翰卿通知我调沂水县委工作。开始没有宣布职务，不久任命我为组织部副部长。郝心昌任部长。

在组织部工作期间，我和各区书记的关系都很融洽，他们有什么话都能同我谈谈。记得一区区委书记高复隆同志，曾对我反映×××受贿。×××当时是县委负责人之一，有关他的问题，下级敢于反映，那时的党性就是这样纯洁。

一九四〇年，忘记是什么月份，我到二区检查工作回县委后没见郝心昌，问同志们，都说调走了。我觉得这事有点突然。过了不几天，我正在给一个同志主持入党仪式，县公安局有人去叫我，说是有事。我一出门，公安人员就把枪指上了。我当即提出抗议。我说我是组织部副部长，你们这样对待我不行！他们哪里由我分说，就把我关了起来。我要求和王翰卿、邵德孚谈话，他们不谈。而由公安局长郭宜春和我谈话。郭在同我谈话时，一开始，别的没说，一上来就以审讯的口气问我和郝心昌是什么关系。这时我才意识到郝心昌不是调走，而是被捕。我于是回答：什么关系，你们不知道吗？郝心昌是部长，我是副部长，是同志关系，工作关系。郭宜春又说，不止这些关系吧，还有私人关系。郭下去说我一九二八年就参加革命，应该知道陈独秀。我说我当然知道陈独秀，那时他是中央局书记。郭宜春又说，那时的陈独秀已是托派。我说，照你的说法，那时的共产党员都是托派了。经过这次谈话，我才知道我之所以被捕，是因为托派问题。我要求去七区党委把话讲清楚。

到了七区党委，给我上了镣铐。保卫科长吕剑光审问我的时候，没有等他开口，我先发了言。我问吕剑光，这是什么法庭？他说是无产阶级法庭。我说既然是无产阶级法庭，那为什么非把自己的同志非逼成叛徒托派不可。吕剑光火了，把我揍了一顿并直接指我为托派。我当然不服，当场对吕剑

光说，如果我是托派，我能向组织反映韩建秋的情况吗！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

我自信我参加革命以来对党并无二心，我揭发韩建秋的问题早为领导所知，凭空飞来的托派帽子我是断乎不能戴的，所以每次审讯，我都没有承认我是托派。

我被押到七区党委不久，沂水二区民运委员李哲堂也被逮捕同我关在一个房间。李哲堂可能一九三二年入党，他在沂水西北乡的活动情况我是大致了解的。所以我对他说，共产党人既要经起敌人监狱的考验，也要经起自己监狱的考验，在敌人法庭上胡说八道是叛徒，在自己的法庭上胡说八道也是叛徒。有一天，李哲堂又被押去审讯，房间里只剩我一人，有一个对我很同情的看守人员对我说，那个姓李的怕是完了，审问他什么他就承认什么。李哲堂受审回来，我见他浑身上下湿透了，问他怎么样，他说那刑罚他实在忍受不住，一切都承认了。我问他承认的什么，他说是托派。我当场批评了他，他哭了。第二天，他就被枪毙了。

后来，我的问题终于平反了。平反时，我问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究竟为什么把我当成托派关押审查，他说因为怀疑郝心昌是托派，你和他关系很好，所以就怀疑到你。他还告诉我，郝心昌没有问题，现已提为县委书记了。邵德孚也对我这样说过。

肃托中，沂水孔宜千也曾受过审查，一度开除党籍，后来也纠正了，是李树平同志给他宣布的平反决定。

（张茂萱 窦宪诺调查整理）

一九七九年九月

沂水肃托及其它情况片断回忆

李树平*

一九四〇年春，我在沂水县二区区委任组织干事。当时李子仁任区委书记，李德民任组织委员，李树超任宣传委员，王卓然任区长。全区共一千九百多个党员。其中埠前村最多，六十余名。记得全区三十名党员以上的村庄不少。

就在这年春，地委工作组在马家旺村召集二区脱产干部开会，进行肃托。李子仁、李德民、李树超、李树平、王卓然及各乡支书、乡长都参加了。县委没有去人。会议是由地委工作团主持的，团长王为一亲自坐镇，一共搞了七天。会议期间，因“托匪”问题批判斗争了五六位同志。孔益千是其中之一，并下了他的枪。最后给他做的结论和处分决定还很押韵合辙，说他：“连讽带刺，辱骂上级，犯了托匪嫌疑，理应枪毙。斗争从严，处理从宽，予以永远开除党籍。”还斗争了高桥乡一位姓秦的乡长，其他不记得了。

事过两三个月之后，上级说肃托扩大化了。沂水县被错斗的同志很快平了反。县委书记王翰卿亲自到二区给孔益千平反，和我一起同孔益千谈话。王翰卿给孔宣布了撤销处分的决定后，还向他说了些道歉的话。孔益千当场哭了。

* 李树平，沂水县金牛官庄人，现在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工作。

减租减息，是经过相当一段过程，才得到实施的。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前，即一九三九年冬至四〇年春，我们是向地主借粮，分给贫苦群众渡荒。到一九四一年，沂水县才开始减租减息。但由于当时环境恶化，斗争复杂，地主们有的明减暗收，有的以退佃威胁佃农。佃户也顾虑重重，有的把已减的租子偷偷还给地主。二地委当时曾在《沂蒙导报》上发表文章，对地主进行劝告。记得连续发表了三篇，题目是：《向地主进一言》、《再向地主进一言》、《三向地主进一言》。尽管我们言劝再三，同时有些地方将“二·五”减租调整为“一·五”减租，对地主作了些让步，但还是阻力很大，推不开。后来，我们的根据地逐步扩大，政权比较稳固了，“双减”才得到全面贯彻。就当时二区的情况来看，经过减租，佃农每年每人一般增加粮食五百斤左右；雇工增加工资，例如放羊的，除了管吃之外，羊毛归雇工所有。当时羊毛价格提到一元钱一斤，其收入是比较可观的。减息难度较大。因为提出减息之后，有些人不放债了，同时有些借贷原是秘密交易的，外人不知道。如果有的借债人能向政府提出，政府就按政策给予减息。但凡事情闹到政府的，放债人也就干脆将利息自行废除了。后来进行找工算帐，把地主的土地大部分算到佃农手里。但不是佃户的贫苦农民，则得不到土地。可见减租减息，找工算账还不能解决贫农的土地问题。

一九四二年夏季，我调到沂水七区任区委书记。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国民党五十一军和沂水县旧政府周莘农特务大队盘踞在该区，群众遭受他们的摧残很严重。沙

沟村党组织曾遭到周莘农的严重破坏。区委组织委员李汉均的家被周查封了。李跑到他叔丈、反动地主、大佛道头子石小舟那里，后经石出面作保，他才露面。后来不少人说李汉均叛变了。但据我了解，他没暴露七区的党组织，没有出卖同志，叛变问题不成能立。

我到七区以后，国民党五十一军和周莘农特务大队尚未撤走。但我们区委和区政府还能坚持工作。区长是李钟盈，组织委员是李汉均，区里有一支武装，称沂蒙大队。这支队伍整天和敌人周旋。李道德同志曾到七区同我一起整顿党的组织。当时能够坚持工作的党支部有杨庄、双沟、于家河、沙沟、院上等村。沙沟党支部三十多名党员，战斗力比较强。全区二十多个村庄还能向我们交公粮，党组织也有发展，减租减息在一些村子也能进行。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建立了沂北工委和行署，七区划归沂北。一九四三年国民党五十一军撤走，七区全境解放。这时，大部分村庄建立了党的组织。

但是，五十一军撤走以后，茹素团和大佛道依然很猖獗。国民党特务操纵这两个反动组织，利用迷信欺骗群众，受骗加入斋团的人很多。他们在原七区设了十大寨，并有相当的武器装备。我们曾把一些党员派进去进行分化瓦解。有一次，芝麻峪三百余名斋团分子纠集闹事，一个打进去的党员事先向区委报告了，区委立即派武装将该村包围，俘虏二百余名，缴枪二百多支。

一九四五年初春，大佛道暴乱。莒县边沿的暴乱分子杀了我们的许多干部，投靠了昌潍地区国民党张天佐的部队。

沂北大佛道参与这次暴乱的是靠近安邱、临朐两县边沿的二十多个村庄。但他们没有杀人，也没投向国民党军队。这是由于我们派进去的党员在里边起了作用。暴乱发生后的第二天，我赶到暴乱的中心地，逐个找他们的家属谈话，了解情况，讲明党和政府的政策。原来他们大部分窜到沂山里，只有少数头头，记得侯家官庄一个姓白的和石小舟的子女逃到国民党那里去了。我便带领四个同志和一部分武装上了沂山。我把部队布置在后边，我们几个同志先去做说服教育工作，如果说服有效，武装就不露面。经过说服教育，最后一百多人自动缴了械。这些人回家以后，我们对其没作深究，只是教育他们退道。他们大多是受骗的群众，一经教育，很快就觉悟了。我们组织他们举行了退道仪式。那几个投靠国民党的头头，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被我们抓住处决了。

（张茂萱 窦宪诺调查整理）

一九八〇年七月

抗日战争中沂水县的统战工作

尹平符

统战工作在沂水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项工作，主要是按照我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进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的路线和策略。统一战线的提出，是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实现了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包括进步力量、中间力量和顽固力量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在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上，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执行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对反共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沂水县抗战过程中的情况来看，也完全证明了党中央提出的这个路线、方针、政策的英明与伟大。

回顾一下抗日战争中的沂水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对于增

强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贯彻党中央关于当前统战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到一九三八年春，沂水上空乌云压顶，风雨飘摇。蓄谋吞并整个中国的日本侵略者，在侵占省城济南后，继续南下。沂水人民只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起来奋起反抗。

地处沂蒙山区的沂水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一些隐蔽下来的地下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及爱国民主人士，都在热烈地紧迫地讨论着抗日民主的各种问题。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徂徕山起义及鲁北各地武装起义反抗日寇的消息，鼓舞着沂水人民。建立抗日团体，组织抗日武装任务迫在眉睫。在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的口号下，沂水各地纷纷酝酿着建立抗日游击队伍。其中特别是刚出狱不久，奉命回沂水组织抗日武装的邵德孚同志，同原国民党沂水一区乡农学校校长李贯一同志商讨，先后组成沂水抗日游击第一中队、抗日志愿队和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四支队第六大队是沂、莒二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它也得到一中队和志愿队的支持，成为在沂、莒两县抗日武装的中流砥柱。这是抗战初期沂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成果，为后来沂水武装抗战打下了初步基础。就其意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在日寇的铁蹄踏入沂水境后，犹如惊弓之鸟，可是它的统治机构依然存在。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却是先声夺人，深得民心。二、沂水共产党的组织领导虽然尚未建立、健全起来，但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原国民党领导下的部分具有抗日民主思想的下层和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信任，已是众望所归，他们把抗日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三、就共同发起组成抗日武装来说更是意义重大。只要说明如下一点就见一斑。以刚出狱不久的邵德孚、李仲林和莒县郭有邻为首的共产党员骨干同原国民党一区乡农学校校长李贯一共同发起组成沂水第一支武装力量，并团结了原国民党沂水一区黄山乡长杨希古，民主人士刘惠民等以及广大爱国知识青年踊跃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游击队。其中许多原国民党机关团体下层的有识之士都投身于这一伟大的抗日事业，在以沂水城为中心的一区表现出来。在其他地区如五区九区等地都是如此。这就可见人心向背，大势所趋了。

当然，这只是一支“沂水抗日先锋队”，而且只是初期组成的抗日游击队。广大的人民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怎样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和继续补充后备兵源，这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国民党各派、各军、各机关团体在日寇大兵压境面前，都处在大动荡大分化的过程中。这又是革命人民非常关心的情势。如何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担负起艰巨而伟大的抗日战争重任，成为紧迫的课题。

(二)

一九三八年春夏间，除已有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六大队和一中队作为抗日武装骨干外，各种政治、军事力

量，进步的、中间的、顽固的都在活动着。各种游击队纷纷建立，各种倾向都在发展，亟需有个统一的民众领导集团，以便把真正抗日的力量组织起来。

中共山东省委及其领导的四支队进驻沂水境内，从此沂水人民在省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各项抗战工作。鲁北人民组织抗日武装七支队和八支队，也活动到沂水西北部边界。还有国民党69军开到沂蒙山区后，它的民运指导处驻沂水办事处设在沂城。该办事处张健是中共地下党员，经与沂水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商定相互联系配合开展工作。这对沂水的抗战工作的开展都是很有利的。

经过各方面酝酿协商，沂水县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在沂城溥霖小学校址成立起来。进步人士刘民生任主任委员，国民党代表王敬斋任指导委员，张希周任宣传委员，共产党代表邵德孚任组织委员。并出版《动员日报》，由刘民生任社长，动委会秘书靳星五任主编。这是沂水县抗战爆发后第一个由国共两党代表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担负着宣传、组织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任务。

在县动委会成立后，各区各地也相应的建立了动委会。我们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发动各阶层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抗日。县动委会组织部负责人由邵德孚担任，除他和各界人士进行联系外，还由王翰卿、杨刚、夏明等同志深入各地区发动群众，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当然，动委员内外的国民党员也在这时大力发展，如学行社、复兴社都在活动。

《动员日报》是县动委会领导下的统战宣传工具。其人员组成，主编由靳星五负责，还有尹平符、孙澍人、张敬诺、刘仲实、武慧清、刘盛南、毛顶生等负责编辑、印刷、发行等工作。报社备有用电池作电源的收音机一部和油印机一架。主要收录和刊载中央发布的抗战新闻，以及自编或采访的抗战消息或评论文章。报社的工作刚开始时尚为顺利，但后期受到国民党省政府的阻碍与破坏。如有一次编辑人员自编的有关政治工作方面的文章刊出后，国民党省政府就通过主编对编辑人员提出指责警告，不让继续刊载这类文章。还有一次，在一九三八年底，有八路军代表参加的在城南头召开的军民联欢会，会上八路军山东纵队代表赵笃生发表演讲，阐明共产党、八路军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必胜的道理，深受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对各行各业广大群众起着启聋震聩的作用。这个演讲稿已被编辑人员编排，准备付印，但由于我党在报社没有领导权，而被国民党当局给删掉了，未能与广大读者见面。此事我曾向邵德孚同志反映，但未能得到解决。

此后，县动委会和《动员日报》社的活动，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与破坏，再加上敌情变化，无法在县城坚持，被迫撤出县城。这样，一个统战机构就无形解散了。《报社》中的孙澍人、尹平符、张敬诺携带着收音机到城西小高庄南山一带活动，但因客观条件限制，出刊的任务已无法进行。

(三)

沂水县县政促进会、沂水县行政委员会及沂水临时参议

会的成立。

一九三九年春，沂水县我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都得到较好的发展，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限共反共政策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山东分局指示沂水县委，要积极工作，创造条件，尽早建立由国共两党代表及民主人士参加的抗日民主政府，担负起领导全县军民抗战的重任。对国民党省政府的限共反共的政策要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与此同时，中共山东分局在沂水王庄召开了统战工作会议，对沂水统战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一九三九年三月，沂水县县政促进会成立，由江海涛、邵德孚、刘民生、孔庆铭、黄如冈、袁印秋等九人组成。这是继沂水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之后，为建立沂水抗日民主政权做准备的统战机构。此后，在邵德孚与沂水国民党县长孔庆铭的商洽中，向他提出建立沂水抗日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而后又在中共山东分局统战部长主持下，中共沂水县委书记刘建中又与孔庆铭就建立沂水县民主政府区长人选任命问题进行谈判，结果孔庆铭给各区民主政府区长颁发了任命书。这是沂水人民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一个步骤。

这年六月份，日本侵略者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第二次侵占了沂水县城，并在各交通要道设了敌伪据点，控制交通线，分割沂蒙山区。就在这年六月七日，日军轰炸了沂水东里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省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 and 部队，均闻风而逃，国民党的军政统治全部陷入瘫痪状态。

在日寇“扫荡”面前，如何迅速建立起能够领导人民武装反“扫荡”的人民抗日政权，就成为敌后军民的紧迫任务。中共沂水县委在山东分局的直接领导下，于七八月份先后建立起各区乡民主政府和区中队、乡分队。并经协商在沂水县召开了抗日团体代表大会，选举了包括国共两党代表及民主人士参加的沂水县行政委员会，选举了孔鼎言、刘民生、杨云阶、黄如冈、袁印秋、李贯一、江海涛、邵德孚、田景溪等九人为县政府常务委员，以及刘瑾山、马若愚、王均治、耿光波、刘省五、刘益生、朱亦楷、杜元章、岳洪春、刘惠民、王敬斋、李树声、阎娟等为执行委员。县政委员会的建立，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沂水县取得的重要成果。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寇加强对“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尚待充分发挥的紧急关头，却继续推行其限共反共的政策。他们在“太河惨案”之后，又在沂水掀起了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夏秋间，先是由国民党县长孔庆铭，继由其省政府委派的更为反动的刘瘦岑接替沂水县长，加紧摧残我刚刚建立的各区乡民主政府。他们摧跨了我五、六两区政府之后，又派其县大队长周莘农部，公然包围我一区区中队，摧跨我一区政府，又窜到沂北破坏我二区区乡政权和我党基层组织，以配合博山和沂水西北部秦启荣部在五十一军支持下向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一九三九年底，国农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沂水愈演愈烈。我山东分局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做

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除在军事上进行必要的自卫反击外，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经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沂水县划为南北沂蒙，原一、二、三、四、七、八各区及六区北部划属北沂蒙，由中共沂水县委领导；五、九、十各区及六区南部划属南沂蒙，由在沂南中心区委的基础上组成的中共南沂蒙县委领导，以适应抗战工作的迫切需要。

一九四〇年初，北沂蒙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决定成立北沂蒙联防办事处，选举执行委员十七名，推选江海涛为办事处主任，下设民、财、建、教、公安、司法等六个部门，分管各项抗战工作。一九四〇年二月，南北沂蒙两个办事处和沂蒙民众动员委员会，以及沂水县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代表和来宾共80余人参加，为建立沂水县参议会，以推行宪政，实施民主政治而召开了沂水县党政军民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县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草案”，并推选了“县参议会选举委员会”委员，负责筹备县参议会的选举事宜。此次联席会议为了响应山东宪政促进会的号召，还成立了沂水县宪政促进会。

沂水人民，在中共沂水县委领导下，经过充分发扬民主，各方面酝酿协商，实现了有史以来的民主政治，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在五区召开了沂水县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与会各界参议员87人，来宾30余人。山东省宪政促进会代表陈明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邵德孚为参议长，王翰卿、李贯一为副参议长，及驻会参议员多人。会议还通过决议，罢免了贪污腐化、破坏抗战的原国民党沂水县长刘瘦岑。选举了沂水县政府委员会委员，并推选江海涛为沂水民主政府县长。从

此，沂水人民在沂水民主政府领导下，开创了抗日民主的新局面，把抗战工作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国民党顽固派日益反共反人民，甚至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敌伪“扫荡”，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下，一九四〇年四月原沂水县保安团二、三营营长刘邑周和牛兰荪率部发表宣言，拥护沂水县民主政府，讨伐破坏抗战的刘瘦岑，与旧县政府脱离关系，坚持抗战到底。这是我党统战政策在沂水又一个重要体现。

在这期间，沂水参议会的工作，主要是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以参议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散发全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摧残民主政权，残杀抗日干部等罪行，粉碎顽固派所散布的所谓“正统”观念，发动群众团结抗日，起了积极作用。

在此以前不久，鲁南国民抗敌协会沂水分会，召开了成立大会，选举靳星五为主任委员。并在中共沂水县委帮助下建立了抗敌自卫军一个中队。后来随着山东国民抗敌协会改称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成为半政党性质的组织，沂水县抗敌协会也改为沂水县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分部。至一九四〇年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是统一战线阵容越来越扩大，在组织上要适应抗战形势发展而需要的结果。

(四)

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我们是在“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指导下，与友党友军合作抗战。而国民党顽固派却一而

再、再而三地掀起反共高潮。对此，我党、我军只有针锋相对地贯彻“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给以还击。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取得抗日的胜利。

一九四〇年十月，沂水县民主政府县长江海涛被上级调到沂蒙专员公署任秘书长，李贯一担任沂水县长。在反“扫荡”胜利后，按照中央指示，在政权建设上贯彻执行“三三”制建政方针，使我各级政权更好地把各项抗战工作做好。

一九四四年我抗日根据地越来越扩大，抗日武装越来越坚强，已经到了我军开始战略反攻的新阶段。鉴于邵德孚参议长早已调到鲁中二地委工作，县临时参议会的组织已有很大变动。沂水人民为了迎接更大的胜利，根据上级指示，于这年五月在金泉区望仙院召开了县参议会成立大会，选举杨希古、吴金朋为正副参议长，并选李贯一、武子服等九人为县行政委员，李贯一再次当选为沂水县长。这使沂水县政权建设进一步充实与发展。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是沂水人民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我鲁中军区部队开始了拔除伪据点的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沂城及附近敌伪据点全部被我摧毁。被日伪残酷统治达六年之久的沂水城，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收复。这是在鲁中地区最早得到解放的一座县城。

在这新形势下，县参议会为了更广泛地发挥联系人民群众，团结各方力量的纽带作用，一九四四年冬季（或一九四五年春季）就在刚解放不久的城西岳庄，召开了第二届县参议会第二次大会，讨论了政府工作，进一步动员群众

支援前线，作好抗日工作，以及如何做好拥军优属和民财建教各方面的工作。这一届的参议长和驻会参议员有黄可斋、秘书尹平符，还有常来常往的驻会议员刘惠民。在日常工作中，经常联系各方面的代表，同沂水县民主政府密切配合，搞好各项工作。

最后说明一下，这一届参议会的结束。在一九四七年夏季，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破坏和平统一，悍然发动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战争。这时沂水县委、县政府决定，将一批病弱干部、教师和部分军工烈属转移到黄河以北渤海地区。在干部教师转移大队中，就有县参议长杨希古及其家属。直到山东人民武装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解放了省城济南之后，杨希古参议长被安排到山东省水利厅工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及各界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及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就在民主政治方面更加发展与完善了。

当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开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局面，争取实现世界和平和台湾、香港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党的统一战线就要广泛地团结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爱国者，就要继续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共商国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一九八六年

沂水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概况

靳星五*

沂水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于一九三八年夏在沂水县城成立,会址在南关塘子沟,原瑞溥学校旧址。当时的背景是,国共合作的形势比较好。日寇于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初,曾一度盘踞沂水县城,旋即撤退。这时,国民党部军队石友三、高树勋率69军,从徐州一带转进鲁南山区。69军政治部长张友渔同志(共产党员)所领导的干部,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该部和我党山东领导机关建立密切联系,领导组织鲁南抗敌工作团。在该团的基础上,发起建立了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我八路军115师一部,开进沂蒙山区抗击日寇,急需开展工作,宣传鼓动抗日,发动地方上各阶层人士起来,坚持团结抗战,动员人民群众组织战时勤务,如动员参军,抽调民工,供应粮食、衣服鞋袜等等。经国共两党双方协商,成立沂水县动委会。

沂水县动委会,刘民生任主任委员,赵笃生任副主任委员(赵笃生是中共党员,后任泰安、昌潍地区专员,中共山东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邵德孚任组织部长,张健任宣传部长(张健是东北人,中共党员,当时为69军民运指导处驻沂

*靳星五,沂水县诸葛镇上华庄人,曾任山东省政协常委,现离休。

办事处主任），靳星五任秘书，负责主编《动员日报》。当时，沂水县划分十个行政区：第一是城区，第二是高桥区，第三是东里区，第四是夏蔚区，第五是依汶区，第六是苏村区，第七是马站区，第八是悦庄区，第九是岸堤区，第十是垛庄区。每区都设区动委会，在县动委会统一领导下，做战时勤务工作。一九三九年夏，日寇又侵占沂水县城，动委会工作告一段落。后来成立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重组新的县动委会。

（选自沂水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

《动员日报》概述

靳星五

沂水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于一九三八年夏,在沂水县城成立后,为了宣传鼓动抗日战争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投入战斗,决定成立沂水县动员日报社,编辑出版《动员日报》。刘民生任社长,靳星五任主编,尹平符、张敬诺、刘仲实、孙澎人、刘盛甫等任编辑、采访、录音、刻版、印刷、发行。大家一齐动手,分工协作。刘盛甫自己装置了一部小型无线电收音机,收录中央社新闻消息。刘仲实制报头,绘人物头像,画宣传画,刻钢板、油印,极为精致。许多读者认为是用铅字排印的,竞相阅读,辗转相告。报社全体工作人员,融洽相处,一心一意办好小报。虽工作十分紧张,生活很清苦,但毫无怨尤,精神愉快,成果显著。

《动员日报》,新闻纸四开,每天出一张两版。印刷几百份,赠送给党、政、军、机关、团体、学校和个人。一版是社论、新闻。消息来源,除中央社电讯外,自己采访,动委会和有关单位提供。二版是短评,有关宣传抗日的报道、通讯、散文、诗歌、小说、故事、宣传画等等。对宣传鼓动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到一九三九年夏,日寇第二次侵占沂水县城,《动员日报》随停刊。前后计一年左右,共出版三百多期。因战火纷飞,报社人员各自分别奔赴战争前线,报刊荡然无存。

(选自沂水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

沂水县抗协简况

靳星五

一九三八年冬，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从鲁西北窜到鲁南，疯狂地破坏团结抗战，变本加厉地反共反人民，大肆迫害抗日团体和进步人士。

一九三九年夏，以李澄之同志（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始前身—主任委员，建国后任山东省副省长）为首的一些进步人士，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发起成立鲁南国民抗敌协会（简称抗协）。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坚持团结抗战活动，争取进步分子，发展会员，建立机构，成立抗协山东省会部，各地区设分会部，各县设县会部。

当时，在抗协省会部（驻沂水县大诸葛一带）直接领导下，成立抗协沂水县会部，靳星五任主任（一九四〇年，靳星五调抗协省会部工作，孙士杰继任），孙士杰任组织部长，陈梯山任宣传部长。下设四个区会部，王雪农任一区区会部主任；刘瑾山任二区区会部主任；孙士杰兼三区区会部主任；靳勉斋任四区区会部主任。各在县区同级党委领导下，根据抗协宗旨活动。发展会员数百人。这些会员，多半是教师、学生、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界、工商界、医药卫生界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士，因而多半参加或兼任地方政府机关、团

体、学校，企业从事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还建立了一支抗日武装队伍——抗敌自卫军中队。

一九四二年冬，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来山东视察工作，同中共山东分局和抗协负责同志研究商谈，认为抗协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一致同意结束抗协组织。所有抗协各级专职干部，以及某些抗协成员，分别分配到政府、经济、文教等方面工作，以发挥其特长。抗敌自卫军编入八路军。沂水县抗协、自卫军亦照此办理。

（选自沂水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

沂水县抗敌自卫军简述

靳星五

国民抗敌协会山东省会部，于一九三九年成立后，不久便建立抗敌自己军（简称自卫军），梁竹航任司令员，李澄之任政委，华诚一任政治部主任，董尧卿任参谋长。

抗协沂水县会部，于一九三九年成立后，在二区筹建自卫军中队（相当于连队），宋新亭任中队长（相当于连长）。宋调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由冯瑞轩继任中队长。宋新亭回任后，冯瑞轩调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王涉（115师干部）任中队指导员，调走后由王松年继任，王在同敌人遭遇战中，英勇牺牲。顾洪升任副中队长。一切供应待遇同八路军。接受八路军和县大队指挥，对敌作战。

该中队的队员，多是抗协会员，或是抗协会员发动参军的。这个中队曾调到当时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始前身）、抗协省会部驻地训练，并抽调六十多名队员和干部，编入八路军主力部队。后又回沂水县二区扩编，先后升级到主力部队共三百多人。到一九四二年冬，全部编入八路军。

（选自沂水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

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 尹振华谈山纵卫生部医院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七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寇轰炸了长山中学，我得知此事，就到了方镇，遇到长山中学姚仲明和廖容标两同志，就跟他们参加了黑铁山起义。起义后队伍拉到邹平山区。一九三八年三月，越过胶济铁路，在博山一带活动，不久又回到鲁北。十月又南下过铁路到了博山南部下庄。一九三九年春节前夕，我在博山洪山口负伤，部队把我送到沂水县四区王家庄子山纵卫生部医院治疗。

这个医院是山纵卫生部的附属医院。院长是白备伍，总务科长是韩翔云，副科长是杜元龄，医生有国民党中央派来的。我在该院住了一百天，伤愈后被派到尹家峪后方医院任管理科科长。

我是五月份到尹家峪去的。当时后防医院负责人是张京敏，护士长是刘玉（女）。医术最好的医生是两个女同志，一名刘子珍，一名王兰亭。陈华负责政治工作。医务人员共有一百多人，大部是新招的中、小学青年学生，有些是潍坊人。医术基础较好的称卫生员，其他都称看护员。全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都住在老百姓家里。当时医治条件虽然很差，

但大家工作都很认真，服务周到，在少医缺药的情况下，一般病伤都能治愈。

我到该院不到一个月，敌人就开始“扫荡”了。在敌人“扫荡”前，我们就获得情报了。为了便于转移，院方就动员基本痊愈的伤病员归队，参加反“扫荡”斗争。敌人“扫荡”开始后，医院转移到群山环绕的棋盘村，医务人员和伤病员都疏散隐蔽在山沟里。记得当地有一坏人，带领日兵到棋盘清剿，后来被我们抓起来枪决了。

在棋盘，医院派我带领一个排到四区保护建立区乡民主政权。记得选举岳洪春当了四区民主政府区长。我就是在这里建立民主政权过程中，即七月二十九日入党的。四区区乡民主政权建立后，反“扫荡”也就结束了，这时医院已转移到诸葛一带的红石崖，我带着那个排回到后方医院。当时山纵司令部驻在诸葛。约在九月底或十月初，我们在诸葛召开了一次大会，庆祝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十二月，后方医院迁到沂水九区艾山后夏庄。到一九四〇年春，又迁至孟良崮山后的芦山与河子沟一带山村。在这里，后方医院分为一所、二所。一所住在河子沟大埵村，张京敏负责，主要伤病员都在一所；二所住在芦山，刘子珍任所长。重病号都住在地窖里，其他都疏散到老百姓家里，生活由群众照顾，群众尽了很大的责任。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我们一刻也不能生存。

由于当时敌人从各方面对根据地实行封锁，办医院是很困难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相当缺乏，但全院同志都积极想办法，克服种种困难，保证治疗工作的正常进行。棉球用

过了，洗一洗，蒸一蒸，再用，从来不舍得丢掉一只；没有镊子，就用草棒代替，或者自己动手用竹棒刻制；特别是做截肢手术，哪有正规器械，只好用木工锯子、凿子。用这种工具做手术，伤员需忍受极大的痛苦，但他们都能咬紧牙关，和医生密切配合，完成手术。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战士有着无比顽强的性格。医药主要是通过各种关系从敌占区如济南、泰安、沂水城等地买来的。这需要冒着很大的风险。但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为了解除伤病员的痛苦，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保证供应。

为了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医院还开办了培训班，由基础好的医生讲药理学、生理解剖学、临床学和拉丁文。经过培训，有好多卫生员、护理员提高了医疗水平，被提为医生。如护士长刘玉同志，当时学习很是认真，被提为医生后又当了所长；护士朱杰同志，也被提为医生。全国解放后，她们都进了医科大学，现在都成了高级大夫。其中刘玉同志现在空军总医院任副院长。

后方医院迁到孟良崮山后以后，因为这里是个边远的山区，环境比较稳定了。为了照顾好伤病员的生活，我们就从恢复健康的伤员中选出一部分同志自己磨面，并购买了压面机，自己加工面条；有些同志会木工，我们就组织他们做拐杖和其它用具；许多人还会做鞋，做得挺漂亮。总之，我们尽量设法，自力更生，以减轻群众负担。

一九四〇年冬，一所二所合并为野战医院，苏书轩任院长。下设医务处和总务处，张京敏任医务处主任；我任总务处主任，王德厚任副主任；原在国民党卫生署工作的李衡同

志从山纵卫生部来任内科主治医生。这时刘玉、朱杰两同志都成了比较有水平的医生了。改为野战医院后，迁驻代庄。记得医院迁到代庄时李衡同志才到野战医院去的。至一九四一年秋敌人“扫荡”前我被调到沂蒙专署工作，离开了野战医院。

（张茂萱、窦宪诺访问，张茂萱整理）

忆沂水县抗日子弟小学

安善平*、张琳

沂水县抗日子弟小学一九四一年四月开办于金泉区（今院东头乡）上岩峪村。后来，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学校又先后迁至望仙院、田家峪。一九四三年五月，由于日军“扫荡”，学校停办。该校虽然存在仅仅两年的时间，但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干部，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一定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节节后退，山东全境迅速沦为敌占区，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党我军为拯救人民，夺取抗战胜利，遵照中央的指示，坚决插入敌后，打击敌人，建立抗日根据地，成立民主政权，开展抗日工作。至一九四一年，鲁中抗日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县、区、乡村各级人民政府都相继成立，为发展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创造了有力条件。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使抗日军政干部安心工作、投入抗战，使其子女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生活环境，便于同年四月，在我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倡导下，由县文教科主办，抗日子弟学校在沂水西南山区中心根据地上岩峪村成立。其办学宗旨是，培养革命后代，加强文化学习。也可归

* 安善平，上海市人事局副局长。

纳为两个字即“教、养”。教，就是教育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抗战道理；养，就是首先对他们的一切生活安排妥善，使其成长为革命人才。凡参加入校的学员都享受供给制待遇，由政府批拨粮食，发给生活补助。

学校成立后，开始只有朱晓亭、张琳两名教员，学生仅有十来名。不久，县文教科派抗大刚毕业的安善平同志任该校校长，这时已有学员二十名左右。当时县文教科科长是李沾吾（后为许平、张惠），他对这个学校非常关心，常去帮助指导工作。

由于当时是战争环境，办学困难相当大，条件很差，既没有固定的地点，也没有校舍和必备的教学用具，只有一块一米见方的小黑板，师生凑在一起学习，有时找间小屋，有时在外边，可谈得上一切因陋就简。

一九四一年秋，由于敌人经常从沂水城和黄山铺一带出动骚扰，弄得人民不得安宁，国民党顽固派又和我们搞磨擦，蚕食我抗日根据地，迫于这种形势，学校南移，搬到望仙院的大庙里，上课就在殿内泥菩萨旁边进行。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又不断向南蚕食，加之听说日军要进行“扫荡”，县文教科通知我们转移，学校遂由望仙院搬到田家峪村。

这时，抗日战争进入非常艰苦的阶段，部队流动性很大，在这种形势下，部队感到年龄小的战士随部队转战不大方便，因此就把一些通讯员、护士和宣传队的小同志转到学校，学生增至将近五十名。这些学生虽然年龄比较小，但思想觉悟比较高，具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一定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们到校后，在学生中充实了一批骨干力量。

学生增加了，教师也增至四名，有黄啸天、陆学增、朱均、王××（名字失记）。至一九四二年八月，学校逐步正规化了，机构有所健全，并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这时，不但文教科的领导常到学校看看，而且战工会教育处孙陶林同志、专署教育科长李微冬同志也常去指导。这时课程设置有了语文、算术两门和不定期的政治课。政治课主要讲抗日战争形势和抗战道理，以及团结互助、艰苦朴素、爱护公物、遵守纪律等内容。行动军事化，起床打背包，早出操，晚点名。

同年秋，按学生年龄大小和文化程度高低，在一个教室中分甲、乙班，进行复式教学，并增设了自然常识。不久分成两个教室授课，改为单级教学。

同年冬，敌人进行“拉网合围”扫荡，为便于开展反“扫荡”斗争，这个学校即和住在沂南县的专署实验小学合并，由实验小学副校长（校长是专署文教科李薇冬兼）杨绪明任校长。合并后，校部仍驻田家峪，教员增加到十儿人，学生六十多名。学校设有教务处，主任先后是芦墉、董迪合，训导主任是吕剑铭。不久，学生分为高级班、中级班和初级班。高级班住田家峪，由校部直接领导；中级班住曲家洞子，由安善平、晨钟负责；初级班住小庄子，由张琳、李敏负责。工作刚刚就绪，敌人“扫荡”就开始了，我们跟随部队转移，途中被敌人合围到旋崮顶，教务主任芦墉同志在旋崮顶下不幸牺牲。

到一九四三年五月，由于根据地连续遭受敌人“扫荡”，军民生活十分困难，学校难以坚持下去，专署决定暂时

停办，教职员分别作了安排。

回忆这所学校，当时师生的革命精神使我们终生难忘。当时师生虽然享受供给制待遇，但生活仍相当艰苦。战争紧急时，粮食供应不上，我们只好将学生分散到老百姓家吃住，常常半饱半饥坚持学习。吃菜困难更大，有时弄点酱油渣、盐水当菜下饭；冬天没有棉被，晚上我们就挤在一起互相取暖。生活这样艰苦，但师生硬是坚持工作学习，没有一个叫苦的，都信心十足，决心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尽管当时教学条件很差，但学生还是学到了一些知识，受到革命教诲，毕业后大都参加了革命工作。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成为省、地、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有的当了高级干部。例如：给孙陶林首长当通讯员的魏基民同志（魏天成）就是抗日子弟小学的学生，曾任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

一九八六年七月

忆抗属子弟学校

孔 周*

沂水县抗属子弟学校于一九四一年春在今院东头乡岩峪村开办。这是一所适应当时战争环境的学校。当时开办这所学校的宗旨是：保存革命后代，培养革命人才。因为凡是参加这个学校学习的学员大都是抗属子女，大部分家在敌占区，父母都参加抗战，子女在家随时就有被鬼子、汉奸逮捕的危险，所以，为了安全，就把子女带到根据地，送进这所学校，一方面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学习抗战道理。当时我家孔家庄离沂水城只有七华里，驻城里的鬼子汉奸经常到我村骚扰，为了安全起见，我父亲托姜家坪谭振德老大爷，也把我送到抗属学校。由于学校临时处于安全地带，入学手续很严，名字也要另起。本来我是祥字辈，在家时名叫孔祥溪，到学校时，改名孔周。这时校长是安善平，指导员是朱孝亭，还有几个老师，名字失记。学校分大、小两个班，我被分到小班，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个。

学生行动一律军事化，早上吹哨起床，先送铺盖，然后跑操，跑操完毕，集体到河沟刷牙洗脸。每人一个书包、一个小木凳和一块方板，木凳和方板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上

* 孔周，现在临沂行署行政管理局任处长。

课时就把方板放到腿上用于看书、写字。学习课程，记得有国语、算数、时事，课本是个石印的小册子。时事课，主要是讲日寇侵华罪行，唤起民众抗日救国，再是苏联红军如何战胜德、意帝国主义等，授课人主要是安善平和朱孝亭。当时还学一些革命歌曲，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八路军进行曲”、“皖南事变”等歌。记得还有这样一首歌词：“晴天呀蓝天，这样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叫声呀老乡听呀听分明，这个就是坚决抗日的八路军，这个就是坚决抗日的八路军。八路呀军来爱护老百姓，老百姓来也要拥护八路军，老百姓来也要拥护八路军”。这首歌主要是歌颂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唤起人民群众热爱这支队伍、拥护支持这支队伍。

学校还有服务于战争的任务，打仗时大班的学生有的抽去侍候伤员；还有组织群众宣传抗日的任务，排演文娱节目，宣传抗日救国。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沂蒙专署在院东头村南河滩召开大会，机关、部队都带着武器整队去的，会场秩序很严，我们也参加了，并且被安排在前排。会上牟宜之专员讲了话，姊妹剧团（大辛、小辛姐妹）演出了节目，我们学校也出演了节目。

那时，师生吃得是公家的，穿得是自己的。开饭时一个班（十人左右）一盆子菜大家围着吃，饭是高粱煎饼，有时还吃小米干饭。穿戴，由于家庭条件不一，有的好些；而我家比较困难，长期得不到一件新衣服，又常常不脱衣服睡觉，冬天生虱子。满身抓得是血，学校以为我生了疥疮，给我用中药治，我自己不好意思说，后来别的同学发现我的衣

服缝内都是虱子，就让我脱下来放在锅里煮，这才解决了问题。

学校开始住在岩峪，由于国民党五十一军六八〇团、六八四团等顽固武装从北向南进犯，听说已占了王庄天主教堂，我们只好向南转移，翻过南大山到了望仙院大庙内。这里离敌人远点，环境又好。在岩峪村时，是在河滩或树下上课，到了望仙院是在庙内东边的一个大屋和一棵大松柏树下上课。庙墙东边有一条小河沟，长流水，每天早晨我们都是在那里洗刷。不久，顽军又向南入侵，我们又向南撤，越过南墙峪东大山来到田家峪。一九四一年十一、二月份，日寇纠集五万余人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地“铁壁合围”、“三光政策”，这时机关、部队集中力量进行反“扫荡”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很难维持，于是上级领导决定停办。大班的同学有的随机关、部队反“扫荡”，小班的同学全部疏散、大部分被送回家。我是被送回家的。

由于受到学校的教育培养，灌输了革命思想，据现在了解，凡经这个学校培育的，不论大、小班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在“文革”前就任河南省某地团地委书记、计委主任，有的在部队任师以上职务，有的任上海市纪委书记、党的十二大中央候补委员。这所学校确实为革命培养了人才，算得上桃李满天下。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二日

略述日寇对沂蒙山区的几次大扫荡

刘 露 泉

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日寇对沂蒙山区进行了第一次“扫荡”。这次“扫荡”没有什么重点，八路军和国民党五十一军都是对象。但敌人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国民党方面。因为这时敌人还瞧不起八路军，所以“扫荡”开始首先用飞机轰炸了国民党省府驻地东里店。接着从泰安、临沂、益都、博山、枣庄等方面分进合击，找国民党和我们的主力部队作战。国民党张里元部和五十一军都受到敌人的打击。这次“扫荡”之后，敌人在沂城、蒙阴、新太、莱芜和比较大的镇店如葛庄、东里、王庄、黄山铺、斜午、大庄、铜井等地安了据点。

一九四〇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了两次“扫荡”。主要对象是我们。在这两次“扫荡”中，敌人企图找我主力决战。我们则避免决战。敌人找不到目标，只是呼隆了一阵就收场了。

一九四一年麦季“扫荡”，敌人主要是抢粮。

同年冬，日寇又对沂蒙山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因为经过“百团大战”，敌人对我八路军的力量引起了注意，所以这次“扫荡”矛头主要指向我们。当时，我军

正沂水在四区抗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敌人“扫荡”就开始了。在这次“扫荡”前不久，日本人水源清（日本特务，被我枪毙）曾把“扫荡”计划透露给我们，这计划是真的，但为时太晚，不起什么作用了。这可能是水源清的一个计谋。在这次“扫荡”中，日寇动用了五万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对我沂河以西、蒙阴城以东、泰石路以南、蒙山以北广大根据地展开了野蛮的进击。开始敌人行动很慢，但在一个晚上，突然从新泰长途奔袭，一夜到达马牧池，企图袭击我山纵指挥部。敌人到达马牧池以后，遂即一边四面合围收缩，一边座地清剿，很快占领依汶、葛沟、马牧池一带。敌人清剿重点分别是南墙峪、大青山和汶河两岸。表面看敌人的座地清剿似乎很严密，但是几天后我们发现他们各自负责清剿地区的界线很分明；且是晚上睡觉，白天行动。这个行动规律被我们发现后，我们就找空隙，同他们周旋。山东纵队跳到费县天宝山，平安无事。抗大跳到双厚东南部，住了两天，夜里安全撤走。但是，山东分局在一个晚上从沂南县留田出发过蒙山的时候，由于到达双厚已是天亮以后，结果遭到敌人伏击。这次“扫荡”是日寇占领沂城以后最残酷的一次，时间也长。

一九四二年秋季，日寇又发动了一次大“扫荡”。敌人动用的兵力，比去秋少一些。重点不再是找我们的主力作战，而是破坏我们的地方政权，目标仍然是南墙峪一带。战术变了，是“拉网合围”。敌人将兵力布置如大网，利用夜间行军，拉到一定范围，再进行合击。其野蛮程度，比“铁壁合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天，我们的一大批地方武

装、地方干部和郭维成带领的五十七军起义部队，被日寇压到南墙峪东大山上，受到团团包围。白天，我们抗击了一天，到晚上突围了。

一九四三年，日寇集中五千多人对岱固一带进行了一次“扫荡”，历时十八天就撤了。

（张茂萱、窦宪诸调查，张茂萱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一九四一年冬反“扫荡”斗争片断回忆

杨 兴*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旬，日军集中五万余人对我沂蒙山区根据地进行了最野蛮、最残酷、又是时间最长的大“扫荡”。敌人用的是“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坐镇清剿”战术，妄图以“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一举摧毁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当时，我在沂水县二区任青救会长、区委委员。敌人“扫荡”前，二区区委根据上级指示和以往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对反“扫荡”斗争作了研究部署。要求各级党的组织，立即动员群众，进行空舍清野，挖地窖、山洞，躲人藏物，使敌人的“三光”政策落空；并用“泥鳅战术”对付敌人的“铁壁合围”；还要求严惩汉奸叛徒，掩护好外来干部。

当时，我们没有料到敌人来得那么快，那么多，“扫荡”时间那么长。我们的反“扫荡”斗争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敌人就大兵压境了。沂蒙山区根据地蒙受了严重破坏。当然，这也是对我们革命队伍的一次严酷的考验。

为了领导群众进行反“扫荡”斗争，区委分工，我到柴山乡活动。我到该乡的第二天拂晓，即枪声四起，敌人突然

* 杨兴，沂水县河套村人，上海市虹口区武装部部长，现已离休。

从四面八方而来，把山东省战工会警卫团（又称青年团）包围在合击圈内。警卫团一看，突围困难，当即下令分散隐蔽。团长温士友和警卫员躲在山上的一个石棚里，被敌人发现，抓到蒙阴城里。温士友很有才干，他说服了伪军看守班长，带领全班起义，把他救出蒙阴城。

在柴山乡，我与该乡乡长王锡元一起，白天钻山洞、地窖，晚上出来活动，了解情况，并找点东西吃。王是本土马驹岭村人，熟悉本地情况，因此我们与敌人周旋了十多天，安全无事。但是我总感到用这个办法进行反“扫荡”斗争有点不妥。一是耳目闭塞，情况了解不多；二是无法开展工作。于是，我们就去营盘村找本乡支部书记武善孝同志。在一个晚上，我们到了武的家里，他的老婆说，武被敌人抓去，至今没有下落。我们对她安慰了一番，并说设法营救。我们趁着天还未亮，就顺着端云崮西坡向南直奔南套村。该村支部的同志把我们安排在村南山洞里，给了我们一壶凉水和几个熟地瓜，以备充饥。这个山洞只能容下我们二人，吃喝的东西有了，小便也能对付，就是大便成了问题。我们蹲在洞里，听到敌人从洞前经过，一动也不敢动，这样坚持了一个白天。

我们是本地干部，熟悉地理情况，和敌人周旋，还比较好办。可是外来干部和一些部队的同志就感到困难了。特别是一些女同志，她们经受的艰难更甚。有的女同志化装，用热胶粘发髻，把头皮都烫烂了。张斌、李洪两位女同志，在敌人清剿最紧的时候，只好潜到敌占区里讨饭。娄家玉同志剃成光头，装成男孩子去放猪。有的部队的同志，疏散后，

由于不熟悉地理情况，遇到敌人，找不到地方隐蔽，又不能当俘虏，就把武器摔碎以身殉国。

前面谈到的柴山乡支部书记武善孝同志，他被敌人抓去后，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被我军某部连指导员李守仁救了出来。李守仁是二区葛庄乡下胡同峪村人。这次敌人“扫荡”开始，部队疏散，他换上便衣，带着一支匣子枪，与敌人转山头，打麻雀战、跳蚤战。一天早晨，他到了石岭官庄，走进一个空空的大院，想找点东西吃，找了一阵子，只找到一碗绿豆，里边还有许多沙子和老鼠屎，他连忙捡了捡就下锅煮，刚刚点上火，敌人就进村了。李守仁提着匣子枪冲到大门口，见有一个戴着大礼帽的伪军带着一个老百姓朝他走来，李守仁抡起匣子枪，将那伪军打死，那个老百姓吓得跪下求饶，李守仁说，你不快跑还罗嗦什么！这个老百姓赶紧爬起来跑了。此人便是武善孝，他就是这样从敌人手中逃出来的。

在南套村的南山洞里，我和王锡元蹲了一天。天黑敌人走了，我们二人回到村里。老百姓全部逃光了，村里寂静得使人胆寒。我们向北到了中峪村，也未见一个人影。这时我俩肚子饿了，就到该村我四婶的娘家找到一筐地瓜，我们一边啃着一边计划下步如何行动。我说，敌人“扫荡”已经二十多天了，我们这样躲来躲去，既不见村干部，又听不到上级指示，就象座在迷航的船上，在茫茫的大海里飘荡，这样不行，要设法找村干部了解情况。于是，我们每人拿着两个地瓜就走，刚刚走到大门口，就听到街上有脚步声，我俩立即闪进门里，一边一个，屏着呼吸，听动静。那脚步声越来越

近。我猛喊一声：“干什么的！”脚步声停了，却没见人。于是我又喊了一声。接着对方叫道：“小杨，你是小杨吗？”我一听是县委组织部长武杰同志的声音，接着说：“我是小杨。”我俩一下子扑到他的身边，一看还有县委的李道德同志，真是高兴极了。

我们一起走进一家老百姓的屋里。武杰同志说：“抓紧时间，你们先把这里的情况简单地汇报一下。”我说，区委书记李德民分工去了诸葛乡，联络点就在埠前村他的家里。我家是河奎村，我分工在柴山乡坚持反“扫荡”斗争，联络点原来定在马驹岭，因该村处在南北大道上，敌人来往不断，只好放弃了。

我汇报完毕，武杰问道：“你们明天怎么行动？”我说明天一早我送你们去南山洞里躲着，我们另想办法。武杰一听，严肃地说：“反‘扫荡’就是钻洞吗？”我说：“不钻洞不就被敌人抓去吗。”武杰同志接着说：“现在开始传达县委的紧急指示。”他说，县委研究了反“扫荡”中出现的新情况，认为这次敌人大“扫荡”，是对我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一次严重考验。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要坚贞不屈，领导群众，坚决斗争。现在有些人被敌人的一时猖狂吓坏了，有的妥协逃跑，甚至变节投敌。这对我们的革命队伍来说，并不可惜，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革命者。他们走了，将使我们的革命队伍更加纯洁，更加精干。武杰同志接着宣布：县委宣传部长赵涤尘擅自批准城子乡乡分队向敌人“假投降”，政治影响不好。为了挽回影响，教育本人，县委决定给予赵涤尘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并撤销其宣传部长职务。县委要求立

即向全体党员干部传达，以利共同接受教训。

武杰同志又向我们传达了几项紧急任务：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办法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坚定胜利信心。告诉群众，八路军还在，共产党还在，使群众坚持抗战到底，坚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②要向广大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为了党的革命事业，为了民族解放，每个党员要经起艰苦环境的考验，保持革命气节。③坚决铲除汉奸走狗、叛徒，挖掉敌人的耳目。如果发现有人充当敌特，坚决镇压。④要把部队分散埋藏的武器搜集起来，把分散的武装人员集中起来，夜间袭扰敌人，白天分散隐蔽。我们反“扫荡”不能老是蹲山洞，要领导群众进行斗争，主动打击敌人。

武杰同志传达完毕，李道德同志又作了补充。这时已是深夜十点钟了。武杰指示王锡元回柴山乡向党员、干部传达县委指示。要我去找区委书记李德民传达县委指示精神，并设法再向其他乡传达。

于是，我冒着漆黑的寒夜，涉过冰冷刺骨的沂河，通过敌人的封锁，绕过敌人的据点，到达离埠前仅有二、三华里的河西村附近。我不了解底细，不敢贸然进村，就隐蔽在村北的一条沟里，向北观察埠前方向的情况。我观察了许久，没见一个人，只好蹲在沟里听听动静再说。这时我的肚肠饿得打滚，眼睛也睁不开了。还觉得腿上阵阵作疼，我想提提裤脚看看我的两腿，一提没有提动，低头一看，原来是过沂河时，两腿被冰凌都刺破了，鲜血把我的腿和裤脚粘在一起。当时冻麻了，不觉痛，走了几里路，暖和过来，才恢复了知觉。这时，口渴、饥饿、疼痛、疲劳一齐向我袭来，一动也

不想动了。但想到还有重任在身，只好强行振作，眼睛不停地盯着埠前村，可望遇到一个老百姓，探听一下情况。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才看到有人从南边陆续向埠前村走去。我也放开胆子直奔该村。真是幸运，一进村就遇到李德民同志。我向他传达完了县委的指示，又汇报了柴山乡的情况。李德民要我在他家里休息了几个小时，又派我到道托乡传达县委指示。

道托乡是二区东边的一个乡，青沂公路纵贯其中，公路沿线设有敌伪据点，敌人来往不断。李德民找来一只粪篮子和粪叉子，叫我扮成拾粪的，又把我的手枪留下，给我一支匣子枪，将我送到村东头。我径直向东南方向走去，走出不远，看到一队敌人（将近一百）顺着岭上的大路向沂水城方向行进，我马上退到岭西坡的一个沟底，待敌人过去，我才越过岭顶到了道托乡圈里村。该村刘村长（名字失记）当时还很年轻，是共产党员，组织上安排他当“两面”村长，他家也是我们的联络点。我走进他的院子，屋门开着，我刚想进去，一回头，猛然看到已经投降国民党五十一军顽固派的我二区古村乡的通讯员从篱笆外正向刘村长的大门口走来，我立即闪到房东边的草垛后，掏出枪，等着他。其实他并没看见我。他大摇大摆地走到刘村长的屋里，我蹲在草垛后面听动静，原来他是来给国民党五十一军顽固派催给养的。刘村长应酬了一番，答应明天送去，就把他送走了。刘村长把他送走以后，我从草垛后边出来，刘村长一看我在，大吃一惊，赶快把我让进屋里。我向他交代了任务后，他把我安排在一个姓孙的同志家中隐蔽。我又叫他通知乡干部晚

上到寺后村开会。到了晚上，乡支书黄学书等同志按时到了寺后村，我向他们传达了县委和区委的指示后，黄学书向我汇报了道托乡的情况。会议很快结束。当夜，黄学书等同志就分头出发传达县委和区委的指示去了。我在寺后住下，睡了一个多日来难得的好觉。第二天返回埠前村。

回到埠前，我首先到李云超同志家中见了李云同志，向他汇报了敌人“扫荡”的情况。李云是薛暮桥的化名，他是这次敌人“扫荡”开始后来到埠前村的。我向他汇报完毕，又去找李德民回报道托乡的情况。李德民同志又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回柴山乡处理乡干部刘××向敌人“假投降”的问题。我将此事处理完毕，按照事先约定的地点，当夜返回下胡同峪，在王明富同志家里见到李德民。这时王明富同志已经牺牲，他的姐姐王怀英当时在乡里工作。

此时形势很是紧张，国民党顽固派乘敌人残酷“扫荡”之机，向我二区根据地发动进攻。我们只好暂时放弃，撤到沂水西南山区中心根据地。这时，二区区乡干部，还有部队的同志，共一百余人，已经集合好了，准备马上出发时，李德民同志对我说：“这次行动很是仓促，有的干部未及通知，只好集合多少先走多少。我们路过柴山时，再通知柴山乡的干部一起转移。”就这样，我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了我们苦心经营三年之久的二区根据地。

我们到了沂水西南山区中心根据地，驻在桃花坪、碌砬荏村。我被分配到柴山乡撤出的干部队伍里活动。县委把撤到这里的乡干部和收容的部队战士编成一个中队，由李钟敖任中队长，随县机关行动。这时敌人“扫荡”已经结束，县

机关干部和部队也都向这个地区集中。就在这个时候，二区区长王卓然同志因肺病在我们驻地病故。大家无比悲痛！

这时，我才亲自听到，在敌人“扫荡”中，我中心根据地也受到很大的摧残。其中盘车峪村，被敌人血洗了。该村靠近边沿地区，一天突然遭到敌人包围，群众都被赶到一个谷场里，敌人逼着群众交出八路军，大人小孩没有一个说话的。其实人群中就有我们的同志。敌人见群众都默默不语，立时野兽般的大发作，用机枪向着人群扫射，在场群众无一幸存。我还听说，棘子山的八个民兵被敌人绑在村前的大梧桐树上，堆上高粱秸，活活烧死。真是残忍之极！

经过这次“扫荡”，我们部队减员很多，沂水县青救会长杨琳同志根据县委的意见，派我到六区，以帮助青年工作的名义去扩军，组建沂水青年大队。在我去六区的时候，该区青救会长已经投敌，我的侄子杨奎金接任青救会长。我在六区，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动员了三十余人。由于环境恶化，人员很难巩固，在我为此发愁，整天担心新兵逃亡的时候，组织上调我去山东毛泽东青年干校学习。接到去学习的通知后，我到县委写了介绍信就去沂南县长山庄山东分局报了到。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二日

一九四一年冬在日寇大扫荡中 的一段经历

张 谦*

一九四一年冬，日军纠集五万余人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扫荡”。野蛮的“三光”政策，给沂蒙根据地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惨重的浩劫。当时广大干部群众都投入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那种艰苦之状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当时，我在沂水县任妇救会会长，不仅亲历了那个严酷的岁月，而且曾有一段虎口余生的险恶经历。四十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忘记，是党组组及沂水县许多同志将我从敌人的魔掌中营救出来，使我获得第二生命。每每记起此事，我的心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敌人“扫荡”开始，来势异常凶猛。当时我与县抗联秘书王富元、通讯员小武等同志住在崔家峪南部柿子峪村党支部书记王东泽同志家里。该村位于沂水县西部边远山区，我们估计敌人不会很快“扫”到这里。不料一天突然响起枪声，敌人来了。我们几位同志立即分别随着转移的群众跑到深山沟里。我是同王东泽和他的父亲、母亲、妹妹、堂弟王

*张谦，山东省周村人，曾在北京铁路局临时工程指挥部工作，现离休。

东元（当时任村支委）一起转移的。枪声过后，我想起我们的油印机和一些文件还在王东泽家里，由于仓促走出，未及收拾，便与王东泽和王大爷回去掩藏。我们急急忙忙刚把那些东西埋到猪圈里，敌人的枪声又在附近响起，我们立即跑回山沟。这时王大爷对我说：“看来到处都有敌人，你不能到别处去了，就和我家一起躲难吧。”

在一条深山沟里，我和王东泽同志全家隐蔽了二、三十天，其间都是王大爷冒着危险回村弄饭给我们吃。这时天气越来越冷了，我还穿着单衣，发的二十元（北海币）棉衣费还在我的衣袋里，由于敌人“扫荡”没有来得及做。多亏我当时才二十二岁，年轻身有火力，咬紧牙还是能够坚持的。

就这样，我们在敌人包围圈内，在寒冷的袭击下，在露天的山沟中，硬是坚持到“扫荡”后期。但谁想到，敌人的清剿却越来越紧了，开始搜山。这时王东泽、王东元、王东甫商量决定向大官庄转移。王东泽的姐夫刘佩吉同志就是该村人，我们是投奔他去的。该村就在黄山铺敌伪据点附近，到此隐蔽是比较安全的。

当日夜间，我们即开始向东转移。我是和王东泽、王东元、王东甫、王东泽的母亲、妹妹一起走的。我们悄悄地通过敌人设在常庄的封锁线以后，向着大官庄前进。行至该村附近，我和王东泽的母亲、妹妹落在男同志的后面，又遇到岔路口，不知朝哪里走，只好停下来等待他们来接。等到天亮，王东元和王东甫把我们迎进大官庄，刚刚走到刘佩吉同志的家门口，不料顶头遇上从黄山铺据点出来的伪军，他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从西山里过来的，于是就用怀疑的眼光盯

着我们，硬说我们都是“八路”，并进行搜身。当时我的衣袋里正带着我的手章、钢笔、二十元北海币和几张机关介绍信，如果被他们搜出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吃不消的。真是急中生智，我便走到一堆石头旁边，佯装绊倒，乘机把这些东西塞进石头缝里，伪军没有发现，我也暗暗庆幸。搜查很快轮到我了，我想，你们尽管搜吧，反正得不到任何东西。可是没有想到，我的衣袋里还剩下一把破牙刷，被他们翻出来了，伪军们一见这把破牙刷，就对我发生怀疑，说我是“女八路”，说王东泽、王东元掩护“女八路”。我们都不承认，分辩说我们都是老百姓，原来互不相识，是逃难走到一起的。伪军一听我说话是北路口音，不是当地人，就越发怀疑了。于是就毒打王东元，王坚决不承认认识我。最后伪军把我们都抓了起来，带到黄山铺伪军据点。这天是十一月十九日。

黄山铺据点有两个围子，日寇、伪军分别居住。伪军围子是在外面，围子里还住着几户老百姓。我原就听说，伪军队长姓韩，绰号韩二打狗子，此人非常凶狠，是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在沂水西乡是很有“名”的，凡是落在他手中的同志，十之九难以生还。他有个贴身文书，名叫张熙岳，是黄山铺以西岳庄人；还有一个翻译，姓解。

当天晚上，他们三人对我审讯。我早料到，必须亲临刑讯这个关口，就预先准备了一套口供。因为我是北路口音，我说我是周村人，名叫魏秀英，几年前哥哥来沂水做生意，在沂水娶了个嫂子，我是随哥哥到沂水来的，嫁给虎峪村徐金秀，如今哥哥已经死了，嫂嫂逃难，不知哪里去了。韩二打狗听了我的供述以后，又令张熙岳检查我的发纂。我

知道这是敌人常常用来检查“女八路”的一招，心里有些惊慌。谁知张熙岳检查了一番之后，对韩报告说：“是生发，不是假发。”听张这样一说，我的心顿时平静下来。我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是张熙岳粗心吗？

第一次审讯总算是幸运地过去了。审讯后他们并没有把我押进什么监狱，而是押到一个同伪军毗邻的一个老百姓家里，没有伪军看守。这使我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会把我放在这里呢？我当时猜想，他们可能还没有把我当作“要犯”看待吧？记得这家姓邓，有一位大娘当时约四十多岁，表面看很是善良，对我非常同情，常常用一些温暖的话安慰我。因为我一时尚搞不清她究竟是什么人，只对她的同情表示感激，别的话却不敢多说。

过了几天，其他被押的人都陆续地由本村花钱保出去了，而我却一直无人来保，这使韩二打狗子增加了对我的怀疑，因此，韩即对我加紧了审讯。每次审讯，我始终没有变更我原来的口供。有一次，韩二打狗子问我的丈夫徐金秀哪去了，为什么不来领我。我说我们躲难跑散了，我不知他的下落，他也不可能知道我在这里。韩见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气得暴跳如雷，指示打手对我加刑。但这时我的主意已定，不管你姓韩的如何厉害，反正我的口供就是那一些了，因为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不料，韩又使出新的一招。一天，由几个伪军押着一个人到邓家去认我。后来我听说这人名叫张文礼，但不知其何许人也。张文礼看了看我，当场就摇头说：“不是，绝对不是。”听张文礼这么一说，我立时觉得事情不妙，心里有些

紧张。他们走后，我反复地思考：张文礼是什么人物呢？他所说的“绝对不是”后面还有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不是徐金秀的老婆或者不是“女八路”吗？若是前者，那么，下一步将如何对付呢？

正当我极端焦虑，考虑如何对付敌人的时候，张熙岳单独来和我接触了。他先对邓大娘说：“二婶，你看着门，我有点事。”邓大娘到了大门口以后，张熙岳以很关切的口气悄悄地问我：“你是不是张谦？”我回答说：“我不是张谦。我也根本不认识张谦。”张说：“你若是张谦，就如实告诉我，可别误了时机。”张熙岳简单地问了这些话就匆匆地走了。张走后，邓大娘对我说：“张熙岳可是好人哩。”这时我的脑海里浮动起一连串的问号：第一次审讯，张熙岳检查我的发纂时，为什么说是“生发”？他为什么今天单独来问我是不是张谦？邓大娘为什么说他是个好人？这些问号，使我产生了一个猜想：张熙岳可能是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吧！但这时我还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心下决定，下一步相机试试看吧。但愿有幸，逆境中遇上自己的同志。

又过了一天，伪军们都出发了，张熙岳趁此机会又去见我。他说：“郭宜春叫我关照你。”我说我不认识郭宜春。他说：“那你就把你说的这些话写写吧。”说罢，他就递给我一支钢笔和一个纸条，我在上面写了“我不是张谦，也不认识郭宜春。”张把我写的纸条带走后，当天晚上邓大娘给我转来一封信，我拆开一看，原来是沂水县公安局长郭宜春同志的亲笔，信中说了些安慰我的话，要我相信组织，一定

设法把我营救出去。看到郭宜春同志的信，我感到非常温暖、激动！这时我也可以完全断定张熙岳是自己的同志确为无疑了。邓大娘也是好人，也是没有疑问的。我于是给郭宜春同志写了回信，由邓大娘交给了张熙岳，第二天我又接到郭宜春同志的信。后来我听说，这些书信来往，张熙岳同志的母亲也在中间传递过，她老人家也为营救我操了很多心。

又一天，张熙岳又瞅了个机会去对我说：“事情出了叉头，你不能再说你是徐金秀的老婆了，要把口供改一改。”我说，自上次那个姓张的来过以后，我就想过，我准备说，我的丈夫干了国民党五十一军，早已不知下落，嫂嫂也不能依靠，没有办法，最近逃难流落到徐家，所以我说我是徐金秀的老婆，其实不是。张熙岳听了我的这段叙述后说：“这样说可以，一定记住，不要说错。”

为了使我尽快脱离虎口，组织上曾经想过几种营救办法。其中一次打算武装营救，张熙岳曾去通知我做好准备。我也为此请邓大娘领着我装作赶集的样子（当时集在伪军据点围子内），观察了地形，从哪里越出围墙都选定了。后来郭宜春同志传信给我，说武装营救恐怕有失，改变计划，仍然通过内线关系营救，

过了几天，张熙岳又悄悄地去对我说：“现在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上小诸葛陈大娘当作你的嫂子来接你。记住，口供不能变样。”听说陈大娘亲自来接我，我当场禁不住异常高兴。陈大娘，这位经常同我一起工作的机智勇敢的中年农村妇女干部，想她在我被捕以后，定然是日日夜夜为我担心，为我焦虑！现在我将要脱出魔窟，又是他亲自来接，这

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啊！

当天晚上，又有一个叫徐仁东的人到邓大娘家去看我，他说：“明天，你嫂子就来领你回家，受了点委屈，见面可不要哭啊。”后来我才知道，徐仁东就是黄山铺南三四里蒋庄人，是地主，与韩二打狗子过从甚密，作过不少坏事。这次是被我们的政府抓了去，对他讲明政策，劝他改恶从善，立功赎罪，这样把营救我的任务交给了他。徐仁东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便满口答应下来。于是他按照我的口供，和韩二打狗子进行交涉，终于将我保出来了。想不到我的不幸遭遇还给徐仁东提供了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哩！

第二天，即十二月三十一日，正是阳历除夕，县委派二区青救会长和职工会长（姓名失记）作为我的亲戚，用独轮车推着我的“嫂子”——陈大娘到了黄山铺据点。陈大娘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先去见了韩二打狗子，她完全装作一个乡愚式的农村妇女，对韩又是鞠躬行礼又是道谢。“谢”过之后，就领着我走出据点，座上车子，到了蒋庄徐仁东家。徐仁东准备了一桌菜请我们吃饭，我们急于赶快离开这个危险境地，就婉然辞谢了。走出蒋庄，我嫌座独轮车走得太慢，便下车一气跑了十几里，到达虎峪附近的一个山村，县青救会长杨琳同志早就在此等候我们了。这天正是除夕，我又安全归来，真是“双喜”临门，我们高兴地吃了一顿水饺。

次日，我同杨琳、陈大娘等同志到鲁中区党委见了书记霍士廉，霍士廉见我们顺利归来，非常高兴，他当场表扬了陈大娘，并奖给他一身新棉衣。

获释后我才知道，在营救我的过程中，霍士廉同志亲自

过问营救工作，刘鼎普同志和沂水四区区委书记李子仁同志也操了很多心。陈大娘等三同志去接我，就是李子仁同志亲自安排的。为了打通各个关节，组织上还花上了两千多块钢洋和四两大烟土。事后二地委组织部长刘建中同志曾和我开玩笑说：“将来张谦找婆家，要叫她的爱人拿两千块钢洋，不拿就不嫁给他。”说得大家都笑了。

还有刘佩吉同志，他真不愧是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在我被捕后，他听说我是在石堆边绊倒，估计此举并非偶然，我被押走以后，他过去察看了一番，把我藏下的东西收起来交给组织，我获后，那些东西都“完璧归赵”了。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张茂萱整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一九四一年前 我在沂水县一区工作的片断回忆

刘俊芝*

(一)

沂水县一区区乡村民主政权建立是在一九三九年。为了争取和团结各阶层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抗日，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民主政权的建立实行“三三”制。

一区是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份在黄石山前召开的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八、九十人。一区区委书记高复隆同志讲了话。会议选举杨希古（当时是民主人士）和刘子陵（共产党员）为正副区长。我和谭永则、王克仁三人出席了会议。当时我是秘密乡总支组织委员（黄子中是乡总支组织委员，以公开的身份进行工作），谭永则是秘密乡总支宣传委员，王克仁是秘密乡总支保卫委员兼城子村村长。

斜午乡公所在一年前已选赵希朴为乡长，工作人员有王福田等同志。村政权也开始建立。政权的建立实际上是我们党领导群众同地主富农封建势力斗争的结果。

六区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份在扈山店（也可能是武家庄）

* 刘俊芝，沂水袁家城子人，现在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工作。

召开了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九十多人。徐中林同志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会议选举宗春元、袁子杨（袁家是六区韩家庄人，开明人士，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为正副区长。我和谭永则二人也出席了会议。

（二）

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武装斗争。我们从一九三九年冬开始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自卫团组织，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身体健康的青壮年都参加。自卫团的任务：一是拆桥断路阻挡敌伪军；二是抬担架、运送公粮；二是站岗放哨监视敌伪活动；四是传送情报；五是配合八路军打击敌伪对我根据地的进犯。

群众开始参加自卫团时有顾虑，经过教育，提高了觉悟，以后参加自卫团的群众就越来越多。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自卫团的基础上又选拔年轻力壮、政治上可靠、对敌斗争勇敢的人组成基干自卫团。从此有了基干自卫团和普通自卫团之分。后又挑选好的组成游击小组（这时还没民兵，在一九四二年才把游击小组改为民兵组织）。村中的武器由游击小组掌握使用，在党绝对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活动。村支书兼政治指导员，支委或党员干部任自卫团长和游击小组组长。

我在一九四〇年六月被选为斜午乡自卫团团长。七月份我又被选为一区自卫团团长，在区委统一领导下配合工农、青、妇组织开展工作。当时工作基础比较好的有岩峪乡、斜午乡等。黄石山乡（该乡有上高庄、下高庄、崖上、

崖下、埠西、念子、胡家庄等)和朱陈乡的村庄只有少数人参加普通自卫团。自卫团发展较快,到一九四一年全区大约有四、五千人。

(三)

为了加强和开辟游击区工作,一九四一年一月份建立了一区朱陈乡总支委员会,区委决定我任乡总支组织委员。一个月后改任乡总支书记兼工作团长和乡分队政治指导员(有八、九个队员,实际上是乡通讯员和炊事员),以公开身份领导乡的工作。(刘××为乡总支书记,在西泉庄党员赵全升家里,以卖食油为掩护进行工作,后回家探亲不归,我接任。)传格新任乡总支宣传委员,他在黄石官庄以教学为掩护进行工作,工作时间不长,区委就将他调走。毛东海任乡总支保卫委员并在上峪子村他叔父家里掩护进行工作。

我们去朱陈乡前,区委书记杨成栋和区委组织委员徐华之两人交代该乡只有六个农村党员,他们都是单线领导作情报工作的,分布在黄石官庄(只有一个党员,叫蔡云兴,以后又把他的儿子和远房侄子吸收入党)、西泉庄(有赵时升、赵全升,以后又发展田富五和齐××等五个党员,并成立了支部,赵时升任支书)、下峪子(一个党员,叫王富亭,后壮烈牺牲)、东泉庄(一个党员,叫王光岱)、东朱陈(一个党员,叫刘东甫,没落地主,从沂水城出来的,比较开明,做情报工作,不知谁把他发展为党员。记得有一次我到他家,刚坐下,黄山铺据点汉奸队来了,其中有几个上他家来了,刘东甫的爱人很开通,叫我到她房里藏起来。他

夫妇俩应付那几个汉奸)。我们把六个党员逐个审查后，乡总支委员会决定按照上级指示，把王光岱、刘东甫两人作为党的同情分子看待，不让他们做党的秘密工作，不收党费，不宣布开除党籍。

我们去时，朱陈乡乡公所已建立，乡长是王育(家是木上贤村)，副乡长是蒋晓楷(开明人士)。还有民政和财粮、文教等五、六个干部。后区委又派去工青妇干部各一名，这些干部中没有一个党员。

朱陈乡北至蒋庄、西朱陈、东朱陈，南至吴坡、长山官庄、下峪子、上峪子、安子庄、木上贤等村，西至刘家岭、西泉庄、黄石官庄，东至大埠岭、堽埠口、葛子铺(该乡总书记高复顺在家以务农为掩护进行工作)、沂河边。朱陈乡离葛子铺、沂水城、黄山铺敌伪据点很近，敌伪经常出来掠夺财物、抓壮丁和拉伕，抓捕共产党员、干部、积极分子，还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有一次伪军牛先元突然到上峪子把区委刚派去的青年干部抓到沂水城拷打。朱陈乡离敌伪据点很近，对敌斗争尖锐复杂。根据上级指示和本乡斗争的形势，总支决定本乡任务：一是发动群众不向敌伪交纳钱粮和其它物品，实行空舍清野；二是创造条件，逐步建立精干的自卫团、工、农、青、妇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三是在有条件的村庄建立村民民主政权，离敌伪据点近的建立两面政权，支持抗日，应付敌人；四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抗日，瓦解敌伪军；五是在工作实践中发现培养建党对象，逐步建立起党组织。

为完成上述任务，乡总支认为一要深入群众，依靠发动

群众，坚决而灵活地执行上级指示；二要根据本乡情况，把村庄分为两个类型，根据不同类型提出不同的任务与要求。一类村庄必须深入群众，发动群众逐步的建立抗日组织和村民民主政权，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这类村庄有长山官庄、下峪子、上峪子、安子庄、木上贤、刘家岭、西泉庄、黄石官庄等。在这类村里，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到一九四一年八月份发展了二十个共产党员，建立了三个支部。其中上峪子村庄就发展了七、八个党员，成立了支部，支书是毛××、组织委员是刘成（兼村长），宣传委员的姓名失记。该村还建立了自卫团和妇救会。安子庄也发展了七、八个党员，成立了支部，贾文彬任支书，支委姓名失记。该村也建立了自卫团、妇救会、妇女识字班，工作较好。西泉庄发展了五个党员、成立了支部，支书是赵时升。长山官庄发展的党员是赵建华，还有她哥哥赵××。赵建华入党后调乡做妇女工作，她妈妈赵大娘是妇救会主任。木上贤村也有自卫团、农救会、妇救会。第二类村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开展对敌斗争，把对敌伪的斗争工作伸展到敌伪据点内。

（四）

一九四一年冬季敌人用五万人对沂蒙山区大“扫荡”。敌人“扫荡”刚开始就有两名干部“假投降”，一是王克仁，一是乡分队长黄培孝。乡分队变成了“汉奸队”。（此事在第二辑中有的同志已经讲了，故不再多说）离袁家城子伪据点五华里路的黄家坡子也有一名假投伪军的。袁家城子

是属一区斜午乡，黄家坡子属六区（后改为峙阳区）。六区中队队长黄高田搞“假投降”（他就住在黄家坡子），据说是经过县委一位部长批准的。黄高田经批准后领到日本高级特务水源清的委任状，把我党领导的区中队一下子变成了汉奸队，六区不少区乡干部住在黄家坡子伪据点里掩护着。日本高级特务水源清不住在敌伪据点而住在大安子庄。他伪装进步和利用各种欺骗手段作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了欺骗。而那两名“假投降”的党员干部却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

为解决黄家坡子黄高田“假投降”的问题，县委邵德孚同志亲自写信叫我和张少久交给黄高田，叫他立即把队伍拉出来改为区中队。我们两人从南墙峪出来刚到武家庄，日本鬼子和汉奸队从沂水城出来“扫荡”了。敌伪军从扈山店经过黄家坡子、荆山岭，然后回沂水城。我和张少久被敌伪赶到灵山上，待敌伪军走后我们晚间才到黄家坡子。我把信交给了黄高田，他看信后说：“水源清很快就发给他们步枪、机枪，等拿到武器后再把队伍拉出来。”我说不要上日本人的当。吃完晚饭，当晚我们就走了。张少久回了袁家城子，我自己回南墙峪向杨成栋汇报。后由他转报县委，以后县委派武装去黄家坡子解决“假投降”的汉奸队，对主要分子作了严肃处理。

1986年9月25日

城子乡乡分队假投降事件经过

杨成栋*

城子乡乡分队假投降事件，到底是怎样回事，批准人是谁，参加的有多少人，谁是领头者，怎么活动的，众说不一。为了搞清这些问题，我想把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略述如下。

一九四一年冬，日军纠集五万余人对沂蒙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铁壁合围”扫荡，敌人到处安设据点，弄得大部村庄惶惶不安。当时我们一区除了岩峪一带外，其它如城子、胡家庄、朱陈等村庄都属边沿游击区。到游击区掩藏的同志比较多，掩护任务相当重，当时只区委党校学员在此掩藏的就达二十多人。为了作好这项工作，我们区、乡干部均作了分工。南部城子乡、司马乡山区委组织委员徐华之负责，北部由乔中勋负责，中部沂城乡、朱陈乡由我负责，重点是沂城、朱陈、上、下峪子、安子庄等村。

敌人“扫荡”前期，主攻目标是我中心根据地姚店子、南墙峪一带，后来延伸到边沿游击区。敌人来势很猛，天天野外清，村内查。面对这种形势，袁家城子乡城子村党支部委员王克仁提议，为了掩护同志，保存实力，更好地进行反“扫荡”斗争，要成立一支“汉奸武装队”以“维持秩

* 杨成栋，沂水县金牛官庄人，山东省农机局第一副局长，现离休。

序”，避免敌人到处骚扰。对于这个提议，当时城子乡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表示同意，但都不敢作主。对此，王克仁便跑到区委找到组织委员徐华之商量，徐感到事关重大，一时未敢表态。其时，适逢分到六区领导反“扫荡”斗争的县委宣传部长赵涤尘同志被敌人压到一区，徐就把王克仁的想法告诉了赵，赵感到这是好主意，未作慎重考虑，未经县委研究，自作主张，当即批准，并且决定由王克仁出面组织。徐立即转告了王克仁，王匆匆忙忙跑到沂水城见了伪军大队长牛先元，谈了他的来意，牛点了头，当场给了王克仁一个“自卫团长”的官衔。王领到委任状即返回城子乡，他觉得大事已成，非常高兴。但又感到自己不懂军事难胜重任，于是就叫乡分队长黄培孝充其助手，分管军事。黄同意了，就把他领导的乡分队二、三十人一并编入“自卫团”，成了“伪军”，在袁家城子搞起“伪军”据点。后来又有不少人参加，就连在家避难的黄家坡子村鲁中一支一团的连长黄高田也参与其中，共发展到一百多人枪。开始他们还好，经常与我区、乡联络，真诚为我工作。不久，个别人思想逐渐变了，弄假成真。

一天，黄高田、王克仁等带领全部人马到南墙峪、院东头一带搞起“扫荡”来，下了院东头民兵的枪，抢了埠前庄、刘家店子等村群众的衣物。徐华之闻知非常恼火，想去找我报告没找到，就去朱陈乡找到乡支部书记刘俊芝，把王克仁等人的行动告诉了他。刘俊芝认为事关重大，不找我不行，就到了峪子，和我相遇，把事情向我谈了。我们便急速一同前往袁家城子，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刚到，正见这伙人

耀武扬威地从南墙峪一带回来了，有的斜背着枪，有的枪上背着包袱。看见这种情况，我们确实很难抑制心中的怒火！影响太坏啦！我们也听到有人在骂“八路汉奸队”。徐华之建议我想法让他们尽快反正，挽回影响。这时，敌人还在姚店子一带“清剿”，到底如何做他们的工作，一时未想出好的办法。我只好先派赵昌龄同志打进去，做黄培孝的文书，监视他们的行动。之后，我又去找县委，请示如何命令他们反正问题，路经李家评，巧遇县委分派下去帮助反“扫荡”工作的杨琳同志，我把情况先向他谈了，他叫我令其赶快反正。我到了许家峪找到县委的郭宜春、邵德孚同志，当面承认了错误，准备速回通知黄培孝、王克仁等人马上反正。尚未动身，周洪恩带着我们的一支特务队赶到这里，我们对如何做乡分队的工作又作了研究，决定先让特务队打进去与他们联系。但没等我们回去，狡猾的牛先元已把乡分队调到县城进行审查登记，编入了伪县大队。之后，牛先元又派了一个中队到袁家城子对分队加以监视。

我们回去后，根据我们事先的计划，开始行动。先由周洪恩派特务队的同志打进去，指示黄培孝利用请牛先元中队的客，里应外合，解除他们的武装。这时春节刚过，黄培孝就天天请客，大小头目都请了。一次，趁酒酣之际，我们将牛先元那个中队的大小头目全部抓起来，其余伪军全部缴械，当了俘虏，交给当时驻在院东头香炉子崖的军分区。以后，县委追查搞假投降事件的责任时，给了赵涤尘、徐华之党内警告处分；给了城子乡副支部书记（正书记张家三扫荡前就投敌）张民三记过处分；给了王克仁开除党籍的处分，

并赶回家。王对此不满，遂又投到斜午乡伪军据点当了汉奸。不久，县委派武杰、张勇同志将其处决。

（李永亮根据录音整理）

一九八三年

忆反“资敌”斗争

段子珍

一九四二年春，我从鲁中党校分配到二地委，地委书记王涛和我谈话，要我回沂水县柴山区任区长。他说，柴山区是沂水根据地南北交通的咽喉，但其西部，拉山以西地区被国民党顽固派占领，东边是敌战区，“三角斗争”比较尖锐；那里还有个别坏人，为虎作伥，搜刮民财，“资助”敌人。要我去后，先扩充地方武装，开展对敌斗争。

我到了柴山区。当时区委书记是杨成忠，副区长是王连三，武委会主任是黄培泉。区中队仅有六、七人，队长姓毛（名字失记）。单凭这么几个人来应付面对的复杂斗争形势我认为是很不够的，就和杨成忠同志商量，设法筹款买枪。我提议，黄家庄、李家庄、团坪峪等村各大姓的老林里有很多大树，可以杀掉换钱购置枪支，把各村青年武装起来，建立一支民兵队伍。杨成忠同意了。但在当时，要动一个族林的公产，是有很大阻力的。对此，我和杨成忠费了一番考虑，想来想去，最后决定采取这样一个妥善办法，即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各姓中有名望的长辈办理此事，可能不会引起问题。这样决定以后，我们就先到黄家庄拜见了黄氏长辈黄香亭。黄是地主，却很开明，在群众中颇有威望。我们把他请到区公所里，办了一点简单的酒菜，对他作了热情招

待，席间我提起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遭受敲诈勒索的事，他一听非常气愤，伤心。我接着说，如果当时我们有枪，把村里的青年武装起来，打击敌人，保卫自己，那么您老人家也不会受那窝囊气了。亡羊补牢，不为太晚，现在我们想同您老人家商量一下，弄钱买枪。他一听说弄钱买枪，便沉了一下，说：“现在老百姓都被鬼子汉奸闹得终日不得安生，年景又不好，上哪里弄钱！”我说：“为了抗日，应当物尽其用，黄家林里有那么多大树，卖一百棵，不就来了钱吗？”他一听我动议卖树，就直摇头说：“那是祖林，黄氏公产，动不得，动不得……不敢、不敢……”我说：“我们卖树，是为了打鬼子，使大家过上安稳日子，我想大家也不会说别的。如果您老人家还有什么顾虑，现在我开个条子给您，等抗战胜利了，有人向您要树，您就找我。”就这样，被我们三说两说，终于把他说通了。当天晚上就拿出一百多棵。同时，李家庄也在杨成忠同志的说服下杀了数十棵。这两个村的行动，影响了团坪峪，该村青年们听说黄家庄、李家庄杀树筹钱买枪，也一致要求村干这样办。但团坪峪当时是地主刘南宅的庄子，树木都是地主的，地主刘治芳不让杀。在当时的情况下，硬干是不行的，那样会影响统一战线。于是我与杨成忠同志想了个办法，派民政助理员刘德升到团坪峪及其邻村中峪、营盘、崮安等村发动群众积极分子到区里告状，说刘治芳的树遮着老百姓的地，不长庄稼，要他赔偿损失。群众告到区里以后，我又派了两个同志去调解，动员刘治芳干脆把树杀掉以息民怨。刘治芳见群众的要求不好遏止，政府的态度也很明朗，就到区里找我。他对我

说：“树木歇了人家的地也不好，杀就杀吧，我不要了。”我一看刘治芳态度很好，就当场表扬了他。我说：“群众原来有意见，您接受了，很好。又把树献上支持抗日，这更可嘉。我一定给您记下一功。”

通过上述工作，全区很快买了四百多支枪，各村都建立起一支比较有战斗力的民兵武装。有了武装，我们就有了反“资敌”斗争的本钱，不仅使地方上那些通敌、“资敌”的坏人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搜刮老百姓了，而且使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敢轻易到柴山一带抢掠，保护了群众的财产，特别是粮食。

一九四二年八月，鲁中部队发起反顽战役，司令员吴瑞林带领部队到达柴山一带。他交给我两个任务：一是组织当地群众帮助部队渡过沂河，二是准备八千斤大饼供给部队。当时正是雨季，沂河涨发，覆了两岸。我调集河边村庄会游水的青年民兵，特别是黄家庄的青年，叫他们用盆头绑上木杆当筏子，把部队渡到北岸，顺利地完成了第一项任务。在帮助部队渡河的同时，我布置周围村庄的干部组织群众烙饼，由于群众手中有粮，一下子烙了近万斤，超额完成了任务。吴司令很满意，当场表扬了柴山区人民的革命精神。部队渡过沂河以后，接着向北进攻，把国民党顽固派打得落花流水，收复了沂水二区、三区大块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春，柴山一带山区的群众生活困难，但诸坞，马荒一带平原地区粮食还不算紧张。而敌人每年也常常于春天缺粮之际到此抢粮。为了不使粮食落于敌手，我们即抢先组织一部分青年民兵，把诸坞、马荒一带村庄的公粮全

部抢运到根据地里，这样，一方面救济了断粮群众，另一方面为我军和地方干部备下了给养

我们也惩治过葛庄据点汉奸头目小田（田相德）。小田就是柴山区盆山村人，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汉奸。他霸占了附近村庄一个姓李的姑娘，这位姑娘是我们部队一个连长的未婚妻，是共产党贵。由于小田无恶不作，上级命令我们相机给以惩治。我们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通过他的老婆了解小田的行动情况。记得是在清明节之前，小田的老婆通过内线告知我们，小田要在清明节这天回家给他的父亲上坟，经过固安。我们接到这个情报后，上级就派便衣队长王守信带领几个便衣队员于清明节这天潜伏在固安，小田一到就被王守信抓住了。王守信外号“王老虎”，小田早已知道他的厉害，吓得直打战战，乞求留命。王守信当场将他教育了一番，指出他的罪恶已经难以饶恕，但还能将功赎罪，为自己留一条生路。小田当场表示悔悟，只要留他一命，他可以“为共军”效劳，王队长就把他放了。从此，小田再也不敢作恶了，并成了我们的敌伪关系，为我们提供情报。后来他们内部有人向红部告发他和张玉胜曾被我们俘虏过，红部对其产生了怀疑，要下他们的枪，在这种情况下，小田不能继续在葛庄据点待下去了，便带领他手下的伪军弃暗投明，起了义。

一九四四年九月，我军发起葛庄战斗，柴山区的民兵也参战了，配合主力部队包围无儿窑。无儿窑上的敌人被飞机接走以后，我们就撤了。葛庄战斗以后，我到沂北开会，因为柴山区民兵对敌斗争比较出色，得了一面流动红旗。记得

红旗是沂北工委书记武杰和行署主任余辉亲自发给我们的。其后上级调我到鲁中党校学习，临走时我到沂中县委去向书记王翰卿同志告别，这时柴山区又属沂中吧？记不准了。

（窦宪诺调查，张茂萱整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南墙峪反“扫荡”记实

郭维城。

一九四二年十月下旬，根据各方面情报，驻山东日军，以善于山地作战的三十二师团为主力，纠集津浦、胶济铁路沿线及台潍公路沿线的日伪军，准备大规模“扫荡”滨海、鲁中区根据地。山东军区命令新一一师代师长万毅、主任王维平率师的主力在滨海坚持，我（时任副师长）和参谋长于文清率师机关、干校由独立团四个连和警卫连掩护，到鲁中区活动。

二十五日我们进到沂水西南保安庄一带。鲁中军区机关由政委罗舜初率领，驻我们西北方向后峪子一带，我们立即架通了电话。根据各方面敌情分析：这次“扫荡”是由日军三十二师团长直接指挥。敌人的目标象是汶河中间地区。

敌人行进速度不快，大股不断地分成若干小股。我不断用电话和罗舜初同志联系，他一再告诉我，这次敌人集中重兵，行动诡密，要沉住气，找准空隙，跳到边缘。拂晓前，鲁中军区机关决定向西南方向芦山区跳，我们决定向东北方向南墙峪山区跳。

七点四十分，我们进到南墙峪山区中心地带，看到很多

•郭维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

附近各县、区的领导带着工作人员和大批成群结队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同时发现四周山上山下已布满敌人。我们判定，敌人是用拉网战术，企图消灭这个山区的我有生力量。

这时，鲁中二军分区后勤部政委张玉华带着机关人员和警卫排，山东军区抗大一分校副校长袁中贤带着上千队、鲁中军区青年营约百人，也都从东北方向攀登上来，同我们接上头。抗大上千队是由山东军区的团、营干部组成，青年营是招收的青年学生，他们被拉进网来，更加重了我们的责任。

我们决定抢占有利地形，白天死守，黑天突围。独立团四个连抢占了横在我们北面的这个山区的制高点旋窑顶，以两个连摆在顶部，阻击北面的敌人，以一个连摆在东南侧与干校协同阻击东南面的敌人，西北侧是个鞍部，有一条南北小路从那里通过，判断敌人以西北面为进攻的重点，把独立团最强的二连配上二军分区后勤部警卫排摆在那里。团长侯宜禄、主任秦霜负责在顶部指挥，副团长程书麟、宿殿魁分别掌握东、西两侧的连队。师机关和二军分区后勤部机关隐蔽在离鞍部不远的坡地上，警卫连一面警卫机关，一面担任阻击西南面的敌人。上千队和青年营在靠近机关西南部几个山包隐蔽。县、区的同志和群众都主动钻进利用梯田地堰子预先挖好的许多洞子里和一片一片的大石头砬子里。

八点刚过，敌人十几门山炮开始从四周山上向我们猛烈射击，炮火一停，敌人狂妄地从北面、东面打着太阳旗密集地向我阵地边呼喊边前进，用掷弹筒、步机枪盲目射击。很

快，敌人就进到我们有效射程内，我们猛烈地开了火，密集的手榴弹发挥很大的威力，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乱喊乱窜，一片一片地倒下，顾不得组织还击，即狼狈地跑下山去。过了一会，四周山上的山炮又向我们猛烈射击，同时阵地附近还出现了十几门迫击炮。炮火一停，敌步兵就发起冲锋，一个上午反复五次，战况异常激烈。敌人遭到大量杀伤，我们人员伤亡也不断增加，鞍部的二连和警卫排，减员过半。指导员井庆明负伤，连、排长都牺牲了。阵地上只剩副团长宿殿魁和一排副、战斗英雄杜玉怀指挥剩下的战士在战斗。十二点从沂水方向飞来七架双翼强击机，往返四次在我们头上盘旋投弹扫射。前沿的部队，一面组织对空射击，一面顽强地抗击正面不断进攻的敌人。

下午四时后，敌人加强了西、南面的进攻力量，敌人在我们机关对过的山上架设了三挺重机枪。我们的平射炮排换来一门“三七”平射炮，只剩三发炮弹。老排长“神炮张”用三发炮弹打哑了三个重机枪阵地后立即把炮拆毁了。

西、南面越来越吃紧，干校的子弹快打光了，纷纷用石头砸敌人。警卫连伤亡很大，连长谢朝龙牺牲了，由机关组成的预备队赶去增援。

黑天终于来临，各县、区人员和群众及抗大上干队、鲁中青年营、二军分区后勤部机关都先后突围。接着我们分三路突围。我带机关人员、宣传队、警卫连为一路，从西面突，干校、独立团一个连为一路从南面突，独立团三个连为一路从东面突。从各方面射来的闪光弹密集地喷向我们，四周山上点燃了很多火堆，敲铜锣、铜盆的声音也随着四起。

我们这一路从西面滑下山去，过了一道山沟，正要按原计划沿一条人行道从虎村顶方向再越过一座山突出去，从岔路旁边站出一位老乡，他是桃花峪村的民兵，刚刚送出一队突围的同志，他说虎村顶瞎黑的地方埋伏着鬼子，让我们从火堆旁面的毛道过去，那里只有几个伪军，光咋呼不动弹。他主动把我们平安的带过山去。后决定还要回去接送突围的同志，我用力地握着他的手说：“非常感谢你，民兵同志！”他笑了笑，挥手就走了。

独立团分成三路突出重围，团长侯宜禄在突围中牺牲了。

这次反“扫荡”战斗，我军共伤亡一百多人。敌人伤亡五百余，准备抢粮的汽车，敌人都用作运死尸伤员了。

这次反“扫荡”，我们坚守阵地，以少胜多，大量杀伤敌人，掩护大批干部、群众安全突围，受到山东军区通电嘉奖。

（原载一九八五年十月八日《人民政协报》第三版）

对崮顶血战纪实

黎玉 口述 靳星五整理

当时山东战局概况

一九四二年山东象全国一样，面临最困苦艰难的岁月。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跑上了峨嵋山，采取观战待降的反动政策；日寇为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诱降的毒计，要巩固已侵占的后方，也由于兵力所限，停止了对正面的战略进攻，腾出手来集中大量正规兵团、伪军和地方汉奸队，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反动武装，对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即解放区）猖狂进犯，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破坏摧残；更加旱涝失调、灾害频繁，影响工农业生产，人民和部队党政机关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当时党中央提出这样的口号：“咬紧牙关，渡过难关”。山东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对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华北八路军驻山东一一五师的英勇健儿、山东纵队和山东军区所属地方武装，顽强奋战，给敌人以重创。

敌人妄图扑灭我省领导机关

日寇在一九四一年冬，拼凑了五万多日伪军，对山东根据地——沂蒙山区——进行了所谓的“铁壁合围”的大“扫

荡”。虽然给我们造成严重破坏；但是，在我党领导下，党政军民一条心，对敌人英勇奋战，给以重大创伤，使他们的狂妄企图彻底破了产。可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一九四二年秋，又搞阴谋诡计，玩弄什么“拉网合围”，也叫做“梳篦战术”。顾名思义，就是妄想用较大的兵力，密密麻麻的阵势，四面八方地推进，象撒开网收起来，和梳篦梳头发似地严密合围，寻找我省的党政军民机关，如党中央山东分局（现山东省委前身）、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即现在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始前身）、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工、农、青、妇、文各界救国会等组织而扑灭之。敌人煞费苦心，想出了这些阴险毒辣的鬼点子。当时，山东分局等领导机关，正在滨海地区莒南地带，组织指挥甲子山战役，抗击国民党反动派五十七军缪澂流部分部队向我进犯的战斗。日寇故意放出空气，制造散布谣言，说大举“扫荡”滨海行政区（当时，山东解放区划分为鲁中、鲁南、渤海、胶东和滨海五个行政区）。这自然也是他们诱降国民党反动派一贯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一箭双雕，既替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解围，好配合他们向我们进攻，又打乱我们进行反击的军事行动。当时我领导机关研究分析各方面的情况，认为敌人组织冬季“扫荡”，是多年来的规律，要进行反扫荡，决定暂时分散以对付敌人。一一五师等主力部队和山东分局留在滨海区，观察敌情，准备迎击敌人的“扫荡”。省的行政领导机关和山东军区（山东纵队兼）北上，插到沂蒙山区，以应付形势的发展变化。这次和山东纵队一起行动的除省行政机关，纵队领导人黎玉同志外，还有王建安（山东

纵队副指挥，他指挥这次战役，包括对崮顶血战）、江华（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和战工会的李竹如（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战工会秘书长）、艾楚南（战工会财政处处长）等同志。此外，还有抗大一分校一部分、山东纵队青年团的一个营。

日寇军事部署和行动

日寇进行这次所谓“拉网合围”的军事冒险，是蓄谋已久的，是一九四一年“铁壁合围”的继续。敌人七拼八凑，罗掘了几万人的兵力，计有日寇正规兵团三十二师团、二十九师团、还有两个旅团，以及部分伪军和地方汉奸队等。这些兵力，在临沂、蒙阴、沂水、莒县等几个地方集中。一九四二年九月间，就揭开战斗序幕，敌人在小清河平原地带进行“扫荡”。十月在泰山山区“合围”，我汪洋同志牺牲（汪洋同志，当时是一军分区政委、一地委书记，率领军分区、地委和专署机关工作人员，只带一个连队和教导队，被多于若干倍的敌人围困在莱芜县城北的棘山上，他坚定地指挥部队反击，激战一昼夜，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机关工作人员安全转移。他受重伤逝世）。十月二十六日，敌人摆开了所谓“拉网合围”的架势，幻想扑灭我省领导机关的大战役正式开始。敌人在蒙阴、沂水等地纠集地方汉奸武装，设三、四个点来牵制我军。敌人主力先窜犯沂水县城西南五十华里的南墙峪一带，向我万毅、郭维城统率的百十一师，以及二军分区的部队进行拉网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晚上转移。这时，山东纵队一旅在蒙阴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战工会等省的领导机关，从滨海地区转移到沂水县境。先是在大诸葛（在沂水县

城西北六十华里，现为诸葛镇驻地）一带观察敌情。二军分区在东里店（现属沂源县，距沂水县城九十华里）一带监视蒙阴敌人动向。不过敌情很难意料，出出进进，疑阵重重。山东纵队和行政领导机关，本拟沿沂水县城到马站的公路两侧向北转移。当时马站（在沂水城北七十华里）以东由苏鲁战区于学忠部控制。沂水县境则在我们控制之下，群众基础条件好，地理形势对我们有利。但因沂水城之敌，又窜出城外，向北蠕动，故未及时转移。

对崮顶血战气壮山河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子夜，我们侦察到敌人靠东里店一带行动。山东纵队等领导机关，仅带特务团的一个特务营（三个连队，机关工作人员多于部队），由营长严雨霖同志带领，从马站以西向北转移，过了对崮峪村（在沂水县城西北约七十华里），拟向东北方向转移。据侦察人员报告，从北面窜来一股敌人，即从东北军五十一军防地向南窜来，向我山区进犯。我机关部队从东北折回，以急行军步伐，半小时内抢占对崮峪山头，又发现东南上有敌人。我们到对崮峪西北方向瞭望，也发现敌人。在对面有日寇正规兵、汉奸队还有沂水城的伪军，从北面沂山山区南下。于是我们决定就地坚持，选择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王建安同志命令严雨霖营长，带领特务营全体指战员，抢占对崮峪的对崮顶（机关工作人员也同时跟进）部署作战的队形，分配任务，构筑工事、居高临下，以打击敌人。对崮顶因有两个山崮（山头相对，所以村名对崮峪、山名对崮顶），我们所占的崮顶，周围陡峭，形势极为险要，群山环抱，宛如万马奔腾。崮顶约

东西一华里，南北半华里，呈椭圆形，总面积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崮顶上有残破围墙。我部队有两门小炮，几挺机枪。坚定地固守阵地，英勇顽强地抗击四面包围、十几倍于我们、武装到牙齿的八千多敌人。我们刚上山，东面敌人打来一发炮弹，没有击中我阵地。接着敌人大部队蠕蠕向上运动，向我山头阵地进犯。步枪乱放，机枪瞎扫，敌机两架，低空盘旋，轮番扔下许多炸弹，却始终没有一枚落在我们阵地上。因为山顶面积太小，敌机向我阵地俯冲投弹，没有一点准头，飞来飞去，弹如雨下，不是落在山头这边，就是落在山头那边，总是落不到我们山头阵地上，却都落到山沟四周敌人自己的阵地里，炸死炸伤许多敌人。敌机这个忙帮得真是好得很，好极了！

这时，北面的敌人盘踞了一个山头，东南靠马站方向的敌人也窜上了一个小山头。我沂水青年团部队、沂水县的区分队、还有抗大山东分校的一部分人员，也都赶到这里来，参加了对敌战斗（沂水县地方干部，地理形势熟悉，和敌人在庄稼地里“捉迷藏”，没有被拉进网内）。他们精神都挺旺盛，共同战斗，打击接近我们前沿阵地的敌人。

战斗持续到上午十一点钟左右，东北军五十一军的一个营（不满员），被敌人拉网赶到这里，要求上山。因为他们处在危急之中，我们决定让他们到崮顶上来。他们有机枪、有子弹，但是不敢打仗。我们派人帮助他们把守一角阵地，抵抗敌人的进攻，发挥了一定作用。当时，我们把这一行动，叫做“统一战线上火线”。

激烈战斗，打了一天。我们的阵地固若金汤，巍然屹立

在对崮顶的山头上，伤亡很少。对崮顶对面（西边崮山、平山），我们的部队也比较安全，而坚守阵地。敌机投弹不准，炮弹也打不中，机枪扫射，子弹被山头峭壁楞角一遮挡，打不到我们阵地上来，伤害不着我们的人。步枪射击发出的子弹，同样也是白费力气。当然，主要是由于我们英勇奋战，大量杀伤敌人，打得他们晕头转向，枪弹乱发，没有准头。这样一直坚持到黄昏，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决定傍晚转移。分成若干小组，转移方向分成若干处，以减小目标，便于行动。这时夕阳西下，彩云变幻，晚霞灿烂，弹光交错如穿梭，篝火通明似流星，景色富有威武雄壮的诗情画意。

黄昏以后，转移开始，分头顺斜坡走下。指定转移后的集结地点是东南方向埠前一带（在沂水县城西北五十华里，现已为跋山水库水域了），这里党的组织发展的早，群众基础很好（这时，笔者问道黎玉同志的右手受伤，是在这次战役的什么时候？他风趣地笑道：“就是在黄昏转移的时刻，敌人的一发子弹在我面前横飞，打伤了右手，敷了点自己带的云南白药，以后做了手术，也就好了，不过留个伤疤作纪念，如果直着对面打过来——打了个指着胸口的手势——那就完了。说着笑了一阵）。不幸的是在转移中，李竹如同志、青年团团长刘玉泉同志（山纵所属住沂水青年部队）、政委王瑞同志和韩玉川同志（省军区四科科长）等壮烈牺牲。现在想起来还是不胜悼念。连特务营指战员伤亡百余人。五十一军那个营也受到约一半的损失，因为守着山上的北大门阵地，突围时也从此出去，故伤亡大一些。我们根据

地也遭受一些破坏。而敌人在这次战役中，却伤亡六、七百人。日寇法西斯匪徒们，对自己的阴谋诡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总的说来，这次战役，是我们夺取了胜利，在我党领导下，广大战士干部和工作人员，战斗积极性很高，人民群众大力支援，英勇顽强奋战，打得机智勇敢。整个领导机关是安全的。粉碎了敌人的“拉网合围”，企图扑灭我省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阴谋诡计和狂妄迷梦，敌人的如意算盘，统统化成泡影。事后我们也作过战斗总结，我们的缺点和教训，最主要的是，对敌人战略侦察，战术侦察很差，又处在友军对面，不便侦察，消息隔绝。

整 理 后 记

一九八〇年四月，笔者赴京出席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会后，希望在京的许多老战友，发动撰写现代革命史料稿。晋谒黎玉同志（原山东分局委员，山东纵队政委，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后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时，要求他谈谈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对固顶战役始末，打算整理成史料稿。承蒙慨允，从而再现了对固顶血战的史实。谨志衷心地感谢！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笔者从北京回济南后，将此稿整理好，寄谒黎玉同志审阅，接八月六日复信说：“对固峪血战纪实一文，我只稍加一、二。本拟送王建安同志过目，不料因急性心脏病而亡，呜呼哀哉！这篇文章也可说纪念他而作了。因为他是当时对

崮顶战役的直接指挥者。”特附志于此，用表悼念！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日

对崮顶血战，是抗日战争史上，在沂水县境内，创造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以劣制优奇迹的突出战例。沂水县委党史办公室、县政协征集战时史料，《沂水县志》正在编写，都需要这类资料，谨复写分奉。其他同志，也有记述该战役各个侧面的文章。此件仅供参考和印证。

笔者又志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七日

（选自沂水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二辑）

一九四二年冬反“扫荡”情况片断回忆

杨 兴

敌人这次“扫荡”，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扫荡”开始前，我们根据一九四一年冬季反“扫荡”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准备，部队和地方干部都作了部署，并提前发了棉衣，但未料到敌人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

回师沂蒙山 首战南墙峪

敌人“扫荡”开始前，我正在驻滨海区的毛泽东青年干校学习。记得是十月底的一天，临沂、郯城等处据点的敌人倾巢而出，坦克、骑兵、步兵向东出动，直奔滨海区。这时山东省党政军机关、一一五师和抗大都在滨海区。滨海区是一片平原地带，当时青纱帐已倒，视野开阔，不宜开展游击；再加该区南有陇海路，东临大海，北有莒县城敌伪据点，西有敌人盘踞的临沂城，这种形势对我开展反“扫荡”斗争是不利的，于是我指挥机关决定连夜向沂蒙山区转移，摔掉敌人。这时我们青年干校鲁中工作团在陈先同志的带领下，随着山东党政军机关，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沂蒙山区进发。我们是从莒南县松盘村出发的。到了沂水西南山区，我们干校工作团就离开省机关去找鲁中区党委。这时我们都为

把敌人摔掉在滨海区而庆幸。不料天刚亮四面响起了敌人的枪声，我省级机关一部和国民党五十七军起义部队百十一师在南墙峪被敌人合围。我部立即抢先占领南墙峪附近的高山旋崮顶，抗击敌人。敌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旋崮顶发起攻击，被我部猛烈的火力压了下去，敌人伤亡惨重。战至黄昏，我部乘夜胜利突围。

我们干校工作团离开省机关以后，一直向西北方向插去，当夜天亮前到达蒙阴县坦埠镇东南角的一个山村，找到鲁中区党委。在此，干校工作团决定疏散，陈先同志要我和曹子觉同志带领一个组，曹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到沂北坚持反“扫荡”斗争。沂北是我的家乡，我熟悉那里的情况，便于开展游击活动。正是出于这个考虑，陈先同志才派我去的。

沂北失而复得 工作组突出重围

沂北这块小根据地，是在一九四一年冬被国民党五十一军顽固派趁着敌人“扫荡”之机抢占去的，这时刚被我们夺回不久，并建立了沂北工委和沂北行署，原沂水县委组织部长武杰同志派去任工委书记，崔杰千任行署主任，原沂水二区区委书记李德民同志任组织部长。原沂水二区的四个乡划为四个区，其中诸葛乡改为诸葛区，是沂北根据地的中心，沂北工委和行署机关常驻这里。

我们一行连夜跋涉，天亮前到达沂北诸葛区刘家河北村，正巧遇到李德民同志，我把介绍信交给他，并说明来意是到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的。李德民同志说，现在情况

十分紧急，敌人“扫荡”已经开始，你和老曹同志带着工作组到你的家乡柴山区去吧，你对那里各方面的情况都很熟悉，你哥哥杨成忠在那里任区委书记，你们去找他，由他安排，并负责你们的安全。

第二天拂晓，我们刚刚准备出发，忽然听到街上有人喊：“鬼子来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已经不容我们对敌情进行分析，我和老曹立即带领工作组向着大诸葛村西山冲去。冲上山顶，看到敌人分成数股，形成拉网式，漫山遍野向北运动。这时我们全组九个同志迅速隐蔽在一条山沟里，准备好了手榴弹，一旦敌人接近我们，就炸它个血肉横飞。一队敌人从离我们三、四十米处的一条山梁上向北走去，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也没惊动。敌人向北去了。看来我们是处在合围圈以外。

我们在山顶上，望着向北出动的敌人，不久从北面传来异常激烈的枪炮声。

同舟共济 血战对崮山

敌人向北拉网，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黎玉等同志，以及山东军区警卫团，还有国民党五十一军一部，被敌人拉进网里了。我部和国民党五十一军一部立即抢先占领对崮山制高点，准备凭险抗击敌人。敌人集中了约一个师团的兵力，向对崮山发起猛烈冲锋。我部立即应战，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我部胜利突围。在突围的时候，黎玉同志手部受伤，是警卫团排长杨琳同志和几个警卫员将他从山上架下来的。杨琳同志到警卫团之前，是

诸葛区的区中队长，我们早就认识。警卫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吴林同志在突围中被俘，敌人把他带到韩旺，押在一家老百姓的房子里，这房墙是碎石头垒的，正巧屋里有一只铁勺子把，他捡起来把墙挖开一个窟窿，逃了出来。

武云生跳崖 与敌同归于尽

武云生又名武善同，家住卞山西山腰的红石崖村。一九四〇年春二区区委公所驻在西卞山村，我任二区区委宣传干事，经常到红石崖给党员上党课，这时武善同是村支部组织委员，去时我就住在他的家里。后来脱产，他担任诸葛乡支部书记。沂北工委和行署建立后，他又任诸葛区委组织委员。

就在我们工作组住在刘家河北的那天晚上，他回到红石崖村睡在地窖里。天亮时敌人从南边到达卞山，区工会干部惠清举是西卞山村人，正在家里，闻听敌人来了，想逃下山去，不料被敌人捉住。惠清举是一身庄家汉打扮，敌人对他没有发生怀疑。但是四个日兵却把他抬着扔下山去，到快要落地的时候，他突然翻了一个筋斗，竟然站在地上，立即跑掉。后来同志们都说老惠武艺高强，传为佳话，其实老惠从来没有学过武术。

敌人把惠清举扔下山去以后，没有管他死活，继续进行搜索，搜到红石崖村，就发生了武善同同志壮烈牺牲一事。他的牺牲经过，是安家圈李长维告诉我的。当时李长维还是一个农村青年，这次“扫荡”中他被敌人抓去背被包，敌人带着他到红石崖清剿，因此他亲自看到了武善同牺牲的情

况。后来李长维在我拉的青年基干队里当战士，他把武的牺牲过程对我说过。李长维说，那天早晨日寇带着他到了红石崖，敌人到处搜索，发现村前一块地面和地边的石埂上有一段霜比其地方的化得早，引起敌人怀疑，敌人就用刺刀掘地面，并拨动那段地埂上的石头，发现是地窖和地洞，里边藏着许多人，武善同正藏在这个地洞内，敌人立即逼着藏在里边的人统统出来，又进去搜索，搜到一支打猎的土枪，枪里已经装上了灰药和铁沙子，引火咀上也已安上“炮子”，敌人不知是什么武器，结果弄响了，打中一个日兵的胸膛，当场死亡。这时敌人发怒了，用枪逼着群众交出八路，交出枪，群众都不答腔。敌人更发怒了，就从人群里抓出一老头要杀，这时武善同站了出来，说他知道有枪，并指了指下山西南面的一个山崮，说枪藏在那里。敌人就把武善同绑了起来，由一士兵牵着，一个士兵押着，那士兵恐怕武善同跑掉，就把绳子拴在自己的手脖上，这样押着武善同向山顶走去。当走到一个悬崖边的时候，武善同猛地将一敌兵抗下悬崖，又猛地一跳，把牵着他的敌兵带下悬崖，两个敌兵当场摔死，武善同受了重伤，敌人上去将他刺死。武善同就是这样壮烈牺牲的。这就是李长维同志亲自告诉我的。李长维现在在上海杨浦区土产公司任经理。

在柴山区游击 打击敌人

我们在大诸葛西山待了一天，到黄昏，过了沂河，到了柴山区，找到区委书记杨成忠，杨成忠要我们和民兵一起活动。有一天晚上，我们住在黄家庄，拂晓前，一个放哨的民

兵来报告，敌人来了，正在过沂河。我立即带着工作组和民兵爬上该村南面的高山鹰嘴崮（又称柴胡山），观察敌人动向。直到天亮，才发现敌人从黄家庄出来渡河东去。我立即命令民兵向敌人开枪，敌人一枪未还，拼命渡河向东逃窜。我判断这是葛庄据点的伪军，于是带领民兵冲下山去，直奔河岸。这时黄家庄的村长跑过来了，他的手臂还被绑着，我连忙给他解开，他对我说，伪军抢的牛、驴和其它东西都扔下了，快派民兵弄回来，这是葛庄据点伪军头目小田干的。

我们在黄家庄已经暴露了目标，就转移到柴山南部活动。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黄老鼠沟宿营，天亮时发现一队日军从柴山一带向南运动。我到沟的南边观察了一下，发现有一股向北行进，并向我们所在的山靠拢。这时我想，敌人为什么合围这座山呢？目的何在？但当时有一条我可以断定，它们不会为我们几个人来的。根据我的判断，我和曹子觉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隐蔽在乱石中，如果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不动，如果敌人真地朝我们袭来，我们就打出一排手榴弹，利用烟尘的掩护，以最快的速度，顺沟向下突围。于是我们都卧在乱石丛中，每人打开手榴弹保险盖，静静地等着。

这时敌人继续向山顶固拢。我们伏在乱石之间一动不动，但心里却很紧张。不一会，有一敌寇牵着一匹黄色大马首先登上山顶，随后上来几个步兵，他们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了一阵，摆动了几下太阳旗，叫了几声，就收兵下山去了。大概是他们看到山上什么也没有，才收兵的吧。

这次“扫荡”经过十多天就结束了。

化悲痛为力量 我重返沂北

反“扫荡”结束以后，我们青年干校工作团在沂北罗圈崖村集中起来，我见青年干校副校长钟孝培的爱人孙淑清同志面带泪痕，陈先同志绷着脸，很严肃。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午饭前，工作团的同志都到齐了，陈先同志对大家说：“这次反‘扫荡’斗争取得很大胜利，但有一不幸的消息告诉大家，钟孝培和赵峙余两同志牺牲了。大家听了，一定万分悲痛，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争取全民族的解放而努力战斗，用胜利来悼念死者！”听到这个宣布以后，孙淑清同志哭了，同志们都脱了帽，低下头，流着泪，默哀。

午饭后，各工作组分别开会，总结这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大家一方面谈论在这次反“扫荡”中的体会，一方面怀着沉重的心情追念钟孝培和赵峙余两同志生前的革命事迹。钟孝培同志是江西人，个子不高，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牺牲时才三十多岁。赵峙余同志曾在山东湖西地区任营长，后调毛泽东青年干校任军事科长兼学员一队队长，当时我就在第一队，同他接触较多。他平易近人，我们都很尊敬他。我们结业后，组织上分配他回湖西地区任团政委，上任之前，上级又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让他带领一个警卫排护送一批去湖西地区工作的地方干部。他们出发后，经过鲁南快到津浦路的时候，与敌人巡逻队遭遇，为了掩护地方干部，他带领警卫排英勇战斗，不幸牺牲。

反“扫荡”斗争总结完毕，我们就在罗圈崖周围村庄开

展群众工作，整顿农救会，组织青抗先，训练民兵。在这里工作了半个多月，接到上级通知，分配我到沂北工委任青联副主任、青抗先大队长，重返沂北根据地工作。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六日于上海

忆歪头崮战斗

吕敬之* 亓魁洲

一九四三年二月间，我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旅二团一营二连，在该团一营营长王子固、副营长徐福和连长亓克顺等同志率领下，于沂中县郭庄区境内高山歪头崮（现属沂水县泉庄乡），同日军激战一天，打退敌人的数次进攻，打死打伤许多敌人，最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王子固、徐福、亓克顺并全连战士英勇牺牲。我们二人亲自目睹过这次战斗的激烈情况，并非常怀念那些壮烈殉国的同志们，特将此次战斗的经过略记如下，以慰我们的怀念之情。

当时，我们二位都在山纵一旅二团团部工作，吕敬之在政治处，亓魁洲在供给处。歪头崮战斗发生前，吕敬之被临时派往沂北大队去扩军，亓魁洲也一同去沂北通过沂北大队的关系，向国民党五十一军和伪军购买步枪子弹。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即于二月二十五日回团部汇报工作情况。当天下午，路经我团一营营部和二、三连驻地。驻村村名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它座落在歪头崮西边约四、五华里处的一个山后坡，或许是张坊、或许是李家官庄、或许是尹家峪。我们到此驻地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钟左右，这时连、排干部战士

*吕敬之，山东省莱芜市圣井乡吕家楼庄人，云南省昆明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现已离休。

正在村下一个打谷场里打棒球，打得热火朝天，都出了一头汗。我们二位就在该营营部住下了。

次日，即二月二十六日拂晓，忽然从歪头崮东面来了敌人，王子固立即下令紧急集合，迅速带领全体干部战士爬上驻村南山。到达一个山口时，两架敌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侦察，敌机飞得很低，连螺旋桨的转动都看得很清。由于我们当时还缺乏集中步枪、机枪打飞机的经验，全体干部战士只好把枪压在身子底下，卧在野草棵里。敌机飞走以后，王子固率领二连顺着山岭向东直奔歪头崮迎击敌人，叫我们二位随三连下山向南边的大山突围。到了南大山后坡，三连也向东插去，迎击敌人。我们二位因无战斗任务，就留在原地待了一天，中午饭是向住在山腰的一家老百姓要了几个地瓜吃的。此地离歪头崮只有四华里左右，我们对那激烈的战况看得十分清楚，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看到，两架敌机在歪头崮顶上低空飞行侦察。王子固率领二连顺着山岭急速向东行进，抢先占领了歪头崮制高点。敌人在飞机的配合下从歪头崮东面和南面向崮顶进攻。二连立即展开火力，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打退了敌人的数十次进攻。在敌我展开激烈交火的同时，敌机从东南方向飞到歪头崮顶盘旋往返五次，对我阵地进行猛烈扫射，投下许多燃烧弹，浓烟滚滚，笼罩整个山头。战至下午五点左右，敌机飞走，枪声停止，战斗结束了。到天黑时，我们二位人又回到一营营部原来驻的那个村庄，在村东头遇到二连的两名炊事员，挑着花生油桶和炊具从歪头崮上走来，他们说，他二人是隐蔽在歪头崮山后坡的

草丛里幸存下来的，王子固和其它同志全部牺牲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二人一起到歪头崮顶察看战场，一看，我俩悲愤极了，禁不住泪流满面。有的烈士倒在地上，还作出向敌投掷手榴弹的架势；有的紧咬牙关，面朝东南，两眼怒睁，手里攥着一块大石头，躺在血泊之中；两挺机枪和许多步枪都摔碎了，丢在崮顶和后坡上。营长王子固牺牲在歪头崮北面的山脚下。据说二连战斗到下午五点钟左右，只剩十余人了，王子固带领他们从歪头崮北坡突围，刚刚到了山下，不料又被埋伏在张耿村的敌人包围了，王子固带领这十余勇士，又同敌人展开了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在此全部壮烈牺牲。该连除有几名干部战士到当时团部驻地沂南县田家北村参加党代会而得以幸免外，其他八十一名干部战士无一幸存。敌人方面，被我打死打伤很多，它们用好几辆汽车将尸体运回沂水城。

王子固同志原在山纵一旅旅部任侦察参谋。调我团一营后，先后任副营长、营长。他是细高个，白长脸，左眼皮有点下垂，平时看上去好象只有一只眼睛，但一打起仗来，两眼大睁，神采奕奕，非常勇猛。

这次战斗结束后，记得有当地一位姓李的村长和地方政府干部带领部分群众，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埋葬了烈士的遗体。

最后，我们再交代几句话：歪头崮战斗不是在敌人“扫荡”时发生的，也不是我们在行军中同敌人遭遇，而是为了支持地方政权，巩固从敌伪顽手中夺回的失地，开展减租减息，上级才命令我团派一营的两个连，驻守沂北大、小诸

葛、卞山、张耿、韩旺，和沂中县的东里店、崔家峪一带。这次战斗的发生，是由于我们暴露了目标，被敌人的密探侦知，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八日

我对拔除北松峰伪军据点的回忆

官家和*

沂北县北松峰村，位于沂水城北三十华里，抗战初期是西北乡的一个中等集镇。该村虽然仅有二百多户人家，但很出名，有三座酒厂和油坊，特别是武家洼大地主在这里开设的“福昌和”酒厂、油坊和“德泰”酒厂，规模很大，扬名全县。还有杂货店、中药铺、山货店和客店数十家，每逢五排十，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赶集，可谓热闹非凡。一九四二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伪军侵占北松峰一带，并在北松峰村“德泰”酒厂大院设了据点。

“德泰”酒厂本是一座深宅大院，伪军到此后，加筑了碉堡和围墙，并在围墙周围挖了三四米深、三四米宽的壕沟。里边又修了两座围子，一座是伪乡长胡保文的乡公所；另一座是伪县大队长牛先元的一个中队，计一百余人，张文富任队长。

胡保文是牛先元的心腹。他当上伪乡长后，便同张文富一起做了许多坏事。他们把北松峰村的抗敌协会负责人杨延桂和八路军一病员潘××(名字失记)抓去枪杀了，又把北松峰一带的村干部和无辜的群众抓去几十名严刑拷打，进行人身

* 官家和，沂水北松峰村人，现在四川省涪陵地委工作。

摧残。他们还勾结国民党五十一军顽固派到古村、常庄、江家官庄等村骚扰抢掠，无恶不作，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群众恨之入骨。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沂北工委决定，组织武装力量，拔除这个据点。

为了拔掉这个据点，工委书记武杰和敌工部长朱伯章等同志曾多次分析研究，商讨办法。认为鉴于当时的环境，不可能一下子将其拔掉。于是决定先派党员打进去，对伪军进行教育瓦解工作。这样决定以后，工委便找到我村党员李兴奎（公开身份是伪保长）、李兴于和我，要我们打进去做争取工作。当时，伪乡公所的职员张凌云系太平官庄人，朱宝龙早年与我党有联系，我们首先争取了他俩。他俩又在里边活动，做伪乡分队长孙显平的工作。孙是凤凰官庄人，家里很穷。张凌云和朱宝龙首先找到孙的老婆，让她做孙的工作。同时，李兴奎、朱伯章也多次同孙谈话，给他指明出路，只要改邪归正，好好为我政府工作，人民是不会另眼看待的，不然就连你的家庭也不会宽恕。经过教育，他决心痛改前非。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在伪军中争取了孔伯纯兄弟俩和一个姓高的，为我们送情报，买枪枝弹药。上述工作，对拔除据点创造了条件。

一九四三年夏，国民党五十一军撤离沂北后，北松峰据点的伪军，不断遭我县、区武装和游击分队打击，使得他们丧魂落魄，不敢轻易出来胡作非为。但是，死心塌地的胡保文却没有改变他的狰狞面目。工委分析，要拔除据点，必须先干掉胡保文，于是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游击队长王守信同志。王守信接受任务后，就交代孙显平和张凌云密切注视

胡的行动。不久，胡保文接伪县政府通知，要他同张文富到城里开会，正巧张文富到城里办事未归，胡单身去城里，这家伙诡计多端，平时出来都是带上两个护兵，这次去城里，要走三十华里，他更是胆寒，除带上两个护兵外，还抽调伪乡分队的的一个班护送。他本来计划走东路，经韩家曲伪军据点，伙同伪乡长祝洪元一起进城。我们在上、下良峪之间设下埋伏。但是，他突然改变了计划，要走南路，经孔家庄、顾家崖一线去城里，这样，使我们设下的埋伏落了空。幸有顾家崖的一个游击小组在当地活动，待胡保文一伙踏上顾家崖南苇地时，即遭到游击小组的打击，胡保文的脸上扫了一枪。但是由于我方人员少，武器差，没有将其全歼。胡保文知道我们是不会饶他的，于是在城里借口受伤住了院，任凭牛先元怎样催促让他回据点，他执意不从，借口头痛不归。这时伪乡公所的大权由孙显平操纵。

胡保文被伏击的消息传到北松峰一带，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都说这个狗汉奸跑了今天，跑不了明天，总有一天要吃八路军的“黑枣”。这时我们也趁此给据点的伪军写警告信，讲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并在大街上贴标语，撒传单，宣传伪军弃暗投明，我们如何欢迎，等等。伪乡公所的大权由孙显平代理后，其乡分队暗地已投靠了我们。最后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张文富这个中队。我们分析，该中队虽有孔伯纯等几个人，但他们终究是士兵，起不了决定作用，要想里应外合拿下据点，非在中队内争取几个有点权势的人不可。为此，我们对该中队的大小头目作了排队，认为中队长张文富同胡保文是牛先元的忠实走狗，司务长潘守信也很反动，最后选

定了中队副高××（名字失记）。高是外县人，当时三十多岁，还是单身一人。据孔伯纯透露，此人不象张文富那样穷凶极恶，性情比较温和，于是我们确定以给他找老婆为名争取他。但是哪家姑娘愿嫁给他？排来排去找到一个武老太太。她有一个外甥女名武健，从小无娘，年已十八岁了，到了该找婆家的时候，工委就派我和李兴奎出面当“红娘”，做她娘俩的工作，开始她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我们讲了一些利害关系，最后，使他明白了这是革命的需要，就同意了。事成后，我们通知了高××，高当然求之不得，我们就帮他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武健同志根据工委的指意开始做高的工作，劝他弃暗投明，终于使高有了回转之意。趁此，工委指示李兴奎、李兴于去做高的工作，讲我党政策，高开始有些犹豫，怕投诚了，老婆不跟了，我们又叫武向他表明态度，使他消除了顾虑。

一九四三年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即张文富离开据点至沂城的第二天，工委书记武杰下了拔除据点的命令，调集县大队、区中队，又请来鲁中军区十二团的部分人，包围了北松峰据点。包围后，我们派李兴奎、王守信和敌工部的同志向高××、孙显平报了信，高、孙当即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命令其各分队大小头目开会，号召所有人员投诚。这时一部分人员已投靠了我们，可是司务长潘守信还很顽固，他托辞回去商量，我们为防他用电话报告沂水城、韩家曲等据点伪军打援，就切断了他们的电话线。深夜十二点，我们冲进去，伪军只好老老实实缴了械。就这样，我们一枪未放，就拔除了敌人苦心经营一年零十二天的据点。当晚我们就组织群众

拆除了围墙和碉堡，把全部投诚人员带走，高某某夫妻俩也由我们转移到安全地带。第二天胡保文和张文富带领三百多人气势汹汹地赶来一看，碉堡、围墙等工事全部拆除，又听说我军还要惩治他们，吓得狼狈逃窜。从此，北松峰一带获得解放。

一九八六年八月

抗战时期的桃花坪

董廷会、林茂瑞*

我们桃花坪村，抗战开始时还是个不为人知的、偏僻的穷山村，抗战前属沂水县四区夏蔚乡，抗战期间改属夏蔚区下里庄乡。当时全村七十户人家，三百来口人。村子的四面都是山，在旧社会是一个极偏僻的穷山沟。村前沟南崖和现在的沂南县岸堤公社接壤，地处南北沂蒙交界处。群众都是纯洁的穷苦人，庄情比较好，没有反动道会门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因此抗战时期往来南北沂蒙的我党政军负责同志大都在我村落脚。山东分局、沂水县委、区委都把我村看成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中心点，非常关心我村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发展生产等各项工作。

(一)

我村建党工作是从一九四〇年初开始的。当时下里庄张之伦(又名张绪九)在我村教学，他于抗战开始后在本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来我村教书，先发展了王德全，又发展了公方成、张道兴入党。接着建立了支部，张之伦任书记。一九三九年七月，董廷会到沂水县委举办的农会训练班受训，八

*董廷会，沂水夏蔚镇桃花坪村人，曾任沂水东岭果园场长，离休，已病故。

*林茂瑞，沂水夏蔚镇桃花坪村人，曾任平邑县检察院检察长，现已离休。

月中旬结束回村后，训练班负责人黄日城就把董廷会的情况介绍给张之伦，到一九四〇年三月，经张介绍入党。以后组织逐步扩大，到抗战末期就有党员三十多名了。

为了加强我村党的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一九四二年秋，山东分局派工作组到了我村，成员是安鼎明、刘曼思（据说是大学生）和《大众日报》记者于冠西。这三个同志到我村后，也象延安整风那样在我村党内开展整风学习。我们先学习了二十二个文件，每天晚上由刘曼思给我们讲课，然后进行座谈讨论，提高认识。这样学习了一段，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进行了组织整顿，选董廷会当了支部书记。

山东分局工作组在我村待到一九四三年春，就撤走了。接着，鲁中区党委又派刘树相同志来到我村。刘到我村后，就和夏蔚区区长戚庸吾一起在我村搞民主改革，对群众进行民主教育，建立民主村政。戚对群众讲：共产党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民主政治就是使广大群众对抗日工作都有参加意见的权利。他还讲了民主集中制和实行民主制的意义。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召开了村民大会投票选举董廷会当了庄长，林茂公当副庄长；还选了公安、财粮、武装等各部门负责人，这些人都是村政委员。民主村政建立后，又选举了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刘树相同志在我村住了一年多，对我们帮助很大。

（二）

前边说过，在旧社会我村本是一个偏僻的穷山沟。全村六百零二亩地，就被本村和外村地主、富农占去四百二十亩，而且都是好地；剩下的一百八十来亩山沟薄岭，才是穷

苦群众的。每人平均六分多地，怎么能糊口，很多人只得给地主种地，逃荒要饭。一九四一年，我村开始叫地主给雇工增加工资。地主对抗，把雇工变为佃户。一九四二年秋，山东分局工作组到我村以后，看到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就为我们打谱，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们讲：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就得搞好生产，多打粮食。并号召大家劳动发家，生产致富。在工作组的帮助下，全村掀起一个以开荒为主的大生产运动。支部书记董廷会带头，男女老少齐出动，干了一冬，一片片荒山变成粮田。董廷会、公方英、林清发、耿兆全成了全村公认的劳动模范。这年冬，区里召开劳模会，叫我村选个模范，大家就选了董廷会。在区劳模会上，董廷会又被选为出席县劳模会的代表。记得县劳模会是在院东头一带的田家峪开的，到会代表一百五六十人。会上奖励了董廷会一张犁、一把耢头、一张锄和一只四十多斤的小猪。散会的时候，县长李贯一亲自把董廷会送到村东头，说了很多鼓励的话。

我们刚刚做出这一点成绩，就受到上级的表扬，全村群众都很高兴，生产劲头就更大了。到一九四三年民主村政建立以后，我村就开始了减租减息和找工算账运动。鲁中区党委派来的刘树相同志具体帮助党支部学习了“双减”的政策和做法。召开了好几次会议，作了动员。还召集地主富农开会，向他们讲明减租减息和找工算账的道理，教育他们从调动广大群众抗日积极性的大局出发，自觉接受我党减租减息和找工算账的政策。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全村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党员林茂公是富农，他首先带头减了租，算了

账，并按照政策拿出了一部分土地。而另一户富农却很顽固，我们就发动群众同他进行了说理斗争，他看抗不过去，就老老实实地服从了。放债原来都是五分利，通过减息，连本都作废了。贫苦群众典给地主的地，不再付钱，废除典契，地还原主。这样从地主富民手里一共算出三百多亩好地，全部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群众，大家真是高兴极了。

这时，我们又在刘树相同志的指导下，由董廷会带头组织起变工组，全村绝大多数群众都参加了。还集股办了纺织合作社，纺线织布供给部队，所得报酬，一部分扩大再生产，一部分按股分了“红”。群众有了地，有了钱，日子逐步好起来了，抗日的积极性更大了，生产劲头更足了。这一年全村种了很多地瓜、棉花，获得从来没有过的好收成。当时，耿兆全的棉花、林清法的地瓜、女党员公方英的生产干劲，在全村叫了响。因此，董廷会和公方英又一次出席了鲁中区党委在刘家店子召开的劳模大会。大会奖给董廷会一头驴，一把镢，一张锨；奖给公方英一把镢，一张锨和二十四元钱。

董廷会和公方英受到上级的奖励，这是全村的光荣。加上日子越过越好，所以大家的干劲越来越高，办法也越来越多了。到了第二年，董廷会和林茂瑞商量，要把变工组升级，建立高级互助组，土地入股，集体劳动，按股分红。他俩又找王兴合、林茂修等同志商量，大家都很赞成，说不妨试试，于是高级互助组就成立了。这个组，由王兴合、林茂瑞、林茂修、王文贤、林茂青、林茂生、董廷会等七户组成，入股土地共三十六亩，林茂瑞当组长。为了解决肥料问

题，互助组还凑了八十六只羊攒粪。到了秋天，高粱亩产达到六百斤，全组共收棉花将近两千斤。这年冬天，我们又组织了二十把车子，去界湖运豆饼到坦埠集去卖，一趟就赚一头大黄牛。那时，鲁中贸易局长李星五常来我村，贸易局的公款就藏在我们村。为了支持我们发展生产，贸易局就批准借给我们一千八百元做本金开油坊。当年结算，一下子赚了四千八百多元，除还上借款，还余三千多元。由于我村各方面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领导上给我们的荣誉也就越多了。这年冬，鲁中区党委在新泰张窑村召开国是座谈会，特别邀请董廷会去参加，开了十八天。结束后鲁中区党委又召开劳模大会，董廷会和公方英再次出席了会议，奖了一头大黄牛。沂水县参加这次劳模会的一共五名代表，是秦海村同志带的队。

生产搞好了，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支援抗日也有了本钱。那时每年我们都要发动群众自觉捐献，一年搞三四次。记得一九四三年秋季，《大众日报》社的于冠西同志又来了。他对董廷会说：“廷会，咱们的部队穿衣有困难，怎么办？”董廷会说：“好办，我今年收了一百二十多斤棉花，先献上十斤。”董廷会一带头，全村就很快献了一百一十五斤。此事，还影响到邻村，黄连官庄也献了七十斤。于冠西同志马上写了一篇稿子登在报上：“劳动模范董廷会，白花花的棉花献了十斤”。

(三)

上面已经说到，我村座落在深山里，被好几座山包围着，

很偏僻，这样的自然环境对于备战是非常有利的。因此那时我们的后方医院和一些领导同志常常住在这里。一九四一年秋，日寇“扫荡”前，我们的后方医院三所驻到我村。所长李贵东叫我们发动群众用一个晚上挖四十个山洞，掩护伤病员，每挖一个洞子给二百斤高粱作报酬。于是全村男女老少一齐行动起来，有的妇女一个晚上就能挖一个，四十个洞子按时完成了。不久，敌人“扫荡”开始，二十多名伤员来到我村隐蔽，伤员藏在谁家挖的洞子里，就由谁家送饭送水，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二地委和行署的负责人王涛、牟宜之、江海涛等同志也转移到我村，江海涛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天。在这次“扫荡”最紧急的时候，我们安排了几个人在东山头上瞭望，发现敌情就通知全村群众立即转移。这次敌人“扫荡”时间很长，到了年三十还有一批鬼子到我村踢蹬了一通。但那二十多个伤员一个也没有受到损失。还有，辛梅安同志，他原是部队干部，一九四〇年春孙祖战斗后，得了肺结核，转到沂水县当经建科长，一九四三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我村疗养，他在董廷会家住了一年，又在林茂春家住了一年半。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消息刚刚在报上登出来，他非常高兴，谁料就在这个喜庆胜利的时刻，他突然大吐血，不久病故了。

在我村住的时间最长的是山东有名的抗战老人、省参议长范铭枢。范老是一九四二年秋日寇“扫荡”前来到我村的。在他来之前，地委指示我们，要是有人来见范议长，事先没有地委的通知，谁也不要说他在哪里，并要求全村男女老少绝对保密。为了范老的安全并使他有个安静的环境，我

们在村北树木葱密的盘龙崗山腰上建了两间草屋，让范老住在这里。他是和他四儿媳妇一起来的，范老住了一间，他儿媳妇住了一间。以后他的一个孙子媳妇也来了。对于范老的生活，除了有他儿媳妇照顾外，我村又找了一个可靠的青年王兴如专门给他买东西和做些杂活。范老来了不久，敌人大大“扫荡”就开始了。为了范老的安全，我们又在他住处下边一道石堑上挖了一个洞子，叫他藏在里边，再把洞口垒起来。因为每天给他送茶送饭，在洞口前踏出一条路来，这样很不保险，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在洞子前边垒上一个羊圈，洞口就在羊圈里面。范老一看这个办法，非常赞赏，他对董廷会说：“廷会，你真挺会想办法，晚上还有和我做伴的哩（指羊）。”范老在这个洞里藏了十八天，他从洞里出来，对我们很有风趣地说：“我下了蛰，又出蛰了！”

范老刚来我村时是七十六岁，身体很胖，看上去很壮实。我们经常上山去看望他，他就对我们说，别看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很猖狂，但它狂不了多时。只要我们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一致抗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范老共四个儿子八个孙子，那时仅存孙子范行一人，其他都在抗日前线牺牲了。记得他的三儿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以后，忘记是谁给范老来了一封信，他的四儿媳妇恐怕惹得范老悲伤，不让他看，王兴如说不叫他看不行，后来就叫他看了。范老看过信以后，说：“革命就是这样，只有牺牲流血，才能换来胜利！他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国家。这是党对他培养的结果。”他还劝别人不要悲伤，要把仇恨倾注到国

民党顽固派身上。

范老在我村期间，党每年都要给他庆寿。每逢庆寿，从省到县的很多负责同志都来祝贺，有不少人称呼他老师。一九四三年春，山东抗协负责人梁竹航来探望过范老；冯玉祥也曾给他转来一块有三斤重的镀铜牌子，上边铸着中国地图和“冯玉祥”三个字。据说冯玉祥住在泰山时，请范老给他讲解《左传》。一九四六年春，是范老的八十大寿，上级事先派人来作了筹备，要我村准备一处能够拴八百匹马子和放礼炮的地场。不久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形势变化了，前来庆寿的人比原计划少了，但还是比较隆重。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到四七年春，范老才从我村转移到黄河北。这年农历八月十三日，范老在乐陵县病故，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村群众无不落泪。董廷会和林茂春代表全村老少马上赶到乐陵，给范老拜墓。范老为人实在太好了，他有那么高的职位，却很平易近人。对群众非常好，即是一个小孩到他那里去玩，临走时他也送出一大段路。

（张茂萱、窦宪诺访问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上升中的桃花坪（节录）

——桃花坪通讯之一

本报特派记者 冠 西

桃花坪原有耕地七九一点五八亩，现有耕地八六二点二八亩，三年中增加了七十余亩。

一九四〇年，四十五家不够吃，其中靠要饭渡日的二十家以上。四一年减为三十二家，要饭的减为十五家。四二年减为二十七家，要饭的减为十家。到今年，只春天二十五家吃了几个月的糠和菜，其余时间已能糊口，要饭的只余五家了。

四一年，武彘生终于被打垮了；庄里，村政农会也都健全了，民主政府调剂并且减轻了负担，大家提起了精神。减租增资之后，他们要求从增加生产中进一步改善生活。因为全庄佃户雇工很少，百分之六十九是贫农。于是提出加紧开荒，要求每个至少开半亩荒，并且严厉禁止了赌博。

最近，他们把所开荒地，今年的收入，打了一下算盘：七十亩另七分地，共收入棉花四十斤，高粱二十斤，荞麦三百七十斤，花生米七百三十五斤，豆子六百六十斤，谷子一千一百一十斤，地瓜干七千六百斤，麦子二百斤，烟叶五十斤，玉米三十斤，共折粮一万另八百六十五斤，若以参加开荒之四十八户总人口二百二十八人计算，大小男女每人每日平均吃粮一斤半，共可食用三十二天。再加原有土地，由于添补地堰、拔草、施肥所增加之产量，明年春荒，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了。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

（选自《大众日报》）

桃花坪要“组织起来”了（节录）

——桃花坪通讯之二

本报特派记者 冠 西

在十月末尾，当秋收刚刚完毕的时候，桃花坪的积极分子们，沉醉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对于生产问题的钻研热潮中，他们同顾本庄以往的生产景况。

三年中扩大耕地面积七十余亩；全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户，改善了生活，并且完全消灭了“懒汉”。他们有充分自信，在明年大生产运动中，使“上升中的桃花坪”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再上升。

在开荒上，他们研究出一种集体开，私人种的方式，把志愿参加开荒的人，在自由结合的原则下，编成若干小组。每一小组，即成为一个集体劳动单位。今天大家去给张三开，明天再去给李四开。给谁开的，就归谁私种。

对有人力，无荒地而愿参加开荒组的贫户，可以划给一定的公荒；或开不了的户，把荒地让出来，五年以后，允许收回，或按二五减租收租。

对有人力，不需要开荒而愿参加集体劳动的户，可在别人还工时，给他垒地堰子。

在牛力的互助方面，他们要打破过去的代耕范围……为了提高全庄的生产效率，以牛为中心，以亩数为单位，把全庄所有需要代耕的无牛户组织起来。六牧中，以牛大小，地质的好坏，划成六个互助组。

……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选自《大众日报》）

桃花坪之冬（节录）

——桃花坪通讯之三

本报特派记者 冠西

桃花坪之冬，已开始离开往年冬季的恬静。他们在为着建立一种新的劳动，使自己的生活会更好起来而忙碌着。

在冬学，识字班，经过了连续的动员和教育，在各群众团体中，便分组进行了具体的讨论。他们已对研究出的开荒、互助、妇女生产和运销事业的各种办法，获得全部赞成。

在一个晚上，不到一小时，有七十五个人报名参加参加了开荒组（占全村劳动力百分之六十五、七）并且，立刻就举出了自己的组长。二十个编组成了，有九个是父子兄弟组。

“吴满友”董廷会和林茂功提出：谁开的好，明年春天花五十块钱买把好钢镢奖给他。

在一个晚上，他们号召了牛主会议，对研究出的那些换工、互助、工具、草料以及对牛如何关照等问题，他们报有趣味的研究着。在编组的时候，他们慎重地考虑着自己互助的每一对象。最后，剩下的几户地多，难耕而又劳动力少的无牛户，没有包揽，大家沉默了。

这时，董廷会、公方海那一伙积极分子，显示了自己的

模范作用，他们冲破寂静地说：“没人和他们一组，我们包了！”于是，全村一切需要代耕的无牛户，全部顺利编入。七犍牛共编七组（其中吸收外庄参加一犍）。……

在妇女生产上，他们要组织纺织独立小组，集股办布。……一百斤棉花织成布，……可获利二千三百元。参加小组的纺户，不仅可以得到工资，而且可以得到优厚的红利，而出了股金的纺户，可以得到双倍的红利（分红是按二股东二分之一，劳动户二分之一），并且，区公所里还答应借给一部分棉花帮助。三天内，已有九户报名参加。

除此，在做豆腐上，一包豆腐可得净利二十元。……他们准备把所有卖豆腐户，编成小组轮流做，以避免做得太多卖不出去（本庄每日可销豆腐三包）。……

另外，他们还准备组织做鞋组，一双鞋卖给村政，可卖八十元，获利四十元，平均每户可做三双。为了使没本的也能参加，村政将有计划地通过小组，预支一半鞋钱，……不过，目前天气寒冷，不便纳鞋底，这种生产，到明年才能大规模的开展起来。

关于运销，有八个挑油户，自动提出编成一个小组。……民兵中有二十二个参加贩豆饼的。……十八岁的林永为去年一冬赚的钱，就把典出去的五亩地赎回来了。

除了以上多种活动，林茂功、董廷会，和一向被人认为“懒肩”的王运秀，示范似的订了自己的生产计划。……

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三日

（选自《大众日报》）

桃花坪生产概况（节录）

鲁中讯：桃花坪最近三月到五月生产的报导：桃花坪全村，组织起来十三个互助变工组，共六十五户，六十五个劳动力。成份：富农一，中农十六，贫农四十八。已经组织起来的劳动力，七个组，七个劳动力能发挥集体作用。全村还有地主、富农各一户，中农二户，贫农十六户，连前共七十一个劳动力没组织起来。……桃花坪的生产工作，是村干部自己搞的，劳动模范董廷会领导的，变工组多半是自愿的结合。……大多数村干部，却按地区分工，参加变工组。村干部因为每天有一人值日，单独成立变工组。……村生产委员会又常表扬模范组——王光瑞组，推动了全村。……

桃花坪组织起来十七个妇女，有十一个起作用。

全村推劳动模范董廷会当村长，他黑夜当白日的工作，全家生产计划该办到的即办到。例如原计划一季纺线十六斤，已经超过三斤，十二个工的地堰子，九个工就干完。他领导全村生产又到下峪、黄连官庄去组织起变工组。学习也是模范。

民国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选自《大众日报》）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墙峪村

张恒谦 张在周*

张恒谦：

抗战开始，西墙峪和南墙峪还是一个行政村。上级派刘梅、关门宣（据说是干部学校的校长）同志来我村建党和群众组织。他们常对群众讲，共产党要消灭剥削，土地要从地主那里还到穷人手里。开始我们不信，以后他们又反复宣传共产党怎么领导群众打日本鬼子，让群众过好日子，很多人就靠近他们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们介绍张道经、张恒秋加入了共产党。建立党组织后，刘、关又帮助我们成立了村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和自卫团等群众组织。自卫团长是张恒凤。自卫团成立后，由关门宣和张恒凤领着到现在属沂南县的老谢庵起了张里元部埋下的十来支枪，武装了自己。一九三九年岩峪乡民主政府建立，同时建立了乡分队。我参加了乡分队，并从西墙峪带去十来个人和五六支枪。在乡分队时，由乡分队指导员胡家礼介绍我入党。因为我当时家庭生活困难，在一九四零年日本鬼子“扫荡”前我从乡分队回家当了庄长。

一九四零年鬼子秋季“扫荡”前，上级号召空舍清野，

* 张恒谦、张在周，沂水县院东头乡西墙峪村人，现在家。

并把很多公粮运到我们村，叫我们保存。村干部把粮食分到户，由户里刨地窖藏起来。地窖挖好，把囤下到窖里，上面盖上草，再用土埋起来。村里到处贴着标语：“不要扒粮食，小心地雷！”说有地雷，这是真话。上级发了地雷、手榴弹，我们自己也打了些石雷，埋在了敌人容易注意的地方。我们存的二万斤公粮，没受什么损失。

敌人“扫荡”开始，村里的游击小组到山头上和鬼子、汉奸打游击。有一天，咱们的一批工作人员从南边过来了，经过西墙峪往北走，到南墙峪村南遇上了鬼子。我们游击小组正在村东的山头上监视敌人，看得很清楚。我眼看着咱们的一个同志被敌人打中。战斗过后，我从山上下来看那位同志。当我靠近他时，他说：“敌人当是我已经死了，我还没死，你想法把我弄回去。”我把他背到了我家，我妈烧了点盐水给他喝了后，我把他背到一个天然洞子里。他的伤很重，子弹从后边腰间打进去，从肚子上出来，我妈用败毒草、艾蒿给他薰了伤口，用秋千牛粪烧成灰给他敷在伤口上，包好。他浑身是血，想给他换身衣裳，当时我家很穷，没有一件多余的衣服。正在为难的时候，我村的妇救会长张梁氏（不知她的名字）给了床半褥子，给伤员披着。以后知道这个伤员名叫吴士金，是现在沂南树仁里（水牛里）村人。他在我家养了十五天，伤好后，我把他送回家。有一年，他曾带着礼物来看我。

也是在这一年，鲁中军区的一部分同志向蒙山转移，指导员高自然和连长王太元领着一个侦察排先走，在现在的沂南黄草窑遭到鬼子合击，一部分同志牺牲，一部分被俘，一

部分负伤。连长王太元的两个耳朵都受了伤。等鬼子撤走，王太元和一姓刘的、一姓耿的伤员，爬到了吴士桂的家里。这三个伤员在吴家待十来天后又转到我家，直到养好伤才走。

从一九四〇年开始，连续三年的秋季大“扫荡”中，每年都有我党政机关和部队的干部、战士、伤病员在我村隐蔽。包括几户富农在内，每家也都有掩护伤病员的任务。我家在东山山腰里，与我家紧挨的是张道增家，我们两家一年就曾掩护过三四十人。记得在我家待过的有：

付玉珍（鲁中区联办主任马馥塘的爱人）。

王志远（胡奇才的爱人），一九四一年、四二年都在我那里。她的第一个孩子是在这里生的，生下后叫张恒奎家奶着。

牛玉清（王建安的爱人）也连续二年藏在我家，她的儿子王东保就在我家生人。

刘震（二军分区司令员王福祥的爱人），也在我家藏了二年。

胡敬（鲁中军区的）也是在这里生的小孩。

另外，谢亚峰、张政、朱可娟等都在我们那里隐蔽过。还有许多同志在我们那里住过，现在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一九四二年秋，敌人又“扫荡”，在这次“扫荡”中，发生了旋固顶战斗。战斗中，我村游击小组带着国民党五十七军一百一十一师起义的一部分人突围出去。在临分手时，他们说：在旋固顶上有他们放弃的一门炮和四发炮弹，叫我们去弄下来。我与游击小组的杨发升、张道秀、张道树、代

玉明等人上了旋崮顶，正碰到负伤的一百一十一师的王排长，我们把他背下来。在山坡上又碰到一女伤员，是我党派到一百一十一师的女指导员杨杰，代玉明也把她背到我们的医院。我们又把一门炮和炮弹扛下来，还得了四支枪。我们把炮和炮弹埋到梁子峪的地里，不久，上级派人来打听这门炮的下落，我们就把炮送到杨家崖咱们的部队里，四支枪也一起交上了。部队奖励了我们五十粒子弹、六十个手榴弹、一支枪。

我们村还有很多人掩护我党我军的人员、物资，做出了很大贡献。如：

张道增。前面说了，他和我是近邻。有一年，一个姓耿的干部被敌人抓去，受了很厉害的刑罚。他好不容易偷着爬出来，让老民兵代文平发现背回来，送到我家。这个伤员的伤口一化脓，臭得屋里进不去人。道增的老婆用栗子皮、牛粪灰给他治伤，把唯一的一条棉单撕了做绷带，一直把这个人伺候好。王志远在他家生小孩后，碰上敌人来“扫荡”，他把她藏到挖好的山洞子里。她害怕，道增一家六口也进了洞子和王志远做伴。鬼子从旋崮顶上下来，当走到洞子跟前时，道增的孩子喊着要尿尿，道增老婆小声制止孩子：“别说话，外边有鬼子！”孩子不听，还要说话，道增的老婆急了，抓起块手巾把小孩的嘴堵住了，等鬼子离开，才把堵小孩嘴的手巾拿下来，把小孩憋得脸都发了紫，好一会才喘上口气来。

张梁氏，当时是我们村的妇救会长。她家里负责掩护王会明、王会清、窦桂兰三个女同志。为了对付鬼子的突然袭

击，她把三个同志化装成农村闺女。有一次鬼子进了她家，她说：“别进屋，俺闺女害怕。”鬼子见是三个满脸灰的农村姑娘，就走了。她工作积极，也有办法，分到俺村做军鞋的任务，她带头做好，连自己的包头布都做了鞋面布。所以分到俺村的军鞋任务，说什么时候做好，就什么时候做好。

张效治，当时是我们村的农救会长。有一年，他家藏了五个伤员。平日，伤员都在洞子外晒晒太阳，活动活动。一天，鬼子突然来“扫荡”，听到消息，鬼子已快到南墙峪了。他一个一个往洞子里背，他老婆就背铺草。他夫妻俩把五个伤员安排好，想再去背他年迈的父亲进洞子，忽然，野战医院一所的一个叫田桂英的护士叫鬼子赶进了他家，田的鞋都跑掉了，要求在他家躲一躲。等把田藏好，鬼子进了他的院子，鬼子问张效治的父亲有没有八路，老汉说：“哪有八路，都走了！”鬼子野性发作，当场用石头、磨棍把张效治的父亲砸得脑浆崩裂。

代文洲和他的父亲、弟弟的革命事迹也很突出。有一年，邵参议（德孚）从南沂蒙来，在代文洲家吃了饭，就把他骑的马子、穿的军装和带的文件交给代文洲收藏。代文洲和他的父亲、三弟代文明三个人牵着马子、带着东西到一个叫小龙岗的地方掩藏。东西藏完，鬼子从马牧池方向来了，把他三个人逮住了。鬼子向他们要枪、要东西，代文洲说没有，被鬼子翻译官打得死去活来，他也没吐一个字。最后鬼子将代文洲一石头砸死；又把他的儿子被绑在一棵小树上，恶狠狠地问他要东西，他也说没有，被鬼子用刺刀穿死。代

文明一看哥哥、侄子都叫鬼子害了，自己也不会有活路，趁鬼子不防，拔腿就跑，刚跑出百十步，鬼子向他开枪，第一枪打着脚后跟，第二枪打中了腿，他爬到一个山洞子里藏起来，淌了很多血，敌人又找到他，用脚踢他，他装死，鬼子以为他真的死了，就走了。鬼子走后，才被救回来。

张在周：

抗日战争时期，我是村政委员，普通群众。一九三九年，野战医疗所搬来我村。为了掩护伤员，医疗所号召群众给挖洞子，挖一个洞子给15—20斤高粱。洞子是拆开地堰子往地里挖，挖好砌好，再把地堰子按原样垒好。不几天，洞子如数挖好了。到一九四〇年，来了伤病号，每家分1—2个。他们的口粮由上级拨给，待一天开一天的给养。平日，伤病号在外边活动，鬼子一“扫荡”，大家就把他们安置到洞子里，给他们拿上尿罐子，晚上，拿开几块石头，给他们送水，送饭。连续三年都是这样藏伤病员，没叫一个同志受损失。

这里还存过枪枝、弹药、被服、军粮和我们发行的票子，都没有受一点损失。

一九四〇年鬼子“扫荡”前，医疗所叫我们给藏一头供伤员喝奶用的奶牛。恒谦把藏这头奶牛的任务交给我。人和东西都好藏，这奶牛怎么藏？它又不老实又叫唤。最后，我把它藏到了一个石棚里。这一年敌人“扫荡”，我们村的十多头牛，叫敌人赶得还剩下一头，羊全部叫敌人赶去，唯独这头奶牛完好保护下来，医疗所对我们很满意。第二年春天，村里没有牛耕地，医疗所的同志给我们拉犁种地。县里

也给了我们一头牛，只作了三十元钱。

一九四〇年除夕晚上，鲁中军区的一部分人被敌人赶到这边。大年五更，村里的群众都在吃水饺，部队来了，还能叫他们看着？我召集村干部商量，大伙一齐请同志到家里吃饺子。我请了两个，四五十个人，都吃上了饺子。部队也没白吃俺的，到一九四一年，凡在俺村过年的，都按每人三斤麦子拨给了我们。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敌人“扫荡”，山纵指挥部机关转移到西墙峪，一百二十六口人要在三十多户人家的一条山沟里吃住，是怪困难的。开始，我挨家给他们称东西吃，但这办法太慢。后来，我干脆对司令部管供给的同志说：“别称了，你们要吃地瓜干从囤里扒，要吃地瓜进窖子里拿，到各家吃吧。”他们住了一天另半晚上，都是在各家吃的。临走时，一个叫吴运生的同志说：“吃了饭没粮还，不公道。”我说：“以后再说，吃。”因此部队说我是“山纵庄长”。自这之后，我这“山纵庄长”的名就传开了。三年后，他们又回来了，住到野鸡旺。司令部捎了个信来叫我去结账。我找到部队，他们不但还了吃的粮食，还供给我村五千斤豆子，让我们渡荒，做豆种。过了五年，我们又把吃的豆子还给了国库。

（窦宪诺调查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抗战时期俺宅科村 是怎样掩护革命同志的

李 德*

我一九三九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俺村和王庄一个支部，支部成员五人，店子村宋士善任支部书记。到一九四一年，区委认为两个村在一起不方便，就指示我们各自建立支部。分开后我在本村任组织委员。共三十八个党员。

我村座落在南北两山之间，山沟很多。我家就住在南山腰的一个小坪上，从山下根本看不到，地势很好，非常僻静。每逢敌人“扫荡”时，有些干部就转移到我村隐蔽。那时，我们的情报很灵通，鬼子要“扫荡”，事先都能知道，提前做准备。我家就备下好几扎长头发，专门给女同志化装用的。

一九四二年春，王富元在这里任区委书记。他对我说，您那里地势很好，咱的一个医院在刘家峪，要搬到您村，您可以挖几个洞子掩护伤病员。王富元同志一说，我们就干起来了。开始人不多，只有我们五个人干。白天挖怕人知道，都是晚上行动。这事不知怎么被代纪传发现了，他想参加，但不敢直说。有一天，他在街上碰着我，说：“您大哥，你

* 李德，沂水县王庄乡宅科村人，现在家。

干什么？”我说备战。他说：“我去行吧？”我看他说话很恳切，又想他不是什么外人，就同意了。我们很快挖成了一个，领导来看了看，说很好，叫我们继续挖。后来发展到十五六人，一气挖了十七八个。这些洞子，都在草木丛生的偏僻山沟里，除了参加挖的，别没人知道；洞口开在石壁上，垒上石头，很不容易发现；里边很宽绰，还筑上一个小土炕，最大的能睡七八个人。转移到这里的同志，由我们七个党员同志分工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特别是敌人“扫荡”，情况紧张的时候，都要绝对保证同志们安全，谁出了问题，谁负责。那时，我老伴也出了不少力，她天天早起推磨摊煎饼做菜，由我天亮前给同志们送了去。那时别没有什么菜，我每年收一些豆子，就做豆腐给同志们吃，差不多两天一包。最多的时候，在我家吃饭的有十七八人。

这一年春，一次就转移到我村四十七个伤病员，由我们三十八个党员分工掩护。那时区里的王炎、王琪、李现玉、刘×贵等同志也经常来，我们比亲姊妹还亲。

这年秋，王富元同志找我商量，他说林柏（王涛的爱人）同志有病，要到这里休养。我说这是组织信用，我一定尽力。过了几天，就用担架把林柏同志抬来了，连她的党员介绍信也带来了。是王涛、邵德孚骑着马和王富元一起来送的。王涛对我说，把老林交给你了，请你一切关照。我说，这是在自己家里，不要客气。王涛和邵德孚还带着酒，我们一起喝了一壶。他们待了两天就回去了。

他们走后，我把林柏安排在三间很僻静的堂屋里，离我家不远。我们山里不缺草，我给她搭了一个很厚的铺。林柏

同志病的很厉害，不能起床，吐痰很多，一晚上吐一地，一明天我就去打扫。她的病需要保养、治疗，我老伴就经常做豆腐脑给她喝。我也经常到岸堤马牧池去给她拿药。有一天，我去她屋里，她对我说，李大哥，铺上硌人了。听她这么一说，我知道她想叫我把铺扫扫，但又怕我嫌脏，不好直说。我说，好，扫扫吧。从此，我隔几天就给她扫扫铺。过了一些日子，邵德孚同志又来了，他见我忙不过来，要我找个老妈妈专门照顾老林。我找了阚成才的母亲，论庄亲我叫她三大娘。有一次，日本鬼子“扫荡”，到了摩天岭，和我村只有一山之隔，情况很紧急。我和谢荣胜、李富泉先把林柏抬到洞子里；又把三大娘背了去，嘱咐了一下，我说：三大娘，不是我来，谁来叫也别答应。我把洞口垒好，又用扫帚把脚印扫掉。回头又把王炎同志送到洞子里。我从山上下来，顶头碰上卞坤同志，我们一起走到掩藏他的洞口，洞口离地半人多高，老卞一跳没有跳上去，他急了，我也急了，就趁他一跳，我两手一掀，只听扑通一声，老卞跌了进去。究竟跌成什么样子，我来不及看了，就连忙把洞口垒好。当天鬼子过去之后，我先去看了看老卞，我在洞子外面小声喊，里面没答腔，我认为坏了，摔死了，就去拆洞口，这时老卞才在里边说话，问：是谁？我一听他还能说话，才放心。

老卞同志是我们八路军修配组的负责人，带着十五六人，专门造手榴弹、拉雷。这年日寇“扫荡”之前，他们从杏峪转移到我村，住了一年多。他们临走时，把十八挑子手榴弹、拉雷交给我们保管。我们挖了三个洞子，洞口都在坝

蜃半腰里，保存了大半年，才运走了。林柏同志在我村住了一年多，把病治好以后，回到工作岗位。

那时，不光一些革命干部来我们这里，还有一些革命同志的家属也上这里安排。还在林柏同志来以前，即这年古历四月天，王炎同志来和我商量，要把十一团团长陈宏的一个叫鲁生的小月孩送给我老婆奶着。俺当时也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小妮，怕顾不过来，我不敢答应。王炎同志说那个小孩的妈（王文淑）没有奶，你就叫大嫂奶着吧。同志们的委托，不好推辞，我同意了。王炎把那孩子抱了来，晚上俺老婆一边一个搂着。到了夏天，两个孩子贴在身上，她起了一身热疖子。到九月天，俺那小妮因为缺奶，老是有病，三个月就死了。鲁生这孩子我一直养到四岁，叫爷叫娘，就象我们自己亲生的一样。王文淑同志的娘家是柴山，他母亲要把鲁生接去，我一听孩子要走，一夜没有合眼。鲁生走的那天早晨，她又哭又喊：“俺叫人家抱走了，您不管了，俺家走……”引得我们全家都哭了。那早晨我全家四口人难过得谁也没吃饭。到一九四七年，我在高庄和陈宏见了一面，以后再也没有见信。

一九四四年，后勤部送来六匹骡驹子叫我们保存。说实在的，这比掩护什么都困难。它不通人性气，到处乱跑、叫唤。我们三个同志分了工，每人管两匹，把它喂饱了，牵到山上树行子里，绑在树上。这六头牲口一点问题也没出，后来全部交回后勤部。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张茂萱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

鲁中区党委减租减息试点村纪实

王建升*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深入发动群众，提高全民的抗日积极性，咬紧牙关，渡过难关是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项严重任务。实行减租减息便是深入发动群众的一项重大措施。鲁中区党委把“双减”的试点村选在了沂水县的埠前庄村。今天回想回来，区党委把试点村选在我们埠前庄村是经过周密调查研究的。首先，这村地主剥削的份量重。那时，租种地主的地，劳力少的户租四十五亩，这叫“单张子锄”；劳力多的户租八十亩或再多些，这叫“双张子锄”。地主剥削的手段很多，虽说是收成按五五分成，地主、佃户各得一半，实际佃户得不到一半。租种四十五亩地，要吃八斗糝子的份子粮，租种八十亩地要吃一石二斗糝子的份子粮，份子粮春天吃，到秋天一斗还二斗，为了笼络佃户，再从这二斗中拿出一斗由地主、佃户对半分。佃户过年吃顿水饺要向地主借麦子，这叫吃“年粮食”，“双张锄”可借一百斤，“年粮食”也是借一还二。另外，种子也是由佃户负担，双张锄种四十亩小麦要用五百斤麦种，这也要向地主借，收下小麦后如数还给地主。这样总算

* 王建升，沂水县姚店子乡埠前庄人，现在家。

起来，佃户收一石粮约交地主八斗。

除了剥削重外，这村地主户数多，势力大，统治也严。那时，这村有“自省斋”、“师古斋”、“师竹斋”、“馨德堂”、“宝书堂”、“中合堂”等二十余户地主和一户富农，他们占有全村二千二百亩土地的百分之九十，即二千余亩。全村七百口人中二百口给地主种地、看山、种菜园、放牲口，生活来源靠出卖劳力，如稍有不慎对地主所有得罪，地主便以退佃相威胁，而且地主串通一气，这家退了那家也不收。我家也是佃户，我不记得佃户中有抗租的行动，大都是年复一年地租种土地，受地主剥削。

鲁中区党委把“双减”试点选在这个村的用意很明白，攻破这个堡垒，取得斗争经验，教育一大片，带起一大片。区党委派到这村的工作人员一位叫李素，一位姓徐，名字忘记。县委也派了人来。区委直接住到埠前庄村，区农教会主任刘一峰参加了试点工作组。

工作组农历三月上旬进的村，住了一个月进展并不大。晚上工作组找佃户开个会，回去后地主又找佃户训话。有个地主叫刘立生，对佃户说：“别看共产党眼下怪盛腾，我看长不了，共产党势力再大还能大过蒋介石！不小心叫共产党弄去当了炮灰！”所以，开始发动减租减息都没有敢动的。工作组见我在佃户中有些威信，也敢说话，就派刘一峰与我谈话，叫我出来干，我说：“一家人靠我挣着吃，再出来办公还行？”他多次找我做工作，有时我只得躲着他。

到后来，鲁中区党委驻到我们村，区党委负责同志高克亭找我谈话，他明白透彻地讲了“双减”，特别是减租的意

义和党的政策。刘一峰又找到我，肯切地对我说：“你是老佃户，大家看着你，这个村能不能搞起双减就靠你了！”党组织对佃户的一片诚心，就是铁人石头人也会被感化。我答应出来干。刘一峰介绍我入了党，经过我提名，又发展了刘德荣、杨茂田、刘成林、王家全、袁树响、张志成等几位党员，连同村里原有的两名党员成立起党支部，区委的组织、宣传委员参加了我们支部的成立会，会上选我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各级党委的支持帮助下，由支部和党员分工做工作，很快建立健全起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组织。农救会长是杨成林，我担任副会长，村团长是刘德荣，民兵队长是张之农。在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上，又选举产生了三三制的村政权，王风起担任庄长，地主出身的刘科然担任副庄长。

有了组织就有了力量。工作组训练我们党员，区党委负责人也找党员座谈，给我们讲村里地主的发家史，讲地主剥削人的手腕，提出“谁养活谁”这个问题叫大家讨论。工作组调查的材料很详细，很有说服力，经他们一讲，我们从道理上明白了许多。党员们认识提高、丢掉了大部分顾虑后，又分头做群众组织工作。在讨论“谁养活谁”这个问题时，开始有不少人认为地主的地穷人种，交租剩下的是佃户吃，不是地主养活穷人吗？党员们向大家讲，地是穷人开的，是穷人种的，粮食是穷人的汗水换来的，地主不劳而获生享其成，怎么是地主养活穷人呢？佃户不是不想减租，是有些顾虑，看到共产党一心为穷人着想，双减工作非搞不可，心里也就踏实了，道理也就接受得快了。

快割麦子时，工作组正式发动佃户减租。除了做佃户的工作外，工作组和农会还出面做地主的工作，讲党的减租减息政策，讲他们减与不减的利害，欢迎他们以抗战大业为重主动减租。在会上没有一个地主公开表示不减，这更增加了佃户的斗争信心。

这次搞的是“五一”减租，即把交地主的租子减去五分之一，由原来的地主、佃户五五分成改为四六分成。麦子收到场，农会主持减租，党员把减的租带头扛回家，其他佃户也就高高兴兴地把减的租子运回家倒入自己的囤里。当然也有个别人有顾虑，减的租子拿回家后，夜里再偷偷送给地主。

减息的试点工作声势不大，因为借贷都是保密的，面也极少。

鲁中区党委在试点之后，于沂南县安乐庄召开地、县干部会议布置减租减息，使双减工作在全区逐步展开。

这次减租试点工作锻炼了埠前庄的党员、干部、群众，到一九四三年实行“二五”减租时就势如破竹，非常顺当了。减租减息后，埠前庄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战热情第一次迸发出来，上级每次分给这个村的做军鞋任务都超额完成，而且全部是一等。鲁中区党委、沂蒙地委和一些部队都曾较长时间住在这里，部队、机关一到，群众踊跃拿出自己的粮食，碾米磨面叫干部、战士吃好。

事实证明，党中央和山东分局决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坚决实行“双减”是非常正确的。

（窦宪诺调查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八日

抗日战争时期 我在沂水县做妇女工作的一段回忆

阎 娟*

一九三九年一月，我同王亚南（女，山东寿光人）同志自八路军八支队调到驻沂水县王庄的山东分局，接着被分局介绍到沂水县抗日根据地工作。我们从分局驻地爬山越岭到达沂水县城，县委的邵德孚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这时县委书记是刘建中，组织部长是王翰卿、宣传部长×××（名字失记）。县里设有工、农、青、妇等群团组织。我记得妇女组织十几个人，负责人是杨刚、夏明。

本年日军“扫荡”前夕，国民党军阀沈鸿烈统治全省。沂水县地处沂蒙山之间，面积广阔，有高山峻岭，山林很多。由于地处沂蒙山区，交通不便，学校很少，群众上起学的不多，所以文化程度普遍很低。但是阶级觉悟却很高。他们那种勤劳、朴实、热情、友爱、无私的精神使我敬佩。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这一带地下党的活动非常活跃。特别是沂水党组织创建人之一邵德孚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再是沂水二区由于党员比较多，曾被称为“小苏区”。

*阎娟，山东省寿光县人，曾在安徽省合肥市人事局工作，现已离休。

这时，徐向前率领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开进沂蒙山区，先与山东分局一起驻在王庄，后来活动到夏村、坦埠一带。廖容标、霍士廉率领的八路军四支队（后改编为四旅）活动在新泰、莱芜一带。王建安、钱钧率领的一支队（后改为一旅）活动在沂水八区南麻、薛庄、悦庄一带，后来移驻七区。刘涌率领的二支队活动在莒县大店、十字路一带。后来抗大也迁至大店一带。罗荣桓师长和陈光率领的一一五师活动在临北、沂南、费东一带。以上部队都积极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帮助建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组织。当时沈鸿烈的省政府驻在东里店，国民党张里元的部队驻在沂水二区坡庄一带，县、区、乡政府也属国民党的。但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我党的工作，我们在县、区两级都成立了民众动员委员会，发动民众起来抗日。

此时，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指导下，县委曾派杨刚、夏明到坡庄张里元部做过宣传工作；同时到孔家庄、埠前、大、小诸葛等村演讲，教唱抗日歌曲，组织妇救会。不久，夏明调走，县委派杨刚和我到国民党沂水县政府做统战宣传工作。

这样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沂水县委又派我和王亚南分别到二区、五区工作。当时我才二十岁。到二区时，区委书记是王同庆，组织委员是孔益千，宣传委员是刘月芹（已牺牲），动委会主任是陈梯山。下设四个乡支部。王同庆首先把二区各村群众思想情况、妇女情况、党员分布情况对我一一作了介绍。事后，我即奔波在孔家庄、松峰头、大诸葛、小诸葛、埠前、刘家山宋、小瓮山、道托、葛庄、大暖

峪、小暖峪、河北、卞顶、常庄、胡同峪等村，组织妇救会。广大农村妇女虽然受到传统封建制度的束缚，但他们中间也蕴藏着极大的革命活力，一经教育发动，阶级觉悟提高很快，爱国热情很高，纷纷参加自己的组织，妇救会很快组织起来。大村六、七十人，小村也有四、五十人，妇女会长多数是老大娘。如埠前村的王大娘、李鸿莲大姐（她是杨刚发展的党员）、刘家山宋的刘大娘、小瓮山的王大娘、孔家庄孔益千的母亲，还有陈淑身的母亲陈大娘等等。其中陈大娘是二区出名的妇女会长。我到二区后一个月，就发展了四百来名妇救会员。以后，我每次外出活动，都有妇救会长陪同。有一次，我与刘家山宋刘大娘等几人到驻沭水附近一个小村的杂牌部队司令部，以慰劳他们的方式作宣传工作，同时到周围村庄宣传抗日，他们表面上表示抗日，暗地里却派便衣监视我们。我们回到刘家山宋时，刘大娘告诉我说：“阎同志，人家派了好几个便衣跟着你，你讲话时，暗探就站在你身旁，你知道吗？你不害怕吗？”我说：“不怕，要求大家共同抗日有什么不对？发动群众抗日也对他们有利嘛！跟着我还给我起了‘保镖’作用呢！”大娘们哈哈大笑，都说：“阎同志，你真大胆。”

由于大家的努力，各村不仅都建立了妇救会，而且都办起了夜校识字班。当时埠前村李鸿莲大姐带头办的识字班最为活跃，每天晚上妇女们抱着孩子坚持去学习一、二个小时。大家学习热情很高，晚上学了，白天再教给十几岁的儿童。

一九三九年三月，县妇救会杨刚同志召开第一次各区妇

救会联席汇报会，这时，二区发展了四百多名妇救会员，居全县首位，会上，受到杨刚同志的表扬。

会后，我们不仅继续发展妇救会员，办各种形式的识字班，还发展了三十名女党员，如陈超、陈淑身、袁涛、孔益千的妹妹等。这些女党员多数是干部亲属、烈军属和妇救会骨干，她们入党后，不久先后脱产，成为革命干部。

不久，县委又向各区派了一批妇女干部。到二区的有新锐老、罗（名字失记）。她们来后，我们密切合作，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不仅妇救会员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成立了青年团、儿童团等组织。我们为宣传抗日跑遍了二区大大小小的山村，教唱“九·一八”小调、“妻子送郎上战场”、“放足”、“妇女解放歌”、“工农兵学商进行曲”等，受到大家的欢迎。有时我们到村里宣传，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自然会场，有些调子非常悲壮的抗日歌曲群众听了无不落泪，泣不成声；许多人情不自禁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保卫家乡，保卫全中国！”

一九三九年五月初，我们在二区召开了一次全区妇救会员大会。二区处于沂水西北乡偏僻山区，高山峻岭，道路崎岖，但参加会的大娘、大嫂、姐妹们不畏路途遥远，爬山越岭，准时参加会议。当时开这么一个会很不容易，我们的区政府还没有成立，动委会也没钱开支，吃饭、住宿都很困难。为了开好这个大会，我便同区委书记王同庆向国民党区公所交涉，要求解决困难，当时国民党区公所副区长冯果不同意，我们对其进行了说理斗争，他才勉强批给我们二百斤面粉，不足部分是我们自己想法解决的。这次会议开得非常

成功，影响很大，进一步树立了妇救会的威望，有力地带动了整个二区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六月，小麦尚未收割，日寇开始“扫荡”，从四面八方袭击沂蒙山区。他们采用的是分进合击的战术，一路由胶济线上的益都，经过穆陵关直奔沂城；一路由新泰、莱芜、淄博直奔东里店，然后进击沂水城；一路由津浦路而来，经过依汶进击费县。敌人天上是飞机，地下是大炮、坦克和快速陆战队，很快占领沂水城，并在东里店、葛庄等地设了据点。国民党各级政府闻风而逃。整个沂蒙山区一片混乱。为抗击日寇，我们趁此开始组建区、乡民主政权。

这时驻王庄的山东分局，在南麻、悦庄活动的一旅，在莒南活动的二支队，在新泰一带活动的四旅都立即奋起与日寇展开激烈的战斗。

不久，山纵、山东分局移驻二区上、下胡同峪一带，县委同时也转移到二区，我们就跟县委机关一起活动。这时，陆升勋的特务团在胡同峪山前梭峪村与敌遭遇，展开了一场激战，歼敌一部。特务团政治部主任王××（名字失记）在战斗中牺牲。

战斗之后，徐向前率领的山纵部队和驻地领导机关于大诸葛庄一带，召开了一次军民大会，动员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武装抗日。不久，县大队、区中队、乡分队相继成立。

这时驻沂水各据点的日军不断出动骚扰，破坏区乡抗日政权。一次，二区诸葛乡乡长李鸿标和副乡长王××（名字失记）在常庄活动时，被敌人发觉，夜晚被敌包围，李鸿标

看事不好，翻梁而上，从屋顶逃出，但尚未跑出村外，在一块麻地里又与追捕敌人展开了搏斗，最后突围。副乡长王××行动迟缓了一步，刚刚爬上屋梁，就被冲进去的敌人活活用刺刀捅死。

同时，三区区公所也曾在一拂晓遭到日军袭击，妇救会的几个女同志被包围在里面，最后终于脱险。当时，日军包围袭击我们的驻村是常有的事情，由于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巧妙地进行周旋，常常使敌人的阴谋落空。

那时，国民党五十一军驻七区马站一带，秦启荣部驻八区。秦部反动透顶，不打日寇打我们，专门迫害我地方干部，群众对其所作所为恨之入骨。

同年夏季，山纵机关回到大诸葛时，杨刚与张经武结了婚，婚后杨即调走，县妇救会长由我担任。这时上级又派吴畏、赵玉琴（赵笃生的女儿）到沂水工作。

同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与我们搞磨擦，在沂水抗日根据地边沿地区，形成了敌、伪、顽三角斗争的局面。沂水县委机关被迫在沂水境内南北来回移动。这时，上级指示，动员人民与敌伪顽坚决进行斗争。

同年九、十月间，赵玉琴派至沂水四区工作。一次，她带领乡分队在一个山顶上打退了来犯之敌，受到上级的表扬。这时县委书记刘建中调走，王翰卿接任，组织部长是郝心昌，宣传部长是刘滋泉。至十二月，吴畏调走。

一九四〇年五月，我到沂南随乐庄子召开了一次各县妇女工作联席大会。大会号召各县妇救会都捐献慰问品，慰劳八路军。沂水县献了二百双鞋子，五十个背包，二百双布

袜，被地委评为模范县，颁发了锦旗一面。这时正是张谦调至沂水，我们一起手扯锦旗合了影。

同月，县委机关于一个夜间从二区常庄向三区转移途中，在葛庄附近公路被敌人包围，有两个青年干部幸亏被该村一个大娘想了个巧妙的办法，让其二人用小车推她走娘家才逃出包围圈。这时我正有病，埠前村李鸿莲大姐把我掩护在山沟里。养病期间，我同该区陈淑身家的陈大娘坚持做妇女工作一个月。

同年秋，全县组织了两万多名妇救会员，她们为抗日做出了很大贡献。有的老大娘骑着小毛驴送情报；有的老大娘化装成货郎去王庄侦察敌情。二区小诸葛村陈大娘同我们一起去侦察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大圈村藏下的枪支。此时，我们在四区朱家坪村召开了一次各区妇女干部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们吃饭，是靠群众供给煎饼，不够吃的，与会会员就利用休会时间到野外挖野菜煮了吃。尽管生活这样艰苦，但是会议开得很好，与会同志都兴致勃勃地谈论各区对敌斗争的情况，交流工作经验。记得八区的陈超同志，紧密配合区委的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做出了一定成绩，会上受到表扬。

同年七、八月份，我患疟疾，养病期间，我坚持开办了一次从全县各村抽调的三十余名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十天，学员大都是小脚大娘和大嫂。学习期间，我们跟随部队夜行军两次，一次，转移到甄家疃西小王庄山沟，不料山顶上有顽固派的岗哨，哨兵听见了动静，大声喊道：“什么人？”我们怕被敌人发觉，立即横过北山卧倒，一个吭声的也没有。在我身边的一个大娘不慎扑腾一下掉进水沟里，我

忙悄声问：“大娘，怎么样？”大娘风趣地回答：“抗战到底，打倒日寇。”惹得大家暗暗笑了。

同年九、十月间，县长李贯一同县委、县府机关驻防四区南峪村时，一天中午突然被日军包围，机关人员及当地武装部队奋起反击，胜利突围。突围中，我方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这时，我们妇救会整天跟随县机关坚持活动。上级派给我们妇女的任务，我们都能保证完成。从一九三九年七月至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共做了四万多双鞋袜，送给参战部队。有一次省战工会负责人陈明同志特地派了一个连队到二区胡同峪村向我们要鞋子，我们一次凑了一百多双。

同年十一月，七区党委调我和王翰卿同志去一一五师与山东分局举办的高级党校学习。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毕业后，我被分到沂山地委工作。一九四二年四月，我又被调回二地委，配合王炎同志工作。此时，我还兼着沂水妇救会的工作，并且是县委委员。同年八月，我同王炎同志一起调回七区党委，我接替了妇救会负责人汪瑜同志的工作。同年十月，又被调到胶东军区工作。从此，我离开了沂水县。沂水县妇救会的工作由陈超同志负责。这时张谦养病。

我在沂水工作的几年中，除回县机关开会外，其余时间，都深入到基层。那时，我几乎踏遍了沂水这块抗日根据地的山山岭岭。同那里的大娘、大嫂、姐姐、妹妹结下了骨肉之情。她们勤劳朴素和勇敢的献身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我还非常想念她们。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日

抗战时期沂中县妇女工作片断回忆

史培力*

一九四二年八月，我从二地委妇救会调到沂中县任妇救会主任。这之前沂中县妇救会主任（党内称妇委书记）是阎娟，副主任是张谦。因为阎娟调沂北工委工作（沂北县前身），张谦被扑，所以才调我去接任的。张谦，她不是陈毅夫人张茜。她是淄博人，是二地委武装部长赵希纯的爱人。她一九四一年在沂水被扑，详细经过我不知，但是我知道是组织上把她营救出来的，这事现在已经搞清了。赵希纯现在铁道部基建局任局长，张谦也在那里。

我到沂中后，第一个印象是县委对群众工作很重视。各个群众组织都很健全，工作也很活跃。当时，县抗联主任是吴金朋（坦埠人），农会负责人是杨令真，青救会负责人是杨琳，工会负责人是吴金朋兼。各区妇救会主任是：金泉区黄家玉，夏位区包美菊、周锐，扈山区王炎，城子区谢林，沂城区王莹，王庄区王琪，郭庄区郭成云（刘建中的爱人），其余现在记不清了。

在我到沂中的时候，沂中县村妇救会已普遍建立。妇救会长，大多是选一年龄较大，在邻居中有威信的妇女担任，

* 史培力是李子仁的爱人，山东聊城人，在陕西省建材局工作。

副会长多是识字班（女青年）。这个选配干部的方法很适于当时的情况，因那时妇女还很封建，一般有点年纪的妇女比识字班泼辣些，所以需要青老结合，以老带青，以利开展工作。那时吸收妇救会员的条件和手续也比较完备了，要求入会的人需提出申请，会员大会讨论通过，妇救会批准。由于当时是革命战争时代，有许多重要工作，如护理伤病员，掩护干部等这些重要事情，大都由妇救会承担，因此，入会的条件和手续不要求严格一些是不行的。为了使妇救会更好地担负起这些重要任务，当时县妇救会很注意对会员的培养，提高其工作水平。为此在各村成立了妇女识字班，组织她们学文化、学抗日的道理。还举办训练班，培养妇女干部，有时县妇救会自己办，有时和工、农、青联合办。此外，还按季度召开妇女干部会议，总结工作，交流经验。记得朱瑞的爱人陈若克同志壮烈牺牲后，我们曾组织妇女干部学习她的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工作是多么踏实。

那时做妇女工作，初次打开局面很不容易。因为中国妇女长期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一时难以觉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当时很多女干部便在农村认干娘，有了干娘这关系，自然就带起干这干那一大群，成了自己人，说话办事也就投契了。我也认过两个干娘，其中一个地主，但很开明，拥护抗日，拥护共产党，其三个女儿都待我很好，后来都脱产当了干部。

那时和群众真是亲如一家人。四角泉支部书记王永刚，我去他家就象到了自己的家一样。他的母亲相当好，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有一次，我去他家，一进门，我就问：

“王哥在家吗？”大娘说：“您史大姐，我先问你个事，那搭拉解是什么人？”这可把我问住了。我想了想：莫不是“希特勒”？因为当时我们经常唱一支歌：“这边是张伯伦，那边是希特勒，狗咬狗两嘴毛，狼吃狼一样的长尾巴。”于是就问大娘：“您是不是说的希特勒？”她说：“就是，就是！”我接着对他讲，希特勒和日本鬼子一样坏。陈家枚沟子有个肖大娘，其女儿叫肖兰芬，她们掩护干部是很有办法的，当时很出名。有一天，我在该村正给识字班上课，突然有个女孩跑去告诉我：“大姐，鬼子来了！”我问到那里了？她说：“过了沂河了！”这时肖兰芬也急忙跑去对我说：“大姐，鬼子来了！俺娘叫你和我们一起走。”我们立即一起转移了。

我到沂中县不久，适逢日寇大“扫荡”，亲自看到反“扫荡”中，许多妇女的斗争事迹是多么动人啊！那时部队医护人员很缺，许多伤病员只好安排到村子里，由妇救会员负责护理、掩护。几乎村村有山洞，伤病员大都藏在山洞里。白天背出来晒太阳，晚上背进去，送水送饭，提便壶，这些事情都是妇救会来做的。有些老大娘，利用葫芦开个口，给伤病员们做便壶，使用很方便，想的可周到。

这里提一下医生刘惠民同志。那时刘惠民是拥护我党的抗日民主人士。他在根据地里开了个小药铺，设在许家峪。我们的同志有了病，送到那里去治疗，他是非常负责的。在那战争年代里，妇女干部经常爬山过河，担惊受怕，许多同志得了妇科病，他叫我们采些益母草，由他熬成益母膏，送给我们妇救会，开会时发给同志们，很多同志的病，就是这样治

好的。当时刘华（武杰的爱人）丁聪（霍士廉的爱人）都病得很厉害，就在他的治疗下，很快痊愈了。

我再谈谈大辛吧。这虽与沂中的事情关系不大，但是我很想谈，因为现在我想借此纪念她。那时我还在南沂蒙费东县妇救会工作，常和大辛见面，虽然不是同一单位的。一九四一年冬天，日寇纠集五万多人，对沂蒙山区发动了“铁壁合围”大扫荡，有一天，山东分局机关和费东县委，连同几个区委机关一起被日寇包围了，地点是在大青山。我带着十二个妇女干部向外突，山头上的敌人直向我们猛烈射击，最后只有我和李光、张英三人突出来。这次战斗结束后，我和一个区委书记带领区中队去打扫战场，才发现大辛牺牲了。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张茂萱整理）

一九七八年三月

赤胆忠心救伤员

——记红嫂祖秀莲

沂水县妇联代玉勤 高润兰

抗日战争时期，沂水县院东头一带桃棵子村有一位张大娘，名叫祖秀莲。她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掩护了身受重伤、生命垂危的我八路军侦察参谋郭伍士。

祖秀莲的机智勇敢，深厚的阶级感情，动人的事迹，一直在沂水县广大干部群众中传颂着，大家都尊称她“红嫂”。

一九四一年冬天，日寇出动五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当时八路军山纵司令部驻在西墙峪村，首长决定向老猫窝、甄家疃方面转移，便令郭伍士同志先去侦察一下情况。郭伍士同志在从西墙峪路过桃棵子村南边河北崖时，与日寇一个小队相遇，郭伍士同志为把敌人引走，使首长安全转移，便立即向西北方向奔跑。郭伍士身受数枪，带着一身伤跑到桃棵子村正南大顶子山后崖时，昏迷过去。敌人追上郭伍士，又对他打了两枪，朝腹部捅了两刺刀，又用刺刀挑着他的军上衣扬场而去。

郭伍士躺在血泊之中，如同死了一般，这时，南墙峪村张恒兰正在该山一条山沟里放羊，敌人走后，他跑过去，看了看，先给郭伍士身上盖上一些乱草，怕敌人再来发现他。

从早晨八点多钟到下午二三点钟郭伍士才醒过来。张恒兰看到郭伍士醒过来，就给他用裹腿包好腹部伤口，扶起他来，给他放羊鞭拄着，向不远的桃棵子村艰难地走去。张还告诉他，你淌了这么多血，可千万别喝凉水，一喝就完了。

郭伍士拄着放羊鞭杆，忍受着伤疼和干渴，向那山村走去，走不动，就跪下爬，爬不动，就躺在地上艰难地向前挪动，二三百步远的距离足足走了约两个小时，一路上溜下了斑斑血迹。他终于爬到一个冒着烟的小团瓢屋边，郭伍士想喊，喊不出来。正在这时，屋里走出一个妇女，名叫祖秀莲，当时五十岁，她一看见郭伍士这个血人，就惊呆了，马上辨认了一下，看到郭伍士穿着一双草鞋，下身穿着一件军裤头，裹腿包着伤口，就断定是八路军同志无疑了，于是，就把郭伍士扶进屋里的草铺上。这时，她和丈夫张志新躲难刚回家，丈夫正在烧水，祖秀莲急忙用温开水先给郭伍士洗擦伤口。这时候，郭伍士对伤疼是顾不过来了，只觉得心如火烧，口干得说不出话来，就一把抓住大娘的手，指指燎壶，祖秀莲明白了，急忙把开水兑得温和和的，端到铺前，用酒盅舀着水往郭伍士口里倒，但水又从嘴角淌了出来，祖秀莲着了急，就把郭伍士的头放在怀里，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是一棵子弹从他的口里穿进，从脖子一边出来，几个牙齿被打落在嘴里，和血块粘在一起，把口腔填满了。祖秀莲马上伸出手指插到郭的口里，向外抠，用了好大劲，才抠了出来，接着又往郭的嘴里一滴滴倒水，可他还是咽不下去，祖秀莲急得脸上的汗珠一滴滴往下落，她知道，郭伍士再咽不下水去，就有生命危险。西边的枪声一阵比一阵急，再耽搁

下去，说不定敌人就会来了，那就什么也完了。

祖秀莲急忙把指头伸进郭伍士的嘴里，从他的喉咙里抠出了几块凝结的血团，水才咽下去。这样一滴一滴，祖秀莲喂了四五碗水，郭伍士才慢慢有了点精神。他睁大了满含热泪的眼睛，看着坐在草铺旁给他第二次生命的祖秀莲，千言万语涌上了心头，不由脱口喊了一声：“娘！”大娘慈祥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亲切地说：“孩子，听大娘的话，好好养伤。”

祖秀莲就把仅有的一点绿豆做了一碗“绿豆旗子”饭，一口口给郭伍士喂上。这时，突然听见枪声由远而近，祖秀莲急忙扶着郭伍士，把他藏在她家两间西屋后的秫秸团里，并嘱咐他说：“同志，鬼子进村了，你千万不要动，有我在，就有你在。”她刚离开垛边，鬼子就进了她家，乱翻了一阵后，逮了几只鸡，就到东邻家住下了。祖秀莲心想，今晚一定得和游击小组联系，设法保护郭伍士同志。她家离游击小组负责人张恒军家很近，祖秀莲就冒着黑夜，偷偷地去找到了他们，报告了郭伍士的情况。张恒军认为把郭伍士藏在秫秸团里很不安全，要立即转移。于是由张恒军、张恒玉、张恒滨抬着郭伍士转移到村北头一间小屋里的草堆里，他三人躲在村头暗中保护郭伍士。祖秀莲一夜在村里探听敌人的动静，被住在东邻的鬼子抓去挑了八担水。这样熬了一昼夜。第二天敌人走了，祖秀莲又把郭伍士背到家里住了两天，她一面给郭伍士包伤口，一面说：“这一带是咱们的根据地，日寇一出来‘扫荡’就到这里抢掠，三天两头就有敌人来清山。敌人一来，我们就转移，你浑身有七处重伤，怎么转移

呢？”祖秀莲就和郭伍士商量，由她三口人在离她家不到二里路远的西山坡卧牛石下挖个洞子，里面铺上草苫子，叫郭伍士藏在里面，她一天三顿去送饭。郭伍士听了大娘的安排，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就说：“大娘为我操尽了心……”洞子挖好以后，在一个晚上，趁着夜深人静，祖秀莲和她的丈夫把郭伍士送到洞里。祖秀莲一天三次按时去送饭，每次送饭，祖秀莲装作到山拾柴拔草、挖野菜的样子，有时领着七岁的儿子装作走亲戚。她和郭伍士定了个暗号，在洞外敲打三下石头，就是她来了。这样郭伍士在洞里住了二十多天。

郭伍士从一九四一年古历九月十八日来到祖秀莲家，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祖秀莲天天给郭伍士做面粥或米粥吃，因为郭伍士的牙被打掉，不能嚼饭。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祖秀莲全家自己吃糠咽菜，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家中仅有的一点米面，几顿就给郭伍士吃完了，祖秀莲就东取西借，邻居和亲戚朋友都跑遍了，还是供给不上。祖秀莲又想了个办法，白黑的纺线，赚钱买粮，照顾郭伍士。她有时跑三十多里路到姚店子集卖线，换点米面。日寇从村里撤走后，她还跑到敌人做饭的地方，拣锅巴，把好的泡给郭伍士吃，就这样，使郭伍士渡过了生死关。

郭伍士藏在洞子里，不能动弹，整天躺着大小便，加上洞子里潮湿闷热，又因少医缺药，伤口感染了，祖秀莲就天天给郭伍士擦洗屎尿，伤口流出的脓血恶臭难闻，祖秀莲不嫌脏、不嫌臭，一次又一次地给他洗净包扎。

有一天中午，祖秀莲去给郭伍士送饭，把郭伍士扶出

洞来晒晒太阳，这时祖秀莲解开郭伍士肚子上那个最大的伤口一看，生了蛆，祖秀莲心疼得流了泪，立即把郭伍士扶回家，先洗换了包扎伤口的布子，就开始拿蛆，可是蛆太多，一时拿不完，她想起芸豆叶子能药咸菜缸里的蛆，可这时已经十月天了，哪有芸豆叶子，她便用院墙上的泥豆叶代替一下试试，她从墙上摘下一篮子半干的泥豆叶子，用温水泡开，一片片贴在郭伍士的腹部最大的伤口上，果然有效，经过多次这样治疗，把蛆全部药死了。祖秀莲又用打听来的一些土方给郭伍士治伤。她为此跑遍了山山岭岭采集药草，这样使郭伍士的伤势一天天好转起来，使一位人民子弟兵获得新生。

后来，桃棵子村党组织为了让郭伍士同志有个更好的治疗条件，听说夏蔚一带牛场子村有八路军的卫生所，就和祖秀莲商量，由党组织派四人抬着郭伍士送到那里。郭伍士离开祖秀莲时，满眼热泪握着大娘的手，感激她的无微不至地关怀，把他从死亡中救了出来。

郭伍士转移后，祖秀莲一直惦念着这位八路军战士。郭士是在沂南县找到了我们医院的，养好伤就重返了部队。一九四七年他复员了。他本是山西省辉同县人，好多和郭伍士一起复员的同志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郭伍士决定回到他的第二家乡——沂蒙山区。他先在沂南住了几年，一九五八年他领着爱人和两个孩子来到了沂水县桃棵子村，找到了张大娘，他对张大娘说：“大娘，你是我再生的亲娘，收下我这个儿子吧！”祖秀莲把郭伍士当亲儿子看待，从此这不同姓的母子就生活在一起了。

祖秀莲在战争年代里，经常抢救、掩护伤病员，还为八路军抗大学校掩藏文件，背包、行李等，凡由她掩护的东西从没损失。祖秀莲从不居功，有了困难不向政府伸手，处处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着想。她八十高龄时，仍叫儿子用小车推着到水库工地劳动。一九七六年经党组织批准加入共产党。

祖秀莲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因年龄大，身患重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模范共产党员妇救会长陈忠芳

沂水县妇联代玉勤 刘春联

陈忠芳大娘，是沂水县王庄公社云头峪村人，今年七十七岁。一九三八年入党。同年任该村第一任妇救会长。在抗日战争中，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她的令人可歌可颂的事迹传遍沂蒙山区。

舍生忘死掩护《大众日报》社

一九三八年秋天，《大众日报》社搬进云头峪村。该村群山环绕，山峰陡峭，深沟纵横，群众居住比较分散，是个由四个小自然村组成的山村。报社开始安排在顶庄王德永家中。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一九三九年元旦《大众日报》创刊，第一张党报满载着我军胜利的喜讯，从这深山谷里飞向四方。可是后来，该村周围十几里路外，住着国民党五十一军顽固派，还有地主武装，沂水城的日寇还不断来“扫荡”。陈忠芳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发动全村妇女，掩护报社的安全。当时参加妇救会的姐妹们都抱着一个决心，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使报社安全出版，不误发行。她还发动妇女照顾好报社工作人员的食宿问题。

一九三九年六月，日寇对沂蒙山区进行了第一次大“扫荡”，环境开始恶化，《大众日报》社也随着山东分局转

移。报社转移时留下石印和油印机，转移到该村南鸡宝山上一个叫江泉旺的深山谷里，这里三面是陡壁，头顶一线天，只住着几户人家，是最僻静的地方。石印机和油印机就安在王清亮的一间小屋里。陈忠芳两间西屋是装订车间，两间东屋住着报社的同志，最多时住着三十多人。陈忠芳为报社站岗、放哨，安排同志们的生活。当时日寇不断清山，国民党顽固派也装扮我们的人，来探听报社情况，陈忠芳每次都很机智地打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一九四零年三月十四日下午，国民党顽固派来了，报社的三名同志还没有转移出去。报社保管员李善梅同志和李志臣同志正发高烧病倒在床上，还有一个通讯员送报还没回来。这时，李善梅对陈忠芳说：“大嫂，我们要掉进虎口了。”陈忠芳说：“同志们放心，有我一家就保证同志们的安全。”陈忠芳立即拿出一个半旧夹袄叫李善梅同志穿上，叫他上山旺里耩地去了；又给李志臣盖上一床破被子，自己到门口去应付顽军。顽军来到陈忠芳家，指着陈忠芳说，你家是八路军的联络站，还说陈忠芳的丈夫张进玉是八路连长。正在这时报社通讯员张之沛和邻居张振荣之妻走过来，张之沛用扁担背着一付托子和半麻袋东西，顽军指着张之沛说：“他是通讯员吧？”陈忠芳说：“他是个喇叭，是去卖青菜的。”张振荣之妻也帮着说：“他成宗卖还能行，要是零卖就折钱。”敌人细看了看张之沛土里土气的样子，消除了怀疑，接着上了另一户。张之沛进了陈忠芳的院子，把东西放在鸡栏子上，躲避起来。陈忠芳解开一看，麻袋里装着还没做起来的军衣和裹腿，他立即把那些东西拿到屋夹

巴道里埋藏起来。

当天晚上，陈忠芳做了饭，报社的三位同志饭后向郭庄转移，陈忠芳叫丈夫张进玉领着他们转山顶，赤着脚，走小路，偷偷地绕过顽军的一道道岗哨，到了郭庄，找到报社。报社印刷所长于以川握着张进玉的手激动地说，同志们可来了！又对张进玉说，你怎么回去呢？张进玉说，我这不是早准备好了吗？谁家搭理我这个木匠。于所长就给了他一块大饼，叫他一路小心，赶紧回去，免得家里放心不下。张进玉在返回的路上遇见顽军岗哨，全身都被翻了，只因布腰带上补了一点黄布，就不叫张进玉走了，最后把他打了四十多鞋底才放了他。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五个伪军闯进陈忠芳家，翻箱倒柜，没翻出什么可疑的东西。伪军又用软办法，其中一个伪军是崔家峪的，他说：“大嫂子，我家是崔家峪，咱赶一个集，八路军和报社不会来了，你交出一只袜子或一条裹腿就给你五十元。”陈忠芳说：“你不是翻了好几遍了吗？俺要是有什么早就拿出来了。”敌人不死心，第二天敌人又闯进陈忠芳的家，还抓了本村的牛润洪当向导。敌人翻来翻去，发现梁头上一个蜡烛头和一把布伞，便恶狠狠地用枪指着陈忠芳说：“这就是报社用的蜡烛头，这伞是八路军的！”陈忠芳想这蜡烛头是报社写石印的老林同志用的，怎么没收拾起来，于是便机灵地指着身边自己的十几岁的大女儿说：“这个蜡烛头是俺这个孩子在村里玩拾来的。”敌人围着孩子问：“这蜡烛头是拾来的？”小孩点了点头。陈忠芳想，只要这孩子点点头就行了，果然敌人不追究了。但又

拿起伞来追问哪里的，牛润洪抢着说：“这是她娘家赔嫁的，她娘家是怪有的人家。”敌人见捞不到什么，便没好气地把两麻袋糠和草垛里用刺刀翻了翻就走了。

一九四零年夏天，国民党五十一军顽固派十几个人闯进了陈忠芳家，翻了几遍后，又逼着陈忠芳去找报社埋的东西。三个孩子抱着陈忠芳的腿直哭，陈忠芳机智地假装打孩子，就把三个孩子扯到堂屋里，关上门，陈忠芳大喊着：“报社的东西我不知道埋在哪里，死了我也不出去了！”孩子在屋里哭，顽军把堂屋点上火，想把她引出来，陈忠芳死也不出来。周围几个群众都来说情，才把火熄灭了。顽军见用这个法子也没逼出什么东西，就走了。

一九四一年秋天，我乡公所的干部王德宽、刘元培、刘元修、张之松四人按上级命令，来到陈忠芳家取藏的铅字，不料突然来了七个顽军，这时陈忠芳的丈夫在前洼里锄地，便有意大声喊：“老总上哪的？”顽军说：“清查户口的。”陈忠芳听到丈夫的喊声，立即通知同志们越墙逃走。刘元修未来得及越墙，只好藏进屋夹巴道里。机智的陈忠芳立即摆下高粱穗子沉着地在院子里刮，顽军走到门口，上里边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就走了。

陈忠芳还掩护过报社同志的家属。其中有两个小女孩，大的十四岁，小的十岁，都叫陈忠芳妈妈。报社负责人陈希三交代她白天领着两个孩子藏在山沟里。有一天晚上，陈忠芳听到枪声越来越近，这时她们还没回家，她便立即拔了一堆草把两个孩子盖好，结果进来的都是自己人，陈忠芳才放了心。

陈忠芳和她的丈夫，在报社转移时，不知熬了几个夜晚，护送同志，埋藏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书籍和小机器、铅字（大机器已经转移龙王峪）、还有肥皂和一千斤小米。为了掩藏这些东西，陈忠芳和她丈夫在下沟里整夜刨窟子，不知他们流了多少汗。

掩护区乡公所医院兵工厂

一九四零年秋天，我区公所区长刘成元，领来一位小刘同志，因身体不好，交代陈忠芳夫妇照顾他的生活。陈忠芳说：“请放心吧，小刘是俺家的人了，俺一定保证他的安全。”有一天傍黑，突然来了个陌生人闯进陈忠芳家，自称八路军战士，与部队失掉联络，又饿又渴，要在陈忠芳家住宿。陈忠芳见这个陌生人突然到来，就打了个愣。坐在桌子边吃饭的小刘也一时来不及躲避。这时陈忠芳设法把他打发走吧，又怕他真是自己的同志；留下他吧，又怕他是坏人。正在这时，那人就问小刘是干什么的，并同志长、同志短地想摸小刘的底细，陈忠芳就马上接过去说：“他是俺娘家兄弟，是来帮俺刨地瓜的。”那人说明天我和您刨。陈忠芳想，如果这人是掉队的战士，为什么不快去找部队，却要和我刨地瓜呢？于是说，俺刨完了。为了弄清那人的身份，陈忠芳借拿铲子刷锅的机会靠近那人，偷偷地捻了一下他的衣裳，原来是洋细布做的，她心里一惊，八路军没有一个穿细布衣服的；她又借泼水的机会，到另一间屋里，假装找火柴把丈夫叫出来，把察觉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说咱要保护小刘的安全。于是，夫妻二人想尽一切办法赶走陌生人，可他

总是赖着不走，一定要住一宿。陈忠芳急中生智，就让张进玉、小刘和那人都睡在东屋里，那人在炕上，丈夫搂着小刘在门口地上打了一个草铺，并告诉小刘和丈夫，一定注意，不要睡着了，防止意外。在他们睡下以后，陈忠芳提着一把大镢头避在堂屋门外听动静，她准备一旦发生情况就全家和敌人搏斗。陈忠芳看到屋里熄了灯，又听那人就开始先拉家常，后又探听报社转移的情况。张进玉说：“俺这庄户人家，村里都说俺是老封建、老顽固，今晚俺不看你是外地人怪可怜的，说什么也不留宿。干一天活很累，俺胃口也不好受，睡吧。”

屋里没了声音，陈忠芳仍不放心，一夜没合眼，好歹熬到鸡叫。陈忠芳叫开门对那人说，天快亮了，你穿着这身衣服路上不好走，快起来喝口水，趁天不亮走吧。那人起来看了看外边，打了个舒伸，走了。那人走后，陈忠芳就叫小刘烧火，做点饭吃了快躲一躲。饭还没做熟，发现那人领着国民党便衣队从山上下来了。陈忠芳一家立即上了里旺，把小刘送回他家龙王峪村，使敌人扑了空。事后才知道国民党顽军五、六个人扮成八路军当晚都住在云头峪村侦察情况，真好险啊！

一九四一年九月，我乡公所搬到陈忠芳家住了一段时间。在转移时，乡公所刘成义交代陈忠芳夫妇保存两支枪，七天后来人取走了。事隔不久，刘成义叛变投敌，沂蒙队的王兴新和本村伪庄长派人把张进玉抓到上庄里，又把他带到水源坪和保全庄，吊打非刑。更残忍的是，用绳子拴着张进玉的两个大母指划在树上三四次，把他折磨得昏死过去了；

还用鞭子抽，皮鞋踢，不知死了几个死。幸亏党组织和陈忠芳设法营救，才得以生还。

一九四二年夏天，八路军医院从云头峪村转移时，李玉余院长身体不好，组织上交代陈忠芳一定照顾好，还要保证他的安全。陈忠芳向组织表示：“豁上自己的生命也要掩护好老李，请同志们放心。”陈忠芳除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老李外，还上山采草药为他治病。有一次，日寇“扫荡”，陈忠芳把老李和三个孩子一起藏在一个山洞里，垒好洞口后，陈忠芳踏着草地刚走出不远，鬼子汉奸三十多人正好走到泉子南崖这个洞口跟前，没发现什么就走了。老李在陈忠芳家二十多天，痊愈后归队。

一九四四年云头峪村又搬来了一个纺织厂，是山东军区军工厂分厂。一九四六年六月纺织厂转移时，将白布、手巾、丝绸和没做完的军衣，埋了一大窖子，窖子周围由乡公安员牛九奎带领五人埋上了九个地雷。当天晚上，全部物资被以牛九奎为首的五人偷走。事后她积极与全村党员帮助组织破案，及时查出了盗窃国家资财的五个坏人。

陈忠芳不仅掩护报社，医院和兵工厂的同志，我区乡公所和党员的同志也经常住地她家里。她的家也是秘密联络站，她经常传送情报。报社与她规定的联络暗号是，在她院内房屋夹道里竖着一棵棒，敌人来了就系上手巾，没有系就是平安无事。区乡公所和党员联络点是在离陈忠芳家东边不远的一盘碾，碾边有个簸粮食的池子，情报就压在这池子的石头底下，当时西墙峪、石旺峪等村的老农救会长秘密送来情报，陈忠芳夫妇再及时传递，从未发生失误。

陈忠芳从当妇救会长那天起，就把全村妇女团结在党的周围，发动妇女推米磨面缝军衣，护理伤病员，动员参军，并组织妇女学政治、学文化，为争取妇女彻底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本村女青年王桂兰当时十五岁，其父在外参加革命，母亲病故，寄居在大爷家里，老人只许她在家做活，不准她出门参加社会活动。陈忠芳登门多次做通老人的思想工作，让王桂兰走出家门，参加妇女组织活动。老人同意了。王桂兰很高兴，进步很快，不久就被选为识字班队长。

陈忠芳在战争年代里，含辛茹苦，英勇奋斗，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从不居功。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四化建设中，人老心不老，常说，我有一口气也要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她在移风易俗，计划生育等工作中，积极教育子女起带头作用。村里每次召开党员会，不论白天晚上，她总是拄着拐杖走将近二里山路去参加会议。多次出席县、社两级党委召开的模范共产党员会议，受到表扬和奖励。陈忠芳的革命事迹，为全县广大妇女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八日

抗属赵传春

沂水县妇联代玉勤

赵传春大娘，是今王庄乡柳树头村人。她的丈夫岳洪春，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沂水四区第一任民主政府区长。赵传春在丈夫的影响下，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思想进步很快，于一九三九年入党。由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成长为革命战士。在抗日战争中，她在掩护我八路军伤病员、站岗放哨、从事秘密交通工作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贡献。

站岗放哨 机智斗敌

抗战时期，赵传春的家是我革命同志从事秘密活动的联络点，上级和本地的许多同志常来常往，有的常住，她每天忙着做饭招待。同志们开会时，她就负责站岗放哨，掩护同志们的安全。有的同志病了，她就想方设法给以治疗。有一次，四区区委书记李松同志患重感冒，卧床不起，赵传春用炒谷子、红糖、生姜给他发汗，使他很快好了。

一九三九年夏天，住在赵传春家的甄磊、赵玉芹二同志介绍她入党。就在她入党的这一年，四区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随后各村都建立了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当时的区委委员武杰同志在柳树头召开妇女大会，赵传春被选为村妇救会长，从此带领全村妇女投入抗日工作。在

日寇大“扫荡”中，她带领全村妇女和男同志一起挖了几十个山洞，用以掩护我革命干部和伤病员。有一次，敌人来了，赵传春和伤病员、干部、群众十几人藏在岳京源的洞子里，突然赵传春的大儿子（当时才四岁）哭了起来，这时敌人已经进村了，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刻，赵传春为了同志和乡亲们安全，就用棉被使劲的捂着孩子，敌人走后，揭开棉被，孩子已被捂得停止了呼吸，大家一看都急了，用人工呼吸才把孩子救过来。

不久敌、伪、顽合流，包围蚕食我抗日根据地，王庄一带形势紧张。游击小组中有人背叛投敌了。四区朱位村武或生成立起汉奸武装沂蒙队，到处张贴告示，扬言活捉岳洪春，杀绝他的全家，谁能捉到赏给大洋2000元。

当时柳树头村党支部的代号是“006”。支部根据形势的变化，召开了会议，研究保护赵传春及其三个孩子的安全措施，党支部成员牛永庆同志主动提出到他家躲避。党支部决定后，立即将赵传春及三个孩子藏到牛永庆家的屋夹巴道里。刚刚藏好，敌人就进村了，到处搜查赵传春的下落。有一天，赵传春两岁的儿子拉肚子，她到河崖洗衣服，一个汉奸走到她跟前蹲下来问：“大嫂子，你知道岳洪春的老婆藏在谁家？听说她还没出村，你要是和我说了，我给你一万元。”说着，那个汉奸便作掏钱的样子。赵传春说：“俺婆婆家法很严，整天不叫出门，谁家俺也不知道。你快走吧，叫婆婆知道不愿意。俺孩子有病，俺得快走。”赵传春衣服没扭就走了。路上遇见岳洪姜，他说：“您婶子快走吧。”赵传春领会了他的意思，果然，当晚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她

和三个孩子安全转移了。

冒险送情报 掩护伤病员

一九三九年秋，赵传春领着三个孩子来到娘家赵家庄子，她父母早已去世，只好到她四大爷家。一进门她的四大娘就看见她来了，急忙摆了摆手说：“老刘家来了。”接着把赵传春和孩子领到西屋里。原来堂屋里有两个汉奸正在审问赵传春的四大爷，她听得很清楚。汉奸问：“赵传春来过吗？”回答没有。汉奸说：“俺沂蒙队兵分两路，一路专门寻找赵传春和她的崽子，抓住她们就点天灯。一路现在已把岳洪春包围在龙湾村，明天十二点钟左右集中三百人兵力活捉岳洪春，消灭区公所和区中队。”汉奸走后，赵传春隐蔽在赵家庄子东山红沙坡一个牛棚里，晚上赵传春和她四大爷研究怎么叫区公所、区中队于明天十二点前脱险。赵传春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了革命，要牺牲自己的一切，一定要去送信，使同志们立即转移。于是，她叫四大爷写了个纸条卷了卷扎在头发里，她恐怕去说不明白；又去邻居家借来了一对新绣的枕头，还有几个牛肉包子，一块油炸白鳞鱼，用竹提篮挎着，扮成送喜礼的，鸡不叫就奔上了小山路。从赵家庄子上龙湾村转山路需走十四华里，走到桑树峪，快到龙湾村了，猛然，一个人从柿子树上跳下来，用枪指着她说：“干什么的？”赵传春说：“俺姑家是桑树峪村，俺表妹出嫁，我去送对枕头。”接着上来四、五个伪军，把赵传春全身都翻了，还叫她解开绿带子，没发现什么；伪军又把提篮也翻了几遍，也没翻出可疑的东西，但还是不叫她

走。有一个汉奸威胁她，把刺刀放在赵传春的脖子上说：“你不是走亲戚的吧？”赵传春沉着地说：“老总，俺真是走姑家给表妹妹添箱的，俺别没的送，只做了一对枕头表表心意，您就行行好，叫俺过去吧”。又一个汉奸盘问：“你婆家是哪？”赵传春说：“俺婆家是赵家庄子姓刘的。”对汉奸的盘问，赵传春都一一作了回答。敌人没看出问题，就没好气地喊了声：“快去快回，去！”赵传春扎了扎带子提着篮子就走了。走出不远，又遇到敌人的第二道岗哨，赵传春一看，草棵里还架着两挺机枪。敌人围上来对她盘问，赵传春还说她是去添箱的。敌人又把赵传春和她提的篮子翻了一遍，放她过去了。到了靠近龙湾村的第三道岗哨，敌人盘查得更紧了，十几个敌人围上来先翻了一遍，又开始盘问。这时，有个人挑着煎饼上村里走，敌人发现后，都跑去追赶，赵传春趁机挎着提篮转路跑进了村。这时才九点多钟。她跑进龙湾村，第一个遇见了区中队长张之廷，赵传春立即解开头发拿出了信，张之廷看后马上和岳洪春研究了对策，立即带领同志们安全突围了。

一九四〇年春天，党组织为保护赵传春母子，便由柳树头村牛永庆、岳京太二同志（当时他们二人都是区委的干部）借了头驴，把赵传春和孩子送到泰石公路南朱家坪村张林山老党员家，住了一年半的时间。赵传春在公路南住过十几个村庄、坚持在王庄一带的同志和公路南区公所的联系都是由柳树头村岳洪礼来往与赵传春传递情报。

一九四一年九月份，日寇疯狂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赵传春就在这一年生了第三个儿子叫新民。敌人“扫

荡”开始，她带着四个孩子，大的才十一岁，由赵玉传帮她背着孩子，带着随身用的东西，黑夜里从朱家坪村走到大小干粮峪村时，已是晚间十点多了，他们想在这里暂时休息一下，突然，村里的狗狂叫起来，她们怕有危险，只好继续走。走到圣山子坪村外，越过山口到达武家坊村时，发现敌人正在村里烧杀抢掠，赵传春母子和赵玉传就隐蔽在上山的一块大石头后面。正在这时，一个八路军战士背着行李包走到山口高处，被敌人发现，一阵枪声，那个同志倒下了，赵传春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爬到那个同志跟前，发现他的右腿负了伤，血流不止，夜晚又无法找止血的药草，赵传春就赶紧抓了一把土敷在伤口上，又撕下自己的上衣大襟，立即包扎起来，又把背东西的棍子给那个同志拄着，一起转了几里路到了武家坊村武学廷家。武学廷是一个与敌人斗争很有经验的老共产党员。第二天，日本鬼子来这里“扫荡”，武学廷安排赵传春和伤员一起到一个山洞里隐蔽。赵传春抱着孩子，扶着那个伤员，艰难地往前走，走到离洞子还有半里路的时候，那伤员走不动了，这时，敌人快进村了，情况十分紧急，赵传春看见路两边是樟楞棵子，长得又密又深，她连忙抱着三个月的孩子钻到里边，把孩子用碎石头盖起来，接着出来扶起那个伤员进了洞子。敌人在村里烧杀抢掠了一阵子，又到山里清剿了将近半天，就撤退了。敌人走后，武学廷到洞口送信，他们出洞后，立即去找小孩，一看孩子还在，只是爬了一身蚂蚁，鼻子眼里都是，乡亲们和伤员一看孩子这样，都掉了眼泪。一个同志连忙抱起孩子，把蚂蚁拨弄掉，抱回村去。

回村后，赵传春和那个伤员仍然住在武学廷家。为使伤员早日恢复健康，他们采用土方给他治伤，还熬鸡汤给那伤员喝，保养身体。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那位同志很快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

· 赵传春自入党以来，忠于党的革命事业，在战争年代里，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赵传春同志于一九七五年六月病故，享年七十三岁。

一九八四年六月

抗日战争末期

在沂中县工作的一段回忆

刘夏峰*

我是莱芜县刘丰邱村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古历十二月十九日，我带领六十来人从莱芜到了徂徕山。次年春，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派我到鲁东南工作，他说邵德孚在莒、沂组建了六大队，并组建中心县委，要我去沂水任县委书记。当时，我在行军中把脚磨伤了，正在医疗所治疗。治好之后，准备去沂水时，景晓村又对我说，沂水已划为省委直属县，刘建中已去任县委书记，你跟我到日照县吧。我就跟他到日照去了。到一九四四年春，鲁中区党委又把我调沂中县（这时沂水改为沂中）任县委书记，并告诉我，先到沂中金泉区找邵德孚接头。我去见了邵德孚，他向我谈了沂中的情况。次日，前任书记王翰卿到金泉同我见了面，他把我接到虎崖村，向我交代了工作。

我接受工作不久，黄山铺敌伪据点就被我军拔掉，准备解放沂城。这时县委迁到城西岳庄。

在解放沂城的时候，县委干部大部分参与了支前工作。

*刘夏峰，山东省莱芜县刘丰邱村人，曾任上海气象局局长。现离休。

我是随着攻城部队进入沂水城的。城里的伪军全部被我歼灭，活捉了伪县长牛先元。日寇一部分逃窜，一部分藏在地洞里，最后全部被我军俘虏。有一个鬼子头目带着一只洋狗只身逃到扈山区，藏在一个地窖里，被当地群众发现，马上报告了公安局，公安局立即派武装将那鬼子逮捕了。牛先元是民族败类，罪大恶极，在沂城解放不久，召开了公审大会，将他处决了。公审大会是我主持的，并由我宣布的牛先元的罪状。

至此，沂中境内的日伪军全部扫清。这时，县委的主要工作是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动员参军。在生产方面，当时是由县委民运部具体负责。机关干部每周两次到村里参加劳动。由于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这年全县取得了很好的收成。为了表彰先进，鼓励生产，县委和县政府于这年秋后在岳庄召开了全县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一百余人。会上奖励了许多先进单位和个人，奖品有耕牛、毛驴、犁耙、纺线车等。一九四五年秋后又召开了一次，是在东河北村召开的。

在动参方面，我记得搞了两三批。头一批是一九四四年冬进行的，动员了二千五百多名新战士，受到上级的表扬。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又动员了一批，大约三千余人，是全省第一名。在这次动参中，岳庄一个村就出了一个连。翟作标所在的东里区，参军工作也很好。《鲁中大众》曾载文表扬了沂中的动参工作。当时全县是二十余万人口，两批参军六七千人，数字的确不小。那时参军年龄及其他方面的条件不是太严，四十岁左右的壮年也可以入伍，地富子

弟也能参加。在这次动员参军的同时，大批干部调往东北，每县大约抽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不是每县一套，是由鲁中区党委统一编制成套的。

由于大量参军和大批干部调走，全县各级组织的党员骨干被抽空了，必须进行组织发展，记得当时发展数量是很大的，女党员在各级组织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了培养提高新干部，县委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由黄子中同志负责，每年办两三期，每期百人左右。每期结业前，编成工作组，分赴基层，进行实际锻炼。

至一九四五年十月间，我调地委组织部当部长，刘木易同志到沂中县接替了我的工作。

刘木易和我是同村。他原来姓杨，名景和，又曾改为杨明。一九三三年四月入党。他出生于贫苦家庭，从小务农。一九三三年秋后在本村任党支部书记。后在本区区委负责。一九三六年六月我被捕出狱后，着手整理党的组织，他任本区区委书记。一九三七年一月，省委派人要我组织莱芜县委。他是县委成员之一。“七七”事变后，和我一起拉抗日武装，后来我带领人马上了莲花山，他留守地方。一九三九年，他任莱芜县委组织部长，就是这时改名刘木易的。一九四一年，调任新阜县委组织部长，后来大概又任县委副书记。一九四三年，由太宁县划出一个地区，他调任该区区委书记。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到沂中县任县委书记。一九四八年南下，任浙江嘉兴地委组织部长。一年后，调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一九五一年秋季以后，任浙江省煤炭厅厅长。一九七七年病故，享年七十二岁。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整理）

一九七九年八月

鲁中军区 发表沂城战役详报

（新华社山东分社鲁中二十日电）鲁中军区司令部发表公报称：正当正面战场形势危急，衡阳失守，适值秋收在即之际，敌五十九师团主力对我鲁中之鲁山新蒙开始分区轮番扫荡，我为更有力地配合正面战争，牵制敌人，粉碎敌人扫荡，更进一步改善与巩固我根据地，作为将来配合盟军反攻的基地，我鲁中军区所属部队，继春季讨吴战役、夏季保卫麦收战役大捷之后，现又组织夺取沂水城及周围据点之秋季战役。按沂城系于1939年陷落敌手，是鲁南山区重要城市之一，是青沂、沂临、沂蒙、沂博、莒沂等五公路的连结点，并有飞机场，城市工事设备极其严密坚固，每逢敌对鲁中大小扫荡，其高级指挥机关及空军皆设于此。沂城内有伪牛先元部之八个中队守备，南关为敌军守备，据点工事坚固，常住敌一个中队。在城四周，西有黄山铺、匡庄、龙山，南有斜午，西北有武家洼，东北有凤凰头，东南有满堂坡、四十里铺等外围据点。我军主力及地方武装民兵一部，于十五日晚，发起以沂城为中心之战役行动，以主力直扑沂城，另主力一部及地方武装民兵，分别对外围据点进攻。各作战部队统于二十二时开始向敌人猛攻，我×团主力，向城西南攻击，一路直扑城南门外敌据点东南大碉堡，作为战役

总攻击之信号。不及一时许，我以短距离的飞行爆炸越过外壕铁丝网，将碉堡如青天霹雳炸去一半，我奋勇队神迅冲上，用刺刀将敌人消灭，随即占领该碉堡，继而，突入围内，向西南角大碉堡进攻。不及二十分钟，又被炸，为我占领后，继向西北角大碉堡进攻。在我火力掩护下，神勇的爆炸员，以技巧的动作，将这个圆形坚固碉堡炸毁，突击队当即与敌展开血战，进行肉搏。我两个战士奋不顾身，将五敌兵刺死两个，击退三个。此时守围之敌，被迫全部退守东北两个碉堡。我继续向此两碉堡进攻，敌强大火力阻我前进，大量使用窒息性毒气，我虽事先以湿布蒜瓣等极简单的防毒法，但因毒质过重，乃大部中毒。此时天已拂晓，继续围困敌人。当晚该团主力一部从城×南迅速占领城墙碉堡，遂即投入市街战。我按预定计划发展，拂晓前已夺取城内东南角两个大碉堡，并控制东关街南段，与由东门进攻部队打通联系，毙伤伪百余，生俘五六十人。另×团全部由东门及北门攻击，不及三十分钟将东门及北门全部占领后，按预定计划，向东关大街、南北大街及伪县府大街、东西大街之丁字路口发展，并肃清东关大街以东之敌，占领城门部队向西南伪县府小围发展，将敌大部驱逐，一部消灭。至拂晓前完全完成预定作战计划，已与东西两门进攻部队会合。另×团部队一部，由西门攻击，五分钟内奋勇队即翻越城墙突入城内，不及两小时，将预定作战地区之敌全部肃清，并与东门部队会合。我从四门进攻部队，截至拂晓已占领城内四分之三，将伪驱逐至西南角一小围子，及两个大碉堡死守待援。我即不惜疲劳继续进攻，配合政治攻势，该伪二百余，机枪四挺，

于当日下午二时全部投降。牛先元带三十余突围，全部就擒。沂城遂告全部克复。我立即进行破除工事，一部继续围攻南关敌据点。我攻击外围据点之部队作战目标，分别发起攻击匡庄之伪，午夜被我全部消灭。我攻黄山铺部队，于十六日一时攻占大队部，占领西南两碉堡。敌退守东北、西北两碉堡，我继续攻击。伪反复五次施放毒气，我围攻部队，因无防毒面具，而大部中毒，至拂晓未能解决战斗。至十六日午，经政治攻势全部缴械。武家洼、凤凰头两伪据点，在我沂城胜利影响下，即无条件投降。惊恐之下，斜午之伪闻风而逃。

莒县敌乘汽车八辆，因沂城危急仓惶增援，被我预定打援部队英勇击退，敌遗尸六具，狼狈逃回原地。我乘胜又攻克满堂坡，围攻四十里铺。当日下午，敌机×架来援无效，向我扫射一阵即飞走。十六日晚，我某团一部，对死守南关两碉堡敌三十余、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一挺、手炮两门，继续展开猛攻。敌在我部队接近时，皆以猛烈炮火阻我前进。我于午前，采取佯攻战法，消耗敌人。午夜后，我连续组织×次强攻。有一次，我五个爆炸员×个负伤，一个阵亡。我第二组爆炸员，以高度忘我牺牲精神，前仆后继，于拂晓微明之际，以极其迅速技巧的动作，终将敌坚固的最后碉堡炸毁一半，三十余敌人全部歼灭。我奋勇队遂冲入围内，消灭零散之敌。至十七日六时，南关据点已全部攻克。敌六十人无一漏网，全部歼灭，胜利结束沂城战役。沦陷六年来的沂城，又重飘国旗。当日下午，敌机两架向城内外投弹六枚，已无济于事。经我一昼两夜激战，获得光辉战绩。计：攻克沂城及外围黄山铺、匡庄、武家洼、凤凰头、满堂坡、斜午、

四十里铺等据点，及七个独立碉堡、牛先元所属十五个中队，除斜午两个中队逃走外，其余全部就歼。解放地区三千五百平方里，三百五十余村庄。毙敌玉井小队队长、套叶田一顾问，小野寺曹长，栽生曹长、蛮木伍长以下四十名，打援毙伤敌小队队长以下十四名，共五十五名。生俘敌兵二十名，毙伤伪二一九名，俘剿共司令兼伪县长牛先元、前任伪县长张鹤民、伪县府区公所全体职员，及其军官以下共二十三名。缴获八二迫击炮一门、九二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一挺、小炮十一门、长枪八九一枝、短枪一三〇枝，步枪弹二四三七八发、短枪弹七六八发、迫击炮弹十六个、钢炮弹六个、手榴弹七四〇个、瓦斯弹一三一个、信号弹三十个、烟幕弹十个、指挥刀十把、刺刀三十把、洋铲二十把、钢盔二十顶、战马十七匹、军犬六只、电台一部、电话机二十一架、留声机六架、收音机一架、照像机四架、望远镜四付、自行车十二辆、水笔十二支、表二十八只、伪钞四十余万元、白银七十斤、粮食七十多万斤、羊毛百余包、花生米万余包（每包240斤）、油七万斤、各种食品罐头六四七箱、茶叶七大箱、饼干××箱、洋面七十二包，以及敌伪文件一部、汽车两辆、汽油一部、磨电机一部。其他军用品无算。并将沂城围墙碉堡等工事全部拆毁。整个战役中，我英勇负伤者计有军区司令部一科长徐黎屏、二科副科长于一新、及连级干部六名、排级干部九名、班级干部二十名等以下共二七×名，轻伤占半数。光荣牺牲营长刘振江、排级干部以下四十三名。我消耗步枪弹一三九三一发、短枪弹四十八发、手榴弹二八六七颗，手雷三十余个、迫击炮弹五发、小炮弹一发，地雷三十六个。

（选自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大众日报》）

忆葛庄伏击战

冯国恩*

一九四四年九月，我鲁中军区组织了葛庄伏击战。参加这次战斗的部队有鲁中军区主力部队一团、二团、四团、十二团，还有一些独立营、县大队、区中队等地方武装。这是一次伏击战，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军以极少的牺牲，取得了大量歼灭敌人的胜利。这是我沂蒙抗日战争史上，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的一次成功的战例。它对巩固发展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扩大我军的影响，壮大我军的力量，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大反攻，具有重要意义。此役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了，但想起当年气壮山河的战斗场面，仍然历历在目。

一九四四年八月底，我鲁中军区十二团，在鲁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孙继先同志指挥下，顺利完成郟郟战役歼敌任务后，全团都集中在沂北马站地区休整。那天拂晓，我们都集中在团部大操场里会操，突然团长叶升同志传达了分区首长的紧急命令，要全团立即停止操练，回到原来驻地，做好行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于是，各营按照团首长的指示，把自己的连队马上带回

*冯国恩，山东省临朐县石万人，曾在烟台警备区工作，现已离休。

自己的驻地。吃过早饭，各班排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擦洗手中武器，检点各自携带的弹药数量，整理行装，修补鞋袜，打好裹腿，捆起铺草，上好门板，清扫卫生，归还借用的群众的日用家具，各连检查群众纪律。司务长给全连同志发了够一日吃的干粮。一切准备好了，大家静静地坐在各自的住房里等待着上级的命令。

太阳偏西，我们就提前开过晚饭。这顿晚餐很好，主食是沂水大锅饼和小米绿豆稀饭，菜是猪肉炒豆角，大家吃得很来劲，很快就把肚子填饱了。这时太阳也慢慢压西山了。各个连队开始行动。以往每次队伍集合都是吹号，这次是通信员下的通知。到夜幕降临，全团人马都集合在大操场里，刘光远副团长讲了这次行军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他强调各级指挥员要走在自己行军的位置上，以便随时应付突然发生的情况；要求行军速度快，不要掉队，不准吸烟，要肃静，要顺着指定的山沟或小路走，遇村要绕道通过，不惊动群众。骡马和辐重，体弱和有病的同志都在团部驻地留守。副团长讲话完毕，部队出发了。每次执行任务都是向北或东北方向走，这次却是朝西南方向而去。大家都知道西南方向是老根据地，是上级党政军机关所在地，我们不是军区的主力，去干什么，大家都不明白。我们自一九四二年秋，从沂北卞山一带向北推进到沂山地区，此后就以沂山为中心活动。这连小孩子都知道：“十二团不简单，围着沂山打转转。沂山左，沂山右，沂山后，沂山前，天天那里打敌顽”。现在突然叫我团向老根据地开进，真叫大家丈二高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营是在沂北发展起来的，当地人多，地理熟，因此

我们三营走前卫，后面是团部和一、二营。全团拉开一个长蛇似的队形，衔枚疾走。深夜了，天上布满了鱼鳞片似的云层，闪烁的星，橙黄的月亮时出时没。山沟是那样的寂静，鸡不叫，狗不咬，只能听到那整齐而有力的急行军的声音。

天快亮了，我们也快到了宿营地。当队伍走到一条两山夹着的石河边的时候，突然，团首长传下停止前进的命令，要所有队伍拉进河边平柳树林里隐蔽休息；还命令部队不要进村，各单位可以指定司务长带几个炊事员到就近村里烧水做饭。

部队进到树林里，各级指挥员按上级指定位置，找一块平坦而干燥的地方放下背包，抱枪而睡，暂作休息。直到次日太阳从东方升起老高了，同志们还在酣睡。这时，我连炊事班长周成文同志带领一群老乡，挑着热饭开水，来到树林，喊起同志们吃饭。大家从梦中醒来，睁眼向四周一看，啊！这不是大诸葛村东的大石河吗！想不到回到自己的老家了。

我们这个营原先是守备卞山的沂水二区区中队，自一九四三年夏季第一次讨吴战役推进到临朐县沂山地区后，算来一年多了。不料这次来到这里，真是无法形容有多么高兴。

天到中午，主要领导都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孙司令立即进行战斗部署。我们十二团三营营长张宝林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他的老家是湖北省，参军后，作战很勇敢，战斗经验很丰富。这次他跟着叶升团长一起到分区参加了分区召集的作战会议，回营后他马上集合全营同志传达

分区首长的作战指示，他说：孙继先司令员判断，扫荡我滨海区的日军五十九师团四十三大队，即草野清大队四百五十余人，伪军一七九团郝全仕部五百余人，还有汉奸武定道的县警备队三百多人，总计一千二百多人，他们企图窜犯鲁中，重占我沂水城。敌人可能有两个目的，第一，因为我军八月中旬攻克沂水城，打掉日寇许多据点，消灭了许多敌人，他们恼羞成怒，妄图对我鲁中军民实行报复；其二，敌人虚张声势，掩盖他兵力不足，后方吃紧的困境，妄图趁机将鲁中南分散之兵力，向北抽集，以保胶济沿线的安全。表面看，敌人凶恶狡猾，其实虚弱而又愚蠢。这次他们来犯鲁中，窜犯沂水城，沿途遭我地方武装围阻打击，吃了不少苦头。又加我军民早有准备，破除了城墙，炸毁了碉堡，埋藏了粮食和日用家具，使敌人抵达沂城，捕了个空，吃住都很困难。孙继先司令员指出，当前进犯沂城之敌有三条路可供他走：第一，向北有沂水城至益都的青沂公路；第二，向西有沂水城通蒙阴的沂蒙公路；第三，是由沂水城到博山的沂博公路。孙司令员判断，青沂和沂蒙两条公路，都经过我老根据地腹地，沿线多是由密迭嶂，灌木树林和青纱帐，又靠近我军区主力部队，敌怕孤军深入，露出破绽，遭我暗算，因此，他必然避开前两条。而沂博公路，沿途大山较少，南麻、东里店、葛庄等地是日寇不久前放弃的据点。同时军区也获敌情报告，日寇决定舍远求近，要沿沂博公路向西北进犯。于是孙司令决定，要在沂博公路上以葛庄为中心战场打一个伏击战，力争全歼敌人。张宝林接着传达了司令部的战斗部署：鲁中军区老一团，埋伏在葛庄东岭方向

的跋山地域，等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内，负责收口堵击敌人，不准日寇回窜沂水城；西边乔山有我鲁中军区老三团隐蔽于此，修筑工事，担任阻击，不准敌人逾越防线，窜去博山；北面有我十二团埋伏于徐家顶山前丘岭地带，负责迂回侧击，战斗打响后，拿上点部队，抢占松山岭，切断葛庄通诸葛的公路。正南面是一条水流湍急，水深齐腰，河面宽阔的沂河，是一个天然障碍，山军分区警卫连隐蔽于沂河南侧的河奎村，监视沂河方面的动静，主要兵力部署在东面西面和北面三个方向。张宝林营长传达完分区司令员作战部署后，接着传达团首长交给我们营的具体任务。他说：“团长命令我们占领松山岭，切断葛庄通诸葛的公路，直冲沂博公路上的敌人。这个任务艰巨而又光荣，我们应努力完成。具体打法，天黑进入阵地，现场安排任务。总之我们十二团抢占松山岭，向敌人腰部猛插一刀。”

九月一日晚七时，我团按指挥部的命令，向南推进到徐家顶一线的山岭上，团指挥所安在徐家顶的最高处，从望远镜里可俯瞰战场全貌。部队进入阵地后，各部都忙于看地形，挖工事，伪装阵地。我们三营的阵地是在徐永顶东南方向的小山丘和正南方向的松山岭。别看这个山丘不高，面积不大，但它是沂博公路上的咽喉之地，也是控制东西小平原的制高点，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我们三营进入这个地域后，张宝林营长立即命令七连占领左前方的小山丘，以切断葛庄通向大诸葛的公路。营部和九连马上进入靠小山丘西侧的墓田里隐蔽待命。接着张营长亲自带领九连排干部到松山岭上看地形，安排任务。这个小小的松山岭，就好象平地凸起的

一个沙洲，把一块完整的平原割成两半，东边一块大，西边一块小。岭的北头凸起一个山丘，是制高点。从此再向北，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山梁，就好象一根粗绳把个松山岭系在徐家顶的左山腿上。山梁北头住着两户人家，南端是用石头建筑的一个大牛圈，向南一溜下坡直插沂河北岸，南北全长百四多米，东西宽不至二百米。岭的最南头，早年建筑一座水母娘娘庙，原有大殿、后殿、厢房十多间。庙门前有一眼大泉子，周围还有几棵大松树，每年二月二十九日逢会，还有一番热闹香火。庙的东边是葛庄，沂水城西北三十余华里的重镇，是沂博公路上的要冲，是通博山、南麻、东里店的咽喉。为了控制我们沂蒙山腹地，一九三九年，日寇到这里拆了庙房，四周筑起高高的围墙，按上了据点，常驻鬼子一个中队，伪军一个中队，一九四四年二月敌人自行放弃。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民工彻底拆除了围墙、碉堡和房屋，清除了这个据点，现在仅剩残垣断壁。我们的叶团长、林营长，同九连的连排干部，在这条山岭上来回观察，反复研究地形地物，大家认为这条小岭雄踞沂博公路北侧，象把刀子，刀尖直插公路，是控制公路和两块平原的制高点，遗憾的是岭上光秃秃，无险可凭，而且靠公路太近，易被敌人发觉，战斗打响前，是没法在山岭上藏兵的。最后，叶团长决定，把九连一排三十余人埋伏在高地后面的牛圈里，王世庞副指导员带领二排埋伏于高地东边一条水沟里，刘永太副连长带领三排隐蔽在高地西侧一片高粱地里，杨运田连长带领机枪班一部二门六〇迫击炮埋伏在牛圈后的小山梁上，做机动并指挥三方的火力。营指挥所安在徐家顶东的山腿上，一眼

能看清全营阵地。营救护队和担架队设在七连占的小山丘右侧大墓地里，营管理员带领全营的炊事员到小诸葛村隐蔽做饭。全营天亮前吃饭完毕，隐蔽伪装好，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动。另外，给九连每人增发四颗手榴弹，全连增发子弹一千发。

九月二日早晨，一轮红日金光万道，徐徐地从东方跋山坡上涌出来，弥漫在沂河上的雾气，立刻消散了。河两岸的山川、丛林、村落都显得那么明朗、清晰，真象一幅浓郁的采色图画。

我们英雄的沂蒙健儿，早就鼓足了劲头，上紧了刺刀，拉出了手榴弹的弦，静静地隐藏在这块可爱的大地上，等着敌寇的到来。上午八时许，东南方向发出信号，这是侦察人员向我们报告，沂水城的日本鬼子已经出动了，他们正向葛庄方向前进。

上午十一时刚过，日军沿着沂博公路开过来了。前哨是十多个穿便衣的汉奸，骑着自行车给鬼子开路；后边紧跟着打着太阳旗的一队队日军向我而来。他们队伍中间，还夹着骡马拉的二门大山炮和骑在大洋马上的几个日军指挥官。炮队后面，是队形凌乱的汉奸队，有的斜背着枪、歪戴着帽子；有的肩上背着沉重的包袱；有的拉着毛驴，驴背上驼着行装；有的用枪挑着行李，这些都是扫荡我滨海根据地抢的老百姓的财物。鬼子的先头部队，早已越过松山岭南端，进入岭西小平原了。他们的马队才刚进葛庄，突然队伍停止了，看样子想休息片刻。这时汉奸也都上来了，三三两两也想休息。一切都很顺利，全部进入我伏击圈了。敌人都在

我们的眼皮底下，大家真是焦急，很想跳出去，给他一阵手榴弹，杀它个措手不及。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权力。这个权力在分区作战会上，孙继先司令员就把它给了一团老大哥了，必须有他们在东边的跋山上先打响，然后，我们才能动手。此刻只好耐心地等待。

时过片刻，突然东南方向的跋山上响起了阵阵机关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大峪村上空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这就是向敌人攻击的命令。这时我们的杨二虎连长，大喊一声：杀敌的时刻到了！他跳出草丛，带领着一排大声喊着：“同志们，冲啊！”就象离弓的箭头一样，抢先占领了松山岭制高点，接着顺岭向水母娘娘庙压去。这时候东边的老一团，西边的老二团都先后向敌人展开猛烈的火力，一阵轻重机枪的叫声，震破了沂河两岸的静寂。接着埋伏于三面阵地上的火力，一齐密集地向敌人猛烈射击。霎时间，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战士们的喊杀声，搅成一团，震撼沂河两岸。拥塞在沂博公路上的日本鬼子，被我这突然的袭击打昏了头，惊慌失措，东窜西奔，战马惊鸣，鬼哭狼嚎。但是，草野清毕竟是侵华战争的老手，他惊魂稍定，便猛然醒悟。当他的先头部队遭我二团猛烈阻击后，他就断定西进之路是难以逾越了，于是马上命令炮手，调头向我一团阵地轰去。在炮火的掩护下，敌人抢先占据了葛庄以西的水母娘娘庙，然后一面组织一个中队抢修工事，一面命令东西两侧的鬼子和伪军，固守阵地，顶住我军的两面夹击。同时，他又亲自指挥两个中队，窜出娘娘庙的围墙，顺着松山岭向北猛烈攻击，企图攻占我三营九连的阵地，抢先占领制

高点，扩大立足之地，待机突围。

狡猾的草野清打算的很好，但是，我沂蒙大地岂容日寇随意践踏。我十二团三营九连先一步占领了阵地，在杨运田连长的带领下，以迅雷般的动作逼近岭下。敌我双方在松山岭的中间相遇，立即展开激战。鬼子见我人少，武器也差，即大声嚎叫，端着刺刀向我连扑过来了。当鬼子靠我二十五米左右时，我们的二虎连长从地上跳起来，把匣子枪向南一指，高声喊：“给我猛打！”随着他的喊声，四十余颗手榴弹同时钻进了敌群，把鬼子炸得血肉横飞，东奔西窜，哇哇乱叫，余者败退下去。

第一次冲上来的鬼子，被我们用一排手榴弹打下去了，接着，又上来一群，端着刺刀，哇哇叫着，一齐向我逼近，当他们靠我三十余米时，我们的杨连长又大声喊到：“同志们，给我打天女撒花！”于是我们全体同志从地上跳起来大声喊了一、二，四十多个手榴弹又一起飞到鬼子头顶上爆炸了，这一铺天盖地飞来的手榴弹片，炸得鬼子哇哇直嚎，乱成一团，死伤一片，剩下的连滚带爬地退下去了。

接着，日军又连续三次向我九连守的高地猛烈攻击，但是，都被我连用排子手榴弹打了下去。这时，诡计多端的草野清马上命令鬼子暂停止进攻。他首先把败退下来的士兵，重新组织起来，又调上一个中队，加强向北猛攻击的兵力；然后，他又把大炮和迫击炮的炮口直指小高地；同时调来二挺九二式重机枪和六挺歪把子机枪，加强火力，掩护士兵向我发起进攻。在草野清重新调动兵力的时候，由于阵地突然的平静引起张宝林营长的不安，他思考片刻，焦急地说：

“不好，草野清这个家伙要耍鬼。”他马上命令杨运田连长，带九连绝大多数兵力借着手榴弹爆炸后的烟雾掩护，安全转移到小高地后坡隐蔽。小高地，有一排长魏天和同志带领一班和二班同志坚守。果然，不出张宝林营长所料，敌人的炮兵开始向高地射击，一串串的炮弹，落在山头上爆炸了，顿时小高地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一片火海。但是，我十二团三营九连一排的战士们，以有我无敌的战斗决心，迎着敌人的炮火，顽强地坚守阵地。炮击停止，机关枪又狂风暴雨般地响起来了。这时，连里的几个干部真有点焦急了！大家都挂念着一排战友们的安全。我主动向杨连长请示，要到一排阵地上去看看，杨连长把大眼一瞪：“小冯，你去干什么？”我说：“一排可能有负伤的同志。”他沉思片刻才说：“你带领两个担架员一块去，有伤员迅速抬下来，没有伤员，你们一起快回来。”我答应一声：是！就带领担架员跑步上去了。到小山顶上一看，一班长负了重伤，二班长和战士小徐牺牲了，一班战士小马同志头上被子弹穿了条大口子，直流血。我马上给一班长包扎好伤口，又给小马同志把头包起来，令担架员抬上一班长，领着小马同志下去了。这时，魏排长看见了我，他大声喊：“小冯！这里太危险，你上来干什么？快到连长那里去！”这话刚说完，魏排长一头栽倒了，我一个箭步，跑到魏排长跟前，大声喊：“魏排长，你怎么了！”他没有答应。我一眼看见他的胸部象泉水一样向外流血，我马上用急救包，堵住他的伤口，然后又用绷带紧紧扎住伤处，这时，魏天和排长，才拉着我的手说：“卫生员！我不行了，你把我的枪带上，快回连部去，交给

连长，叫他派人指挥一排。”他刚把话说完，就一头倒在我的怀里，再也不睁眼了。我大声喊他几声，他也不答应，我才慢慢地将他放在地上躺着，提起他的三八式大盖枪，跑步回到杨连长跟前，没等我开口，连首长一齐问我：“一排怎么了！”我只说了声魏排长，他……就放声哭起来了。连长这时候也都很着急，但是，他们还是平心静气的对我说：“小冯，别哭，慢慢讲，一排长到底怎么了？”这时，我的心也平静了一些，马上对连长说，魏排长牺牲了，他叫我把枪交给你，叫你快派人指挥一排。杨运田连长立即命令二排长徐春智同志带机关枪一挺，跑步到高地上，指挥一排坚守阵地。我也请示了连长，带领担架员跟着徐春智同志一块上去了，我们刚到了岭顶，敌人的火力突然停止了，这时，徐排长大声喊：“不好！敌人可能上来了！”我们惊觉地向前一看，鬼子果然顺着岭顶和岭的两侧，以密集的队形，端着刺刀，从三面向我们围上来了。徐排长立即命令机枪班长罗山启同志猛烈扫射，接着罗班长端起我营独一无二的德国造狮子牌的捷克式机关枪朝着敌群猛烈开火。因敌我相距很近，又加鬼子欺我无自动火器，想用集团性的攻击，夺取阵地，但当他突然遭到机枪猛扫的时候，顿时队形大乱，惊慌失措，丢下一片死尸连滚带爬地向后逃窜了。这时候，徐排长又大声命令机枪、步枪一齐开火，于是，我们的机枪和步枪同时向敌人猛烈射击。当我们打得很起劲的时候，通讯员小陈同志跑上阵地传达连长的命令，叫我们立即撤到营指挥所待命。对此大家想不通，但这是上级的命令，就得无条件的服从。徐排长马上命令战士们背上战友的遗体，又叫担架员

抬上一排长的遗体，迅速向营指挥所转移了。凶恶狠毒的草野清接着命令他的炮兵群，向高地开炮猛轰，沉雷般地炮弹爆炸声在高地上持续了半个小时，接着又来了狂风骤雨般的轻重机关枪声响了十多分钟，才突然停止下来，接着一百余鬼子，又从三个方向鬼鬼祟祟地端着刺刀围上来，结果一无所获。因为我连早已转移到营指挥所休息有时了。

这时，我十二团一营阵地和三营七连阵地上数十挺机关枪，突然一齐开火，以密集的火力，把敌死死地钉在高地上，敌人一步也不敢前进了。

将到下午五点钟，我们十二团团长叶升同志亲临前线指挥。我一营一连和二连从松山岭右侧，三营七连和九连从松山岭左侧，以绝对压倒敌人的优势，开始向日寇展开猛烈的反攻；西面二团老大哥部队，已把窜犯李家营的鬼子从西面赶了过来；东面跋山岭上的一团老大哥部队，也以八个连的兵力，向敌人展开全线猛攻。我们十二团用全团的机关枪掩护着四个连的兵力，以排子手榴弹开路，沿着松山岭和松山岭两侧向敌人包围。此时汉奸队已大部就歼，日本鬼子死伤惨重，敌尸枕藉。当我们向着一片豆子地里向前推进时，突然，三班战士段宝玉同志被死尸绊倒了，没等小段爬起来，他的腿就被拉住了，小段着急地大声喊，班长，快来啊，死鬼子又活了！三班长刘成然同志是当地刘家大岗村人，是我连年龄最大的班长，那年四十多岁了，从小就给地主扛活，是个苦大仇深的穷汉子，首长们几次叫他到团后勤工作，他都不干，要在这战斗班里和战友们一块杀敌。他的身体很好，作战很勇敢，关心同志，全班战士都很信任他。这时，他突然听

到小段同志的喊声，马上端起枪去救小段同志，这时从豆地里又跳出两个日本鬼子，端着刺刀，直朝刘班长扑过来，刘班长不慌不忙地扣动了板机，走在前头的鬼子应声倒了，后头的鬼子端着刺刀朝刘成然背后走来，在这危险的关头，刘永太副连长一个箭步跳过去了，抡起匣子枪哒哒地点射，这个鬼子也立时毙命。刘班长听到这阵枪响，惊觉地回头一看，两个人面对面地笑了。接着马上跑去援助小段同志，活捉了那个日本鬼子。在我军强烈的攻击下，鬼子的阵营顿时大乱，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残敌，纷纷夺路逃进葛庄以西的娘娘庙据点里。此时，太阳掉进拉山以西了，天已渐渐黑了下来了，月亮又从东方的跋山上慢慢升起，照得大地如同白昼。残存的日寇，凭借修起的临时工事和火力的优势，居高临下，阻止我们的攻击。杨连长命令特等射手和神枪手瞄准敌人，不让鬼子探出头来。接着组织机枪掩护，命令“朱德投弹手”三五成群地轮番向围墙里投出一串串手榴弹。三排长杨元兴同志带着四个“朱德投弹手”借着烟雾掩护爬到离娘娘庙二十五米处，将五颗手榴弹投入庙中，顿时，庙里黑烟滚滚，火光冲天。庙中传出了鬼子的嚎叫声。几个鬼子从庙中跑了出来，这时，机枪副班长孟光和同志抓准这个时机，端起新缴获的歪把子机枪得意地朝火光里的日本鬼子一阵猛扫，几个鬼子应声倒地死去，剩下的几个鬼子连滚带爬地躲到断墙后面。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晚上九时左右。这时，指挥所传来命令，要我们撤到原来阵地，修筑工事待命行动，将我们的阵地交给一团老大哥部队。

九月三日上午八时左右，娘娘庙中的敌人待不下去了，他们集中炮火，向我团阵地狂轰乱炸，接着窜出了六十多个鬼子拉开队形，顺着松山岭，气势汹汹地朝我团阵地冲了过来。这时指挥部传下命令，敌人佯攻，各部务必做好追歼敌人的准备。果然不出领导所料，当向我佯攻的这股敌人，遭到我机枪步枪猛烈阻击时，鬼子没有进行大的抵抗，调头南逃。这时，娘娘庙里的敌人，分成数路，在炮火的掩护下，蜂涌而出，向沂河方向逃去。

佯攻之敌遭我团猛烈打击后，也纷纷溃逃。这时，叶升团长亲临前线，指挥一营从松山岭右侧，三营从松山岭左侧，分成四把尖刀勇猛插向敌人，跟踪追击。此时，鬼子先头部队已开始渡沂河了。我团一营抢占了水母娘娘庙，敌人看其老巢被我占领，只好从庙的东侧直奔沂河而去。我七连、九连，紧跟敌人咬住不放，一面射击，一面向敌人逼近。

这时，东面的老一团由东向西，沿沂河北岸平行向敌人夹击；老二团一营从西边，向东直达沂河滩上投入激战；埋伏于河奎村的特务连在敌人的前面迎头阻击。我军从四面八方渡河之敌展开聚歼，机枪、步枪、手榴弹，组成了密集的火网，暴风雨般地射向敌人，子弹和手榴弹在水面上横飞爆炸，激起无数的白浪花，掀起高高水柱。

敌人在南逃路上死伤过半，只剩三十多个了，他们会同掩护兵力，想凭借沂河两岸的有力地形拼死和我对抗，但很快被我九连、七连的排子手榴弹赶进沂河中。时值多雨季节，沂河中心水深齐腰，水流湍急，河面宽阔，两岸连接着一百

多米的一片沙滩。敌人从娘娘庙向南逃跑时还有二百多，经过这一阵激战，被我打死一百多名，余者带着炮车辎重和大批弹药，被我军围困在不足一华里的狭长的河滩上，面前河水滔滔，四周没有什么遮挡。我军步步向前推进，子弹和手榴弹铺天盖地而来，草野清此时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有些日本兵穿着大皮鞋跳进沂河里，犹如陷进泥沼，笨得象狗熊一般，精灵一点的慌忙脱掉皮鞋连滚带爬地涉水乱窜。我们一个排子枪打过去，只听敌人哇哇嚎叫，水面上立即浮出一片尸体，接着片片血污顺流而下。这时，刚刚涉过沂河的敌人见势不妙，马上在沙滩上卧倒，架起机关枪，朝北岸猛烈射击。我们连的六班长和几个战士中弹倒下了。东侧沿河夹击过来的部队，很快逼近敌人的机枪阵地，把一串手榴弹扔出去，敌人的机枪再也不响了。我连在刘永太副连长和王世广指导员的带领下，趁机跳进齐腰深的河水，强行渡过沂河，在南岸的沙滩上又和残敌展开了激烈战斗。

时过中午，沂河两岸上，伤亡的鬼子，死马和敌人的车辆、炮车、炮架、炮筒、弹药等武器一片狼藉。敌人绝大部分被我击毙，但是，还有百来伤残鬼子仍在拼命抵抗。有个日本指挥官把东洋刀扔掉，一头钻进沂河露出头来，子弹在他头顶上吱吱直叫，他急忙举起胳膊，伊哩哇啦喊叫，可能是呼救吧！但没喊几声，就被我们打中了脑袋，沉入水中。

但是，草野清这个经过长期武士道精神训练的侵华老手，在这山穷水尽，死亡临头的时刻，还指挥他的炮兵残余，把所有的炮都卸开，扔进沂河里；又命令一部分士兵在沙滩上和我渡过河的部队拼命搏斗；然后又把四挺九二式重

机枪一分为二，阻击一团、二团渡河部队，最后他用歪把机枪开路，突破特务连的防线，带领十一个骑兵拼命向南无儿崮山方向狼狈逃窜。这时老一团的同志用刚缴获的日本指挥刀，一连连砍掉三个日本鬼子的头，缴获了日造四一式山炮的炮筒子。老二团的同志当场击毙拆卸破坏大炮的炮兵队长，缴获了炮架和炮车。我十二团七连九连在张宝林营长的指挥下，一阵排子手榴弹全歼和我对抗的敌人。这时南逃的敌人马队已被我追到无儿崮山脚下，有几匹大洋马被我们击中，只剩下八骑。张营长传下命令，不准打洋马，要捉活的。鬼子前面正遇着陡坡，骑马是爬不上去的。我们离敌人还剩下二百多米远，眼看着就要活捉草野清，此时，草野清这个疯狗，他朝洋马腿上狠打了两鞭，那红马四蹄如飞，向前猛跑二百多米，草野清从马上滚下来，脱掉皮鞋，拉着洋刀，拼命爬上无儿崮。我们用双腿追赶洋马，已经精疲力尽，子弹也都打光了，手榴弹向高处打有困难，眼看着这一小群鬼子爬上了无儿崮。我们缴获四匹拉大炮的阿尔登大洋马，其中一匹是草野清骑的长腿、细脖子，高头大红洋马，其他三匹是蒙古马。我连战士小贺同志从一匹蒙古马鞍上解下一个软软的白包袱，解开一看，全是一堆又臭又腥的死人手指头。这是日本鬼子从他们伙伴的尸体上一个个割下来的，准备带回去火化，留点骨灰，送回国内交差。

从战斗打响到白天的野外激烈的争夺，夜袭娘娘庙和沂河滩上的围歼战，至直追穷寇草野清爬上无儿崮，葛庄战斗打了一天半的时间。我们获得了全胜。除敌人大队长草野清带残敌十余人，趁突围混战之机，潜逃无儿崮，以后为日寇

派飞机援救漏网外，其余日伪军一千二百余人全部被歼。其中伪军大部被俘虏，活捉日兵二十人。敌人各种武器、弹药和辎重、战马，除战斗中被我击毁一部外，其余均被我军缴获。

九月三日下午，五点左右，我参战主力部队，按照指挥部的命令，撤离战场。清理战场和善后工作交由地方政府处理。我们十二团撤到刘家河北休整待令。我们三营驻在大诸葛休整。

葛庄战斗胜利捷报一传开，人心大振，沂蒙山区一片欢腾。新华社向全国发出电讯，公布我鲁中军区关于葛庄战斗的公报。当时的《大众日报》和各个抗日报纸连续发表消息、社论、通讯、特写。沂水县和临朐县、滨海地区等许多地方，频频召开祝捷大会，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群众把葛庄战斗的胜利消息和战斗事迹编成歌，排成戏，载歌载舞，广泛演唱宣传。在建国后的漫长年月里，在我沂蒙山区特别是沂水县人民中，还经常传颂着葛庄战斗的英雄事迹。在沂河滩缴获的日造四一式山炮，是我军在鲁中战场上，第一次缴获的重武器。这门大炮，跟随我军，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转战华东战场和半个朝鲜战场，在千百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谓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它负过六次伤，换过四次护板三次车轮，肚皮上留着伤疤，大架上深深地嵌着一颗颗枪弹。战争胜利后，它满载着我军胜利记录，被誉为“功劳炮”。

葛庄战斗的胜利，显示出我鲁中军区指挥员正确周密的军事部署，显示出我军英勇善战，顽强杀敌的精神。

葛庄战斗的胜利，是和我沂蒙山老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援和密切配合作战分不开的。那时候，虽然我根据地不断扩大，抗日政权推行减租减息，发展了生产，但是，由于遭受日伪顽的长期践踏、破坏和封锁，我沂蒙山区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当地群众，听说主力部队要在葛庄打日本鬼子，于是在一二天内，各级政府动员数千名民工，几百副担架，组织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为参战部队运送粮草弹药，抬伤兵。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崎岖的通往葛庄的条条山道上，人流如同赶山会一样，向葛庄中心战场四周汇集而来。为了保证前线指战员在战斗中及时吃上饭，周围的村庄都忙着烧水、做饭，并亲自送上前线。我十二团三营阵地后小诸葛村老乡们，连夜做好小米绿豆稀饭，单饼包着炒鸡蛋，煎饼卷着芝麻盐，沂水大锅饼和大油饼，在一位大嫂的带领下，直接送到我们三营阵地。

当时，我们部队没有重武器，杀伤敌人全凭手榴弹。手榴弹分量重，一个战士顶多带几个，很快就会用光，民工们扛起成箱的手榴弹，冒着敌人的炮火，直接送到最前沿阵地的工事里。在激烈地战斗中，有的民工一直在前沿工事开箱，给战士及时杀敌。

在战斗过程中和战斗结束后，溃散的日本鬼子汉奸，钻进青纱帐，妄图趁机潜逃，我沂北地区的民兵，早就在战场外围站岗、放哨，布下天罗地网，捕捉残敌。有几个潜逃的日本鬼子，带着一挺歪把子机关枪，在高粱地里提心吊胆地混了一夜，企图逃回博山，天明，刚走到石埠子村前，就被我民兵团团围住，当场打死两名，其余当了俘虏。有一日本鬼子

躲进秫秸洞里，被群众发现了，马上吆喝了几个人，拿着镰刀，把这个鬼子砍得血头血脸，绑送区公所。仅沂北县参战民工和民兵，两天中就活捉化装潜逃的敌人一百多名。

为了扩大我军的影响，提高抗日军民的斗志，考虑到我团沂北人多，又长期远离家乡，战后分区首长命令我团在此地多住几天，和当地人民群众欢聚一场。我们三营，自队伍拉起来，就长期驻守卞山，活动在刘家大崮、上下胡同峪、上下华庄、大小诸葛、大小暖峪、北鼓、武蒋峪等村，和当地人民有着血肉关系。同时这次战斗任务比较艰巨，我部在战斗中伤亡较大，特别是九连，不足百人的连队，在这次战斗中打得英勇顽强，完成了战斗任务，但是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伤亡干部战士三十余人，首长们都到连里安慰大家；二区和三区的负责同志也到连里来了；还有周围村里的干部，也都来慰问子弟兵，送来的许多物品；妇救会和识字班还亲手做鞋子、袜子和慰问袋，慰问部队。二区和三区的负责同志，听到子弟兵这次打得非常英勇顽强，缴获了一群大洋马，活捉了日本鬼子，打死了不少日本鬼子，为当地人民报了血海深仇感到无比兴奋，并当场表示：你们都是当地人，都是为了打鬼子，保卫家乡才放下镰刀锄头，拿起了枪杆子，参加了乡分队、区中队，然后又组织了卞山营，后来升级到了十二团。这次又回到老家打了个大胜仗，我们从心里高兴。第二天，早饭后，二区和三区的乡分队，区中队及村里青壮年九十余人报名参加主力部队。我们原先是“三三”制，武器也很差劲，这次增加了不少人，改成了一个连三个排，一个排四个班，其中三个步兵班，一个机炮班。机炮班里有

轻机关枪一挺，六〇迫击炮两门。营部用这次战斗缴获的重机关枪，组建了两挺制的营属重机关枪排，排长由我连二排长徐春智同志担任。团里新组建了四门制的八二迫击炮连。从此，我们十二团不但有了重机关枪六挺，还有了八二迫击炮四门。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九月十二日，我们高高兴兴地辞别了众乡亲 and 当地党政领导同志，一路浩浩荡荡地回到了马站，又受到马站一带的党政军领导和群众团体的热烈欢迎。他们敲锣打鼓，鞭炮齐鸣，送了无数慰问品，感人之深无法形容。部队驻下，休息两天，接着团里召开了祝捷大会。到会的党政军机关领导和群众团体的负责同志以及当地群众和全团指战员欢聚一堂，盛况空前。我们三营九连，作战勇敢，在大会上受到表扬。我也受到团里表扬，并且授于全团模范卫生员的称号，还受到金枪钢笔一支，衬衣一套的物质奖励，又由徐庆明同志介绍，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

葛庄战役的胜利，显示了人民子弟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在我沂蒙山区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八六年

沂北诸葛区中队和民兵 参加葛庄战斗回忆

杨 兴

一九四四年九月初，我军在沂北地区进行一次伏击战，歼灭敌伪军一千三百余人。当时我在沂北诸葛区任武委会主任，曾奉命带领区中队和民兵参加战斗。

记得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午饭后，我接到沂北武委会的命令，要我带领区中队和民兵一部到葛庄区金牛官庄一带找鲁中一团政委王文轩接受任务。区委书记杨成栋、区长李纯德对此十分重视，立即要我召集中队和民兵共百余人，由他们作了动员，由我带队就从埠前村出发了。我们以急行军的步伐，黄昏到达碾头岭东面的金牛官庄。我首先去见了王政委，王政委问了我们的装备情况之后说：“我们这次打的是一场伏击战，打伏击最重要的是保密，本来你们的任务是协助部队封锁消息，把附近村庄全部封锁起来，只准进不准出，这样一来，白天地里无人干活，将会引起敌人怀疑，因此必须派些人化装为农民在田里装作劳动，迷惑敌人，这个任务让民兵承担，就不需化装了，也少占用主力部队。现在你们来迟了，任务已经下达给部队，不能变更了。现在另给你们任务，由你带领区中队和民兵到松峰村把手榴弹运到这

里。鉴于战斗的需要，不便到处找运输工具，只好用人背。你们就赶快出发吧。”我临走时，王政委又嘱咐说，遇村要绕道，不要惊动老百姓，以防走漏消息。

这时夜幕早已降临。我按照王政委的指示，立即带领区中队和民兵向松峰村进发。金牛官庄至松峰村不足十华里，中间经过几个村庄，绕道走，就不止十华里了。我们一夜未歇，往返四趟，至拂晓完成了任务。完成任务后，王政委又命令我们进入阵地隐蔽。于是我们到了颛头岭北端一个小山包的北面。

次日早晨六点半钟，沂水城北罗鼓山后燃起三堆火，这是我侦察员向指挥部报告沂水之敌开始向西北方向出动而发出的信号。看到信号后，指挥部立即传令各阵地作好战斗准备，又命令化装成农民的战士下地“劳动”。上午九时许，敌人先头部队从跋山南面走上跋山东麓的颛头岭，沿沂博公路向西北行进。有两个敌兵骑着马前后左右跑来跑去察看情况，田里的“农民”象平常一样干活，敌人没有发现什么，便放心地走下颛头岭，过了沂河的支流暖阳河，向葛庄前进。当敌人行至葛庄村西松山岭南边的时候，埋伏在松山后的我军，以猛虎扑食之势，冲上松山，用密集的火网截住了敌人的去路，敌人只好退缩。过了一会，敌人才开始组织进攻，企图夺我松山阵地。

随着松山岭的枪声，一团立即从颛头岭的东、北两面冲上岭顶，以猛烈的火力将敌人后卫部队截断，压到颛头岭西暖阳河滩。敌人脱离了大队，只好退到颛头岭南，又顺着一条小沟拥至颛头岭西边，接着向北逃窜，与大队汇合。至此，敌

人全被我军压到葛庄小平原，钻进我们预设的“口袋”里。这时敌人乱作一团，慌忙拥到暖阳河滩，脚蹬手扒，躲进沙坑。战斗突然平静下来。但那松山岭的争夺战都越来越激烈。不一会，卧在暖阳河滩之敌向镊头岭发起攻击，企图夺取这个高地，我军即以强大的火力将其击退。敌人似乎认为只有占镊头岭高地才有生路，所以发起数次冲锋。但每次冲锋，均被我击退。敌人见夺岭而逃已经不可能，争取松山岭也未成功，只好退集到沂河与暖阳河交汇处“丁”字形的沙滩上。这对敌人来说，已经陷入死地。但它们并不甘心就此灭亡，接着重新组织队形，向西南河奎村的方向突围，于是敌人象一群鸭子一样拥进沂河中。这时我一团从镊头岭阵地上用猛烈的火力射击，敌人弃尸继续拼命南逃，当他们的先头部队窜至河奎村东北角的时候，埋伏在那里的我军，立即展开火力将其全部消灭，后面的敌人调头回窜，又陷入我一团火力网内，丢下一片死尸，窜到暖阳河滩，钻进沙坑，一动不动。这时松山岭阵地也平静下来。

为防敌人等到天黑突围，我一团首长当机立断，立即下令主动攻击敌人。这时已是下午四时许。我看到一团的一个营从镊头岭东面悄悄而又迅速地向北运动，到达岭北那个孤出小山包前，遂即南折，沿着岭根匆匆前进。这时卧在暖阳河滩沙坑中的敌人，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到镊头岭上，没有注意北侧，所以也无发觉我军从北侧袭来。我军接近敌人以后，立即展开队形，先向敌人打出一排手榴弹，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敌人立即跳出沙坑，与我展开白刃战、肉搏战。这时我一团主力遂即冲下镊头岭，同敌人进行了一场刺刀战，

直杀得敌人人仰马翻。敌人遭此突然袭击，便拼命向西松山岭方向窜去，以凶猛的火力夺去我松山岭阵地。这时天近黄昏。敌人占领松山岭以后，立即在原敌伪据点的基础上，抢筑工事，约经四个小时，就把围墙筑得一人多高，妄图借此同我抵抗。

这时一团政委王文轩同志交给我两个任务：一是立即打扫战场，二是派人到区公所去取五个大地雷。接受任务后，我立即派民兵武二候等人去运地雷；我带领区中队和民兵到了“丁”字形战场，到此一看，到处是死马死尸。我们把受伤的日兵抬到担架上，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头撞担架，还咬人，只好将其绑在担架上抬回去。还有的受伤的日兵躺在豆棵里向我们放冷枪，喊他，不肯出来，只好再给他一枪。我们正在搜索，突然一个士兵喊叫起来，说有一个人被绳子捆着，由于夜间看不清，我以为是被敌人捉去的自己的人，就急忙走过去，伸手给他解绳子，一触觉得软绵绵的，不象绳子，又仔细一摸，原来是肠子，是被我军用刺刀挑出来的。这个敌兵尚未完全死去，鼻孔里还有气，但是已经奄奄一息了。敌人还扔下许多武器、弹药、电台、马匹等等，他们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全部交给了一团。完成任务后，王政委对我说：“你们赶快吃点东西，今晚要消灭松山岭上的残敌。十二团为主力，我一团为预备队，你带着区中队和民兵随我行动。”

晚上九点多钟，一团浩浩荡荡地向西出发了。我们跟在王政委的后面。部队到达葛庄东西大街的东头，停止前进，集结在沂博公路西侧待命。我们跟着王政委走到离松山岭不到二百米的地方，坐在那里听了一夜枪炮声，只见松山岭上

一片火光。直到拂晓，没有拿下松山岭，十二团撤出阵地。我们又跟一团返回金牛官庄暂作休息。

刚刚吃过早饭，王政委派人把我叫到团部，交代任务，他说：“你把你的队伍分成三、五人一个小组，轮流到松山岭以东以北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也不让他们出来搬石头修围墙。要注意，不要离敌人太远，也不要离敌人太近。下午五点钟回来吃饭，晚上一团担任主攻，到时还要给你们任务。”

按照王政委的指示，我立即把人召集起来，传达了首长交给的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方法。接着将一个班分为两组，正副班长各为组长，各组轮流出动执行任务。这样安排好以后，我带领第一批执行任务的小组出发了，我们从松山东边转到北边观察了一番，果然不出王政委所料，敌人正在忙着用石头加高加固围墙。于是我们隐蔽起来，敌人一露头就给他一枪，打过以后，换个位置再打，这样打了一个上午，使敌人没敢露头。下午换上第二批，也是这个打法，打得敌人一天没得安宁。

到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一直守在松山北面的十二团突然响起了急促的军号声，听到号声，一团立即紧急集合。这时我从屋里赶紧跑了出来，区中队和民兵战士围上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正在说话之间，我看到四五十个穿着白上衣的敌人从松山上下来，向北跑去，直奔上、下小诸葛村。我急忙喊：“敌人出水了，快集合！”接着十二团于西边、一团于东侧，同时向北包抄敌人。这时松山的敌人乘机向南逃窜，我军立即分兵向南追击，渡过沂河，追到河奎

村，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丢下一片死尸，狼狈逃上端云崮。本来我老四团一个营守在河奎村，指挥部认为，敌人已被我军包围在松山上，已经成了瓮中之鳖，就把该营调到草沟一带阻击另一股敌人去了，如果该营继续守在河奎，敌人将无一漏网。

敌人逃上端云崮以后，敌机来了好多次，空投了许多物资，有子弹、药品、解渴片、固体酱油、地图，等等。由于崮顶面积小，风又大，大多数东西都落到山下，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九月七日上午，莒县的敌人到了大、小半城村，接应困在端云崮顶上的敌人。大、小半城在端云崮以东，隔着沂河，沂河东岸是两华里的沙滩，离端云崮约四、五华里。莒县之敌到达大、小半城之后，用电台与端云崮上的敌人取得联系，敌人立即冲下山来，渡过沂河，直奔大、小半城。这时我军以猛烈的火力进行追击。大、小半城之敌也以强大的火力对我射击，掩护从端崮撤下来的残兵败将逃窜。经过这次激烈的战斗，敌人又在沂河滩上丢下了大片死尸，余者不足二百人全部窜至莒县。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于上海

鲁中军区

发表葛庄歼灭战役公报

（新华社山东分社鲁中十四日电）鲁中军区发表葛庄歼灭战役公报称：为痛歼“扫荡”滨海西退之敌，破坏敌伪再次对我鲁山区的新扫荡，鲁中我军继沂城歼灭战后，在短促时间内组成了葛庄歼灭战役，以运动战方式，经六日围歼追击，将敌草野清（本报前误为草野大队一编者）大队大部歼灭，生俘敌兵三十一名，毙伤俘敌伪旅长陈三坎以下一千三百余人，造成我鲁中歼灭战之空前范例。兹将战役经过详情报导于后：

（甲）本月一日，敌田板旅团长率滕崎大队及伪县警共敌伪八百余，由莒县出发经营（县）益（都）路北窜，当夜宿营于柳树头一带。我为争取沂博路的战役胜利，歼灭经沂博路北返之敌，使其迅速北窜，减少我侧翼之顾虑，而以主力一部于二日晨乘敌伪以行军纵队前进入杨家庄北岭我伏击地区时，我伏兵待距敌百米后，向敌猛扑，展开激烈白刃战，将敌前哨百余人消灭，待敌主力赶到，我军主动转移新阵地。同时，我另一部绕敌侧后袭击，敌首尾难顾，则退守杨家庄，我以任务完成，乃主动撤出战斗。该敌于下午二时仓惶北窜，经马站时，遭我另一部侧击，更呈恐慌，途经穆陵关（青沂路）窜向临朐。此战斗共毙伤敌百余。（乙）二日复

由莒县出动敌伪两千余（内有五十九师团草野清大队四百五十人，伪三方面军吴化文主力，贺方师一七九团、一七一团、一七三团、一七四团各一个营，及陈三坎部一千五百余人，滨县伪县警五个中队三百余人），由伪四十六师长贺方统帅，经莒沂路向沂水前进，当晚宿营于严家官庄、四十里铺线（沂城东南），我为造成其疲劳弱点及确实查明情况，以精干一部强行夜袭除给予部份杀伤外，并捉一俘虏而归。次日该敌继续经沂博路北窜，我以一个团兵力组成三个梯队，隐蔽埋伏于葛庄附近地区。三日晨敌伪分两路沿沂河北窜，左路为伪三方面军贺师及陈三坎部千二百余人，由沂城西渡河经匡庄、柳泉向草沟、悦庄窜犯，企图向西北前进，与沿沂博路向葛庄前进之敌会合，当日午该敌已占草沟、悦庄及草沟东北小山。我预备队在中山发觉后，当以一部占领草沟西高地，迎面堵击其前进；另一部机动向敌侧翼迂回，并以一个排占领草沟东南后山阵地，将敌压缩沟内。敌警觉我迂回部队后，即以其主力向我后山的一个排进攻，首以百至三百余人分两路再次冲锋，我待敌接近到相当距离，首以手榴弹猛掷将敌击退，即刻发起反冲锋，将敌击退。下午四时我第三梯队飞快赶到将敌全部压在西草沟庄内，敌即慌忙修筑临时工事，作坚守准备。六时我四面包围部队，开始了总攻，敌以临时工事炽烈火力为拼死顽抗，每当我军向敌猛攻时，各种枪声炮声响成一片，战斗之激烈前所罕见。由我各路突击部队在敌弹雨缝隙中，跃进急进，勇猛冲锋，突入庄内，占领村落二分之一，杀伤伪百余，缴获武器弹药马匹各一部，生俘数十。至上午十二时，该守敌不支，向东南突围，四围

山岭我监视及休息部队，先后跃起，勇猛追击，当场击毙伪一旅长陈三坎。敌沿途溃逃，尸体武器弹药及所抢之衣物极多。我追击至沂河岸，将敌大部歼灭，残敌四百余向莒县奔逃。窜至三十里铺后，被我警戒部队击散，仅余二百余人，窜入莒县城。

右路为敌草野清大队四百五十人，伪武定道县警三百余人，吴伪一七九团之郝全仁部二百余人，共千人，附八二小炮一门，重机枪二挺，轻机枪十二挺，沿沂博路前进，到下午二时进入我葛庄伏击圈内。当时因民兵鸣枪稍早，敌迟缓不前，敌第五中队有强占葛庄东岭之势，我第三梯队迅速占领，展开梳篦式的战斗队形，取隐蔽地形飞快向敌接近。当敌返至东岭线时，我即投入勇猛的冲锋，白刃肉搏，把敌人压于岭下，以刺刀刺死敌人五十余，敌第五中队副岗田健当被刺毙。敌人另组织第一中队第四中队，在两门山炮及轻重机枪掩护下，向我反扑，我第二梯队坚守阵地的英雄们，比敌人更顽强的沉着的守备着，当敌人到达相当距离时，即投入反冲锋，连续冲锋。敌反冲锋达五次之多。迫敌败退下去，我小岭阵地依然屹立，使敌锐气顿挫，形成百米距离的对峙局势。同时我第一梯队由西北分数路经高苗地内隐蔽向敌压缩前进。黄昏时，开展总攻击。首先我第二梯队的冲锋英雄们在轻重机枪及小炮等等火力的两侧射击掩护下，跃出临时构筑的简单工事，英勇冲向敌人，敌亦端起刺刀向我迎刺。我先以集团的手榴弹杀伤敌人，将敌阵击乱，继续投入白刃格斗。此时双方的火力皆不能直接掩护，敌我形成前后交叉胶着状态。英雄们拔出了刺死敌人的刺刀，再刺第二第三第

五个敌人。为我鲁中抗战史上空前激烈拼刺。激战约五分钟后，终将敌人刺垮。残敌抱头西窜。我坚决追刺，敌尸狼藉遍野，追击者稍一不慎，即会绊倒。敌企图西窜李家营，被我第一梯队迎头打来，敌复北窜，又被第一梯队的侧击队勇猛击退。四面将敌压缩在葛庄西小岭头上（原敌据点已被破坏），利用其残存的破墙基企图顽守。所跟之伪军大部弃械化装民伕四散逃脱。我当晚向敌总攻，实行车轮战法，给敌大部杀伤。相持至四日下午六时，敌向南突围，我及时发出冲锋信号，我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由东西平行向沂河岸夹击。第三梯队追到河岸，当以轻重机枪猛烈射击正渡河的敌人，敌狼狽万状，将大部重武器丢入河中。第二梯队绕过河南村，以手榴弹将敌截成两段。敌约五十余人沿沂河至莒沂路向莒县逃窜，被我警戒部队在三十里铺截击，将敌名牌电台截下，缴获一部，其余窜向莒县。一部五十余及伪军百余，走头无路退守无儿崮（葛庄西南八里）固守待援。五日，敌机三次共十一架，为孤敌投掷弹粮。崮上伪军四人，下山取水，当被我喊话争取反正。第二次伪军六名执二十个水壶下山取水，被我击毙两名，其余四名逃窜。六日敌田板旅团长亲率敌伪千七百余，由莒城分两路在十二架飞机掩护下增援无儿崮，将被困之残敌解围。至此战役乃告结束。

兹将此次战果统计如下：共击毙敌一中队长田野平、五中队长岗田健、炮兵队长佑伯司以下、击毙击伤散敌共三百人，生俘敌兵三十一名，击毙伪三方面军独立旅旅长陈三坎、营长乌正以下及毙伤击散共伪约千人，生俘伪三方面军四十六师参谋长李真化，以下三百六十七名。缴获八八式

山炮一门，小钢炮架一个，零件一部，三十年式步兵平射炮一门，迫击炮二门，重机枪五挺，轻机枪十六挺，小炮三门，掷弹筒四个，步枪四百六十二支，短枪四十四支，八八式小炮弹十六发，三十年式步兵炮弹八发，迫击炮弹六发，小炮弹二十发，掷弹筒弹二十一发，各种子弹万余发，手榴弹一百一十二发，烟幕弹十五发。洋马十五匹，马二十二匹，骡子六头，驴五十一头，指挥刀十把、刺刀三十七把、钢盔三十一顶、水壶一百个、望远镜三付、电台四部、滤水机一个、大米一千余斤、伪钞五万九千二百七十九元，西药一部、机密文件一部以及扫荡滨海所抢的一切东西全部留于战场。因敌伪溃不成军遍地皆散兵。至于民兵老百姓所得枪支财物及俘获均未在此统计内。我伤二百六十名（内连级四名、排级六名），亡四十九名（内连长一名，排长二名）。消耗各种弹药二万三千七百八十三发，手榴弹二千五百九十九个，小炮弹五十一发。

（选自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七日《大众日报》）

我在沂北一段工作情况略述

李怀德*

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间，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建立了沂北工委和行署。我由沂水县武装科长调任沂北行署任武装科长兼县大队长。武杰同志任工委书记，崔杰千同志任行署主任，单昭祥同志任公安局长，李德民同志任工委组织部长，刘亚明同志任宣传部长，耿启明同志任抗联主任兼农会会长，王明贞同志任青年会长，陈淑身同志做妇救会工作，一九四三年袁涛同志任妇救会副会长。

沂北工委和行署建立时，其辖区包括原沂水县一区一部和二、三、七区。此地大部是敌占区和游击区，我们有效控制的只有二十多个自然村。工委、行署机关经常流动驻的村庄只有十余个。辖区内的敌伪据点有沂水城、武家洼、葛庄、松峰、道托、高桥、沐水。马站北部被国民党五十一军及一些杂牌部队占据着。但沂北党的基础很好，党群关系非常密切，因此辖区虽小却很安全。就是敌人据点我们也能进去活动。敌人整天蹲在老窝里，除“扫荡”外不敢轻易离开据点。

一九四三年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将原来的乡划为区。

* 李怀德，沂水县诸县镇埠前村人，现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政委。

这样沂北就辖长安区（完全系敌占区）、道托区、高桥区、葛庄区、柴山区、韩旺区、大诸葛区等。七区待国民党五十一军撤走，我反顽斗争胜利之后才又划为马站区、崖庄区。全县共九个区。

沂北工委刚建立不久，就遇到了日伪秋季大“扫荡”。一九四二年十月，敌人对青、沂公路以西，沂山以南，沂水至东里店公路以北这个区域实行大“扫荡”，采用的是拉网战术。在敌人行动之前，县机关已经掌握了敌人扫荡的确切情报，我带县大队的一个中队和行署主任崔杰千、工委书记武杰、公安局长单昭祥及部分机关人员从常庄出发，直奔崖庄，计划会同崖庄区公所同志一起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插到高桥附近的敌占区隐蔽。当我们夜里到达区公所时，不料他们早已转移。此时已快天亮，队伍行动不便，我们只好在沙沟村南山旺密林深处暂时隐蔽起来。拂晓，我到林边悄悄去观察情况，发现敌人就在我们对面山岗上点起一堆堆篝火，我们就在敌人的网边，情况相当危险。我回来同崔、武、单等同志商议，决定在此隐蔽，并要求全体同志必须严格服从指挥，敌人不来碰我们，谁也不许随便行动，更不准开枪；如敌人发现我们并向我们袭来，我们就立即猛烈开火，集中力量向敌人后方突围。

早八点左右，敌人开始“拉网”。有一路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只有二、三十米。我身边的粮秣助理员李中泉同志有点沉不住气了，抓起手榴弹就要向敌人摔去，我一见他要行动，当即按住他的手。真是好险哪！敌人从我们眼皮底下过去了一帮又一帮。我们在敌人的身边隐蔽了整整一天。夜

暮 临，我们开始转移。县大队的一个中队在向根据地转移的途中被敌人冲散。就在这一天发生了对崮山战斗。第二天，崔杰千同志因年大体弱就隐蔽在群众家里；我和武杰、单昭祥带领几位机关人员于天黑时返回根据地大诸葛、河北一带，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坚持斗争。

这时，国民党五十一军一部乘日寇刚刚撤走，群众情绪尚未完全稳定之机，伪装日寇夺占了我上、下华庄、略疃等村及北山。我们则转移到北古村组织了诸葛乡的乡分队及民兵坚守杨家顶，阻止了顽军的进犯。

在这次敌人残酷“扫荡”中，沂北县大队副大队长贾××（名字失记）牺牲了，二地委组织部长潘维周同志牺牲在安家圈附近。敌人的“三光”政策使沂北根据地受到了很大损失，群众的生产、生活十分困难。由于这一带党和群众有多次反“扫荡”的经验，经受了艰苦的磨炼，同时中央关于“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全县党政军民的斗志，他们没有被敌人的凶焰吓倒，也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抗战必胜的信念非常坚定，情绪高昂，斗志旺盛，齐心协力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一九四三年二月底，日寇又对沂北等地进行“扫荡”。工委和行署机关分散活动。我和武杰、单昭祥两同志突围出去。王子固同志带的一个连不幸在歪头崮被敌人包围，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最后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

同年春，崔杰千同志调走，余辉同志来任行署主任，李志南任副主任。这年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根据中央的号召，开

展大生产运动，改善军政民的生活条件，配合主力部队的第三次反顽斗争，开展对敌占区的工作，扩大根据地。

在大生产运动中，县机关（包括群众团体）同群众一起种地，纺线织布，做鞋，搞运输，没有牲畜就用人拉犁，这对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起了根本性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主力部队第三次反顽斗争。国民党五十一军南撤后，我根据地大大地扩展了，工委就组织了工作队去八区悦庄一带开展工作。七区也发展到沂山脚下的张马庄一带。整个形势发展很快，党政军民的信心大增，群情激昂。不久，四地委和沂山军分区、沂山专署成立，沂北属四地委、沂山专署领导。

一九四四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迅速好转，沂北地区扩大很快，沂水城、武家洼、马站、高桥、沐水、松峰、道托等敌人据点全部拔除。这年春，行署主任余辉、副主任李志南上调，由我代理行署主任，其它领导同志没变。这时工委和行署机关可以在沂北所属境内任意活动了。短短的一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在望了。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对敌斗争，在全县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改善了贫雇农的生活，团结了地主和开明士绅共同对敌，群众的抗战情绪更高涨了。

一九四五年继续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八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开始大家都觉得很突然，等到我们把情况弄实，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于是群情沸腾，奔走相告，到处开庆祝会，当时的喜悦之情真是难以言表。不久，中央号召，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成果，防止蒋介石挑起内战，我们要开展参军运动。上级决定，要我以行署主任的身份带头参军，并以

沂北子弟兵团的名义号召全县青年入伍。子弟兵团没有团的机构，而是以各区区中队为主成立大队。这一号召发出后，全县男女老少热烈响应，送子送郎参军的非常普遍，很快掀起了一个参加子弟兵团的高潮，不到一个月，全县就集中起新战士三千五百余人。我这个团长只起了个号召的作用，并没有实际组成一个团。新战士集中后由军分区分别编到各部队，我这个挂名的团长也被调到沂山军分区当了武装部长。至此，我在沂北的一段斗争生活也就结束了。

以上这段情况记忆不全，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仅供参考。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张茂萱整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抗战时期浯河区的情况

赵 诚

浯河区（现为圈里乡）位于沂水城北一百华里，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它的东面和北面靠近安丘县，西面和临朐县接壤，南以龙山为屏。当时所属自然村七十多个，约三万五千口人。土质不很肥沃，沙地居多，易产谷子、地瓜、花生等。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常年盘踞在这里，对该区人民横征暴敛，弄得人民生活朝不保夕，难以聊生。特别是一九四二年日寇在圈里东荆山上设了据点，“扫荡”频繁；再加上伪乡长王锡来同敌勾结一起，敲诈勒索，搜刮民财，使得人民无法生存。

一九四三年夏，成立了莒沂边，派来薛绍庚任县委书记，林歧任县长，兰陵任建联主任兼组织部长。办事机关设在杨庄区儒林村。下辖杨庄、箕山、东莞、棋山、雪山、鸡叫山（浯河）六个区。我被派到鸡叫山区任代理区长。因当时该区属于敌占区，区机关临时设在杨庄区的秦家庄一带。

我遵照县委的指示，到任后，第一项任务是抓武装，组建了区中队，共十多个人，队长是马×英，有土压五枪十多支。当时伪乡长王锡来经常在这一带鱼肉乡民，群众早已恨之入骨。因此，区中队成立后，目标首先对准了王锡来，决

定除掉这条害人虫。

此时，鲁中公安局由常德同志带来一支武工队，共五、六人，我们跟他商量，互相配合干掉王锡来，于是，对如何行动作了研究。根据以往情况，每逢圈里集，以王锡来为首的几个汉奸都出来赶集，又正值农历腊月底春节来临，他们定来赶集，最后议决二十八日在圈里集上干掉他。

这天，我们带好枪支，提着篮子，背着布袋，化装成老百姓，随着群众朝集市奔去。上午九时，我们刚到北岱庄河边，只见从荆山据点下来了七个伪军，有的嘴里叼着烟卷，有的吹着口哨，有的歪戴着帽子，嘻皮笑脸地下山来了。这时我们都已作好了准备。他们走近，我们发现诡计多端的王锡来没来。于是决定活捉这几个汉奸。待他们刚入集口，我们两名武工队员连忙下了手，上去扭住一个，这个汉奸拼命挣扎，被武工队员当场打死。枪声一响，集市乱了，其余几个汉奸趁此挤在人群中逃跑了。我们缴获了两支步枪，子弹数发。这是我区第一次向敌人发出的警告。从此，敌人龟缩在据点内，不敢轻易出动。

至一九四四年四月拔除了荆山日伪据点，全区获得解放。区机关由杨庄区秦家庄一带移驻鸡叫山区朱营村程秉臣的大院里。这时县委决定改鸡叫山区为荆山区，派曹宝善同志任区委书记；邵霞同志负责妇女工作，不久调走，高仁范同志任妇教会主任；秦煜同志任农会主任；魏英堂同志任公安员；陈立元同志负责财粮工作；许世宝同志负责工会工作；葛庆明同志负责武装工作；葛庆瑞同志负责青年工作；刘洪芹同志任文书兼民政工作。

该区刚刚改建，就在莒沂边县委的领导下，开始了一次动参工作。由于我们宣传得好，工作做得细，群众自愿报名参加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的积极性非常高涨，出现了很多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参军的动人事迹。新兵临走时，我们专门召开了欢送晚会，区委书记、区长亲自给新兵披红戴花，区长秦煜为大家清唱京剧《吊金龟》，受到广大新战士的欢迎。

同年秋，由于县委的正确领导，我区广大干群的积极努力，秋季作物长势特别好。不料遇到一场严重的蝗灾。蝗虫遮云避日，覆盖了绿油油的庄稼地。受灾面积很大，从我区一直到安丘县的中部。为灭蝗灾，夺取丰收，我们同安丘县联合成立了捕蝗指挥部。在全区广大人民的努力下，使我区的庄稼基本未受损失。在灭蝗工作中全区出现了很多模范人物，如董守本同志代表全区参加了鲁中劳模大会，奖励我区黄牛一头，绵羊十只。

一九四五年初，区委书记曹宝善调淮安县，我任区委书记兼区长。不久上级指示搞反奸诉苦运动，县委派来一个工作队，由县委委员宣传部长陈古山带队到了我区，帮助我们工作。

当时我区刚解放不久，不仅有敌、伪、顽的残渣余孽，而且驻安丘县一带的茹素团不断潜入我区进行破坏、捣乱。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由于受其煽动，对反奸诉苦运动顾虑重重。起初阻力很大，后经反复宣传有关党的方针、政策，讲明“谁养活谁”的道理，群众才发动起来。如南岱庄的大地主高尚庭，是个封建堡垒，他与安丘境内的反动武装有联

系。群众觉悟提高后，斗争了他，并分了他的浮财。

同年五月，反奸诉苦运动尚未结束，以李洪恩为首的三名反动人物在我区魏家河村密谋，企图破坏我区机关。区武装干事张文升同志得知后，立即向区委作了报告。当时我正在圈里，当即调集圈里一带的民兵，想迅速包围魏家河，捉拿匪特。圈里离魏家河只有三华里。民兵集齐后，跑步前进，当我们接近魏家河村时，被他们的哨兵发觉了，他们正准备吃饭，扔掉饭碗就跑。我们冲进去，当场打死一人，活捉一人，李洪恩逃脱。

不久，以李洪恩、李宪臣（李五）为首联合荆山等地汉奸刘彦臣、高景书等十三名武装，各执长短枪，深夜潜到我区南山旺内，妄图再次偷袭我区机关。当夜，他们派人到我区机关附近的南朱保村侦探情况，被我联防大队长高永田发觉，立即报告了区委。当时我们正在圈里庙内开会，听高一说，我们就行动了。因对他们的力量估计不透，我们派武装部长程贤庭同志跑步到杨家城子向县委作了回报，要求县委派人配合，县委答应派马站民兵增援。程回来后，我们作了具体布署，我区民兵主攻南山旺，西山头由区公安员贾守第带队把守，北山头由秦煜带民兵监视，高永田也带了一部分武装准备打援。天刚蒙蒙亮，战斗打响。我带领民兵直攻南山旺，敌人向西山逃跑，被西山民兵用匣枪、步枪、土炮打了下去，当场击毙一人。李五、刘彦臣等人龟缩在河西村西松林内，我带民兵冲去，向松林内投了两颗手榴弹，他们乘着烟雾向河西村内逃去，在该村内又遭张培文等人的截击。接着他们向北山逃，又被守在北山的民兵用手榴弹炸散，

高景书当场毙命，一个受伤。我们继续尾追，追至山顶，我的手枪子弹已经打光，立即拾起一块石头猛向敌人投去，敌误为手榴弹，转身躲避，被我区中队战士相××（名字失记）一个箭步上去猛将李五抱起摔倒在地，我们立即赶上去，将他活捉了。刘彦臣还想垂死挣扎，逃至一条河边，被一个洗衣的妇女拦住，我们追上去将他活捉。这时已经日落西山。此次战斗，俘虏三人，打伤一人，打死两人，缴获三支匣枪，一支长枪。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抗战时期我在沂水沂北工作的经历

赵 干*

(一)

我家是原沂水县九区（现属沂南县）崖子乡。一九三八年十月入党。一九三九年二月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任本乡支部组织委员，参加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乡分队的工作。同年七月调到沂水县委工作。沂水县委当时驻二区大暖峪村。县委书记是刘建中，组织部长是王翰卿，军事部长是周洪恩。县委原定分配我做巡视员，鉴于我太年轻，便另行分派我到三区做青年工作。当时区委驻耿家王峪附近，区委书记是耿启明，组织委员是杨琳（杨延华），区长张绍武，妇女干部有袁焘、丁聪等。

一九四零年一月，我又调到县委（驻二区胡同峪）。这时县委书记刘建中已经调走，王翰卿接任。组织部长是郝心昌，宣传部长是刘滋泉。我先在县委秘书处工作，不过一个月即调县青委任委员。这时青委书记（青救会长）是杨琳，青委工作干部还有黄金魁、王金秀等。妇女工作负责人是吴畏。同年三月，县委移驻四区汉峪时遭受日伪袭击，县委宣传部长刘滋泉牺牲。此后，县委常驻四角泉一带的一、四、六

* 赵干，曾在浙江省委工作，现已离休。

区交界处。沂水县五、九、十区和六区大部乡村划出建立沂南县（行政机关为沂南行署。此后区划变动频繁）。同时建立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江海涛首任县长（二任是李贯一）。这时县委各部门负责人，除组织部长、青委书记无变动外，其他都作了调换。赵涤尘任宣传部长，黄田任县委书记，王同庆任民运部长（对外称各救会长，兼农救会长），公培元（公前）任职工部长，阎娟任妇委书记（对外称妇救会长）。同年底，王翰卿调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崔杰千接任县委书记。

我在沂水县青委一段工作期间，并无突出事迹可回忆的，印象较深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召开全县青年代表会，选举县青救会领导机构，杨琳被选为青救会长，我和黄金魁等几位同志被选为县青救会成员。这次青年代表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我与黄金魁见面时交谈过，记忆不一致，他记得是一九四零年春在柴山附近某村召开的；而我则记得是一九四零年秋在望仙院召开的。与青年代表会同时召开的还有农代会、妇代会等。开会期间，县公安局长郭宜春还布置我做保卫工作。二是一九四零年夏，以柴山为基点建立沂水县青年武装大队。队长是黄金魁（后为刘春生）。我印象较深的是甘河村佟继盈这位积极分子。他是独生子，家庭比较富裕。建立武装大队时，他不但带领一部分青年参加了，而且还在物质上给予不少支援。青武大队发展到四五十人。由于枪支弹药和经费来源都比较困难，后来编入了县大队，取消了青年武装大队的番号。

一九四一年五月，县委调我去延安学习，到鲁中二地委

组织部报到时，邵德孚同志（兼任地委组织部长）考虑到我身体条件较差，不宜长途行军，即决定留我在地委组织部工作。沂水县委又另选调一人去延安学习。不久，潘维周接任地委组织部长。

（二）

一九四二年八月，沂城以北、沂河以东的七区和二区的大部、一区和三区各一部分村划出，建立了沂北工委、行署。工委书记是武杰，组织部长是李德民，宣传部长是刘亚明，行署主任是崔杰千（不久余辉接任），武委会主任是李怀德，公安局长是单兆祥。沂北县建立后隶属鲁中二地委，二专署。（一九四三年初，沂山地委建立，霍士廉任书记，王翰卿任组织部长。沂北县划归沂山地委领导。）沂北辖长安、道托、高桥、马站、崖庄、韩旺、诸葛、葛庄八个区。长安区全是敌占区。道托、高桥、马站、葛庄区只是公路上有敌人据点，我们可以在广大村庄公开活动。这时我于山东分局城工部办的敌占城市地下党工作训练班学习结业，地委原决定派我到敌占蒙阴城做地下党的工作，由于利用条件不成熟，地委决定改派我到沂北县长安区任区委书记。活动方式，以社会职业做掩护。经沂北工委同长安区原党的工作干部商定，我改名换姓刘庆泉到长安庄，利用一伪属关系，与刘庆明合伙租借长安庄李长泰的南屋开小酒馆做掩护。这时区委组织干事徐农早就在此地工作，情况很熟。行政上建立了区公所，区长刘光复（刘学修）。但区公所不能公开驻在本区，而常驻道托区，只有到夜间回本区活动。我以开小酒

铺做掩护，不到半年时间，感到我的身份有所暴露，经请示工委批准，抛弃小酒铺，完全转入地下活动。

长安区所属村庄是沂城以北，韩家曲以南，方圆不过四、五十里。韩家曲有敌人据点，到沂城公路上还有两个敌人碉堡，沂城敌伪特务经常出城到各村骚扰。但我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群众抗日救国觉悟较高。党的力量最强、群众条件最好的徐家洼、长安庄、小滑石沟三个村子，是我们活动的三个基点。日寇“扫荡”，形势紧张时，县的个别领导同志也曾来隐蔽过。各村政权都是“两面派”，表面应付敌人，实为我们办事。当时，我党在敌占区工作的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迎接反攻（原文忘记）。我们对敌伪政权划分为三类：一类是革命的两面派，即公开应付敌人，秘密为我办事（提供情报，征收公粮贷金等），形式上是伪政权，实际上是我们抗日政权；二类是自发的两面派，即两面都应付，即应付敌人，也应付我们，但不做坏事；三类是反革命两面派政权，即表面应付我们，但实际上为敌人办事，这是真正的伪政权。长安区各村政权，绝大部分是革命的两面派，即实际上是我抗日政权，为我办事。只有极少数村政权两面应付，真正反革命两面派村长尚未发现。因此，长安区虽长期为敌占区，但保存并发展了党的力量。广大人民群众不论在掩护革命同志，还是在物质上支援抗日救国斗争，都做了很大贡献。我们党对伪政权采取了实行革命两面派的政策，我党组织决定派了不少党员担任伪甲长、伪村长，直接掌握村政权。他们同敌人斗争的工作是很艰巨、很复杂的。这个历史情况，在当时是为了革命斗争需要所采

取的斗争策略，对在建国以后的青年来说，是不了解的。

一九四三年夏、秋之后，抗日斗争形势逐渐好转。长安区即建立了二十余人的区中队，区长刘光复兼队长，我兼政治指导员。一九四四年沂城解放前夕，上级先后派梁绪和、刘洪玉任区委组织委员和区中队副政指。区中队的建立对开展对敌斗争，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四四年八月，我军收复沂水城，全歼沂城日伪军千余人。我在长安庄前广场主持召开了盛大的军民庆祝大会，热烈庆祝收复沂水城的重大胜利，群情高涨，一片欢腾。会后不久即在凤凰头树立了解放沂水城牺牲的烈士纪念碑。一九四七年被进犯沂水的国民党反动派破坏。

沂城解放后，我们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组织互助组。当年冬季，发动青年参军时，长安区青年踊跃报名。长安庄在支书吴召同志带头影响下，三十余人参加了军，组成了长安庄新兵排。不到一个月，全沂北即有二百余名青壮年充实了抗日主力军。

一九四五年五月，长安、道托两区合并为道托区，张继庆任区委书记，王心斋任区长。我调到沂山地委分派到安丘县开辟新区工作，建立淮安县。

(三)

一九四六年八月，我从沂山地委组织部调到沂北县崖庄区任区委书记。这时区长是李汉均，区委组织委员王锡和，宣传干事张洪业，公安特派员王金福，人武部长刘新仁。这就到解放战争时期了，不多谈了。

(蹇宪诺整理)

一九八六年六月

回忆沂北县参议会

宫 家 和

沂北工委和行署是于一九四二年秋在原沂水二区百鼓峪村组建的。其主要成员有沂水县委组织部长武杰和崔杰千、李怀德、单昭祥、刘亚明、李明奎、朱兰波、王秋浦、耿启明、李德民等同志。沂北辖原沂水二区、七区和三区的部分乡村。不久，二区撤销划为诸葛、葛庄、高桥、道托四个区，七区和三区暂时未动。

至一九四三年，五十一军撤出七区后，七区撤销划为马站区和崖庄区。同年冬，我鲁中军区部队第二次讨伐吴化文部胜利后，又将三区划为韩旺区和大泉区。同时长安乡划归沂北改为长安区，莒沂边县荆山区（后改浯河区）也划归沂北。

至一九四四年春，我军第三次讨伐吴化文，将吴残部赶出原沂水三区和八区后，成立了沂源县。这时把沂北管辖的大泉区划归沂源县。此时，沂北县辖诸葛、葛庄、韩旺、崖庄、马站、浯河、高桥、道托、长安九个区。

沂北县虽是抗战中期建立的新县，但其革命历史很长。早在大革命时期，下胡同峪、埠前、坡庄、七里铺子、孔家庄、北松峰、武家洼等村就有党的活动。到抗日战争时期，更是我鲁中行署三专署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当时，三专署所

属临朐、益都、昌乐、淮安、安邱、沂北等七个县。除沂北县外，其余六县都靠近胶济铁路，唯沂北县是老革命根据地。因此，三专署的党政军机关多数住沂北境内。

一九四五年，沂北的各项工作已逐步走向正轨，这时，上级决定召开沂北县参议会，成立沂北县人民政府。为此，在本年夏季，沂北工委、行署专门召开了各区委书记、区长会议，酝酿召开第一次全县参议会，制定施政纲领和施政方针，选举县参议长、县长和县政府行政委员。会后，各区先后召开了各阶层和抗日团体代表会议。我们葛庄区是在下胡同峪召开的，会期三天。到会人员有各村支部书记（也叫村指导员）、村长、农救会长、青救会长、妇救会长、工会会长、自卫团长、民兵队长、识字班队长、儿童团长、小学教师代表、劳模代表、开明士绅代表和工商界代表。会上先是推选了参议会代表候选人，通过民主讨论，最后选出二十八名正式代表作为县参议员。当时葛庄区下边没设乡，分葛庄、文村、松峰、武家洼四个基点村。松峰基点村选出议员五人，有宫家和（青年代表）、孔宪莲（妇女代表）、陈鹏（教师代表）、顾仙舫（模范军属和开明士绅代表）、刘文汉的父亲刘×（名子失记，开明士绅代表）。其他基点我记得有区长王联三、区妇救会代表王永芬、青救会代表于国范、武装部代表刘成练、工会代表张德章、农救会代表曹立章、小学教师代表于弟清等。区长王联三为葛庄区代表团长。其他区代表记得有各区区长。南流泉村王涛同志的父亲王广文被选为模范军属和开明士绅代表。韩旺区和崖庄区还选了回民代表。县直机关各单位代表也是一个代表团。全县

共选出议员三百名，其中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一。

同年八月底或九月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沂北县参议会于工委、行署机关驻地沙沟区沙沟村召开。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怀着喜悦的心情，以区为单位齐集于会议地点。会期五天。

第一天，大会通过了会议日程、主席团名单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记得主席团成员有李竹轩（民主人士，沂北行署文教科长）、武杰（工委书记）、王树芝（刚从淮安县调来）、刘崮山（民主人士，三专署行政科长）、孔益千（沂北秘书）、孙毓亭（沂北武委会主任）、朱兰波（沂北行署建设科长）、李德民（沂北工委组织部长）和工农青妇以及各条战线模范人物代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是李德民，大会秘书长是孔益千，副秘书长是朱兰波。会上由朱兰波作了筹备工作报告。当晚各代表团进行座谈讨论，进一步认识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和明确大会要达到的目的。讨论时，朱兰波要求党员在大会期间起模范作用，特别强调要团结党外人士。

第二天，先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李德民报告了参议员资格审查结果，宣布三百名代表全部合法。武杰同志作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报告，他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任务和要求。他说：日本宣布投降前夕，我党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并对蒋介石的企图作了充分估计。我们必须认清当前局势，克服麻痹思想，时刻准备着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报告后，议员们进行了热

烈地讨论。

第三天，孔益千秘书长代表行署作了工作报告。报告主要讲了抗战八年中沂北三十多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再是讲了今后的任务。

第四天，选举参议长、县长和县政府行政委员。在选举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经过多次酝酿讨论，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李竹轩为县参议长，王树芝、孔益千、刘固山、陈××（名字失记）、朱兰波、李明奎、李树超、单昭祥等九人为县政委员。王树芝为县长，孔益千为县政府秘书，刘固山为民政科长，陈××为财粮科长，朱兰波为建设科长，李明奎为文教科长，李树超为司法科长，单昭祥为公安局长。

第五天，大会通过了各项决议，并分别给毛主席和蒋介石发了致敬电。给蒋介石的电报内容是：要求停止内战，实行“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接着，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胜利闭幕。

大会结束后，我留县参议会协助李竹轩同志搞了一段内勤工作。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五日